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7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 第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 9.125印张 195千字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0册

书号：11310·5 定价：1.00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文 献

忆友人詹大悲 .....董必武( 1 )

## 回 忆 录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一) .....李志民( 21 )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 .....(143)

——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

一、初到中联部(1958—1960) .....(143)

二、参加庐山会议(1959.8) .....(152)

三、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6).....(156)

四、东欧四国党代会(1962.11—1963.1).....(168)

五、二去莫斯科(1963.7和 1964.11).....(189)

六、出席罗共“九大”(1965.7).....(206)

七、参加“四清”(1965.10—1966.4).....(211)

八、二访阿尔巴尼亚(1964.11和 1966.10).....(215)

模范的兴国 英雄的人民.....肖华(226)

党在各地活动的史料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组织沿革概况 (初稿)

(一九二一年——一九四五年)王景 金宇钟(264)

读者·作者·编者

|            |       |
|------------|-------|
| 敬告读者 ..... | (288) |
| 来函摘登 ..... | (289) |

# 忆友人詹大悲

(一九二八年四月)

董必武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湖北省博物馆提供的手稿编印的。我们请董必武文集组写了詹大悲简介并作了一些注释。原稿是董老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重要手迹之一，它主要记述了詹大悲的事迹，同时也反映了董老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国共合作的不少重要史实，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文章的标题是我们和董老文集组共同商定的。手稿开头缺页。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将全文分段并加了标点，其内容均照原稿排印。

## 詹大悲简介

詹大悲(1887——1927)，字质存，湖北蕲春人。少年肄业于黄州府中学，后入同盟会，任武昌《商务报》主笔。一九一一年初与蒋翊武等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被推为文书部部长，并担任该社机关报《大江报》经理。同年八月，因该报刊登黄侃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名也》等倡言造反鼓吹“极烈之改革”的文章，报社被封，詹遭逮捕，

此即著名的“《大江报》案”。武昌起义后詹被迎出狱，主持汉口军政分府工作。一九一二年被选为湖北省参议会议员。一九一三年赴江西参加讨袁战争，失败后逃亡日本，次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再次被捕，袁世凯死后，始获释放。詹曾出席国民党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曾任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湖北财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新军阀以“共产党人”罪将他杀害于武昌。

.....

.....第一次省议会开幕未久，癸丑赣宁诸役<sup>①</sup>相继发动，黎元洪特别嫉嫌他，遂藉事请议会将他和赵鹏飞、梁钟汉三人除名。议会自然照办。他那时任国民党的汉口交通部长，湘、鄂、豫、赣的党务均以汉口交通部为据点。黎封闭交通部，派许多侦探想捕他。他卒经由九江、安庆、芜湖、大通、南京而安然到了上海。赣宁失败后，袁世凯气焰大张，豢养侦探多人，专以谋捕革命党员为职。侦探中有退伍军人、地方流氓、绅士、妇女各种各色的人。他在上海和各方接洽革命事，袁氏对他特别注意。有一次已被侦探骗上马车，他在车上看见走的方向不对，遂一面和侦探谈话，一面阴以手持车门机关，乘侦探之不备，突以肘将车门撞开，身向车旁扑下，侦探急以手抓他的衣服，因

扑势甚猛，仅拉破罗衫一角。

后由直隶副议长王某与他接洽，约至张园相会，曹誓洁先去，即入圈套。潘怡如<sup>②</sup>见情形已变，特通知他，所以他未遇险。袁世凯购他很急，卒与温楚珩同被捕。袁以为政治犯，租界当局必不引渡，故以伪造纸币案诬他，特请穆安素律师出庭申请。他的旧部刘老五，破获伪造纸币器械，此案遂大白于天下。袁世凯死了后，他才出狱。听说他在会审公堂判押西牢的时候，因头发被薙成一小圆形在顶上，曾与楚珩对视，忍俊不禁。入牢后，因反抗巡捕的无理，手被铐半日。据他自己说，初上铐时也觉得不好过，继而自忖，以为没有那双手，便无事了，作如是观以后，果然不为所苦。巡捕看见如此情形，深以为异，后亦不铐。有一次因他反抗得厉害，说要他于太阳下敲石子，西牢中所视为最苦工作的一种。他在牢中听说袁世凯死了，倒非常的不好过，一时甜酸苦涩都集心头。据他自己说，坐牢时，要以那一次为最难受。

他出狱后，正值各省恢复省议会。根据内务部的电报，凡因政治关系曾被取消议员资格者，一律恢复。他和赵鹏飞、梁钟汉系因政治关系，由黎元洪在湖北都督任内取消，自然应该一同恢复。在湖北省议会方面一致赞成。他到湖北后，前议长覃寿堃辞职。那时已无所谓国民党了，不过参加讨袁或反对袁世凯一派人有所结合，仍然推他为候补议长，投票结果，他以多数当选。因他当选议长，不仅官厅忌刻他，议会内亦有一派人反对他。官厅遂以他的议员资格系由议会同意除名的，不承认恢复，反对派更乐于赞同，于是他的议长当选了，议员资格还没有恢复。这一出滑稽



戏就那么样搁下来。议长问题，自后也无人敢提出，所以第一届的湖北省议会后半截没有议长，就是这个缘故。

他那时无事可做，遂将省议会中左倾分子团结起来，成立政治商榷会，郭炯堂为主任，他为副主任。改选参议员时，因研究系以大批款项来买，政治商榷会的人决定以消极的方式抵制，一连流会数次。研究系买得更厉害，最后他们不买你投票，只买你出席。于是乎商榷会动摇起来了，消极抵制的方法不能再坚持下去了。会中又没人有钱，最后才有一位投资的，始将商榷会的门面顾住。他于六年春又离开湖北，听说他曾到北京、奉天等处游了一次。他在湖北的时候，我们也时常见面，因他好打牌，就没有多谈什么。我在他离开湖北之前来日本<sup>③</sup>，我由汉口起程时是阴历正月二十日的早晨，雾很大，他特到船上来送我，谈了许多，现在也记不起了。

自在汉口船上分别以后，我们直到民国八年春上才在上海见着。我为什么到上海去呢？我和姚幹青<sup>④</sup>于七年三月间出四川，到万县时，听说蔡幼襄<sup>⑤</sup>在利川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我们写封信问问他的事体，他回信约我们去。我们去了，他就委在他司令部当秘书。中间幹青随着他往施南、往重庆，我仍留利川，直到阴历十二月幼襄回利川准备收束，派我、幹青往万县。我到万县十日，他就被方化南的部下所杀。事后检查证据，在电报局内检出唐克明等与方化南勾结，阴谋对付蔡部密电多通。鄂西靖国军同事诸人公推我到沪向各方申诉。我于各方都不熟悉，到沪后诸事很得他的指导。各方要人都会过面，但是解决问题要实力，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也无结果，我那时只有在

上海暂住。那时郭炯堂、张眉宣<sup>⑥</sup>等都在上海，郭未几时回鄂。湖北旅沪同乡组织一湖北善后公会，推定眉宣和我两人驻会，租的房子在法租界霞飞路，那时他居在渔阳里，汉俊亦寓渔阳里，与湖北善后公会会址正对过，我们四人差不多天天见面。

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明[蒙]运动，首先是文体的改革。主倡[张]文体改革的刊物是《新青年》，北京大学一部分教员和学生主张最力。另出一刊物名《新潮》，由文体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当时主要问题为礼教、妇女、家庭诸问题）。我们当时看了这些刊物，同时由汉俊介绍几本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sup>⑦</sup>，我们虽然看不甚懂，也勉强地去看。杂志里面有的谈哲学，有的谈文艺，有的谈社会主义。我们看中、日两国的杂志，觉得当时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漠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行会主义，且只有文字上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

我们几人当时都是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质存平素好打牌，自从我们在一块，他简直没有打牌。说起来也很有趣，他说一向也是穷，但是打牌无论输赢，手上总有钱，现在没有打牌，竟一成[连]几天没有一个钱。那年夏季，他的衣服，甚至于蚊帐都当了，他只剩得一条小纺的裤子和一件汗衫。裤子每晚洗澡后一洗，次日再穿。长衫是和我共一件，但他绝不把这一类的事放在心下打缴，他仍然一心一意的看书。我们同看一样的书，

他看了后即能领略书中精义，并且能表而出之，有时书上没有发挥尽致，他更能补充其说。我和眉宣当时都笑他贩到货即出卖，卖的货反比贩来货漂亮，这虽是笑话，可见他的接受性和表现力了。他那时的倾向，很近于无政府主义，他以为只有摆尽一切束缚，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他这种观念，可说直怀抱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民国十五年一月一日)前后，才逐渐淡散了。他的天分很高，向来对于科学虽然喜欢，可是没有学的机会。哲学、社会学、社会主义、文学这一类的书他都喜欢看，但没有专致力于那一种学问。他吸收的方面太多，又未提出一种作主脑。所以他革命的出发点始终未能确定。虽说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也没有什么动作，不过口头上常常露出来罢了。

眉宣于七月间回武汉，我到八月间也回武汉了。我们在上海时想在武汉办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报，因汉口虽然有大小报几十种，或资本不充，或人材不够，甚至有为军阀官僚作走狗，或专门以敲竹杠过日子，议论既不能动人，消息复多方抄袭，竟无一纸足以代表舆论，所以我们想干这一项事业。我们已将募股、章程、报社的宗旨及组织法都弄好了，定名为《江汉日报》。股票也预备印刷，但是没有钱。最后中山先生给了我一百块钱的川资，由这款里面取出四十几元作为印刷股票、章程、宣言的代价。宣言是他执笔，他用白话做的，虽是第一次试手，我们看了觉得很好。他不敢自信，当时戴季陶的白话文很漂亮，他特意送请戴季陶修改，季陶回信说宣言好极了，没有要改的地方，于是他才允付印。当时只想在武汉设立一种人民说话的机关，没有打算宣传某种主义，微含有不加入任何党

派中，以免报社基础动摇的意思。我回武汉后向四川方面募款，先许我者，以后又缩了头。幹青虽然赞成，也没有力量。资本的来源全靠他向潮汕、广州方面募集了。他往汕头募股稍有头绪，政局一变，归于画饼。到广州亦无从说起，办报一事遂成泡影。据说他在汕头，初不打牌，不叫堂子，后因日与当地官商往来应酬，逐渐破戒。

我们自上海分手后，直到民国十年八月川军援鄂之役<sup>⑧</sup>，才在四川巫山鄂西总司令部见面。先是潘笑侯<sup>⑨</sup>、王玄奕等在四川和刘甫澄们联络，以准备乘湘军援鄂的机会一致动作。中山先生时在广东任大元帅，特派他和彭巨川往川。川军援鄂之议已定，在川鄂人公推潘笑侯为鄂西总司令。巨川回广东复命，他在鄂西军中参赞军事。我代表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往川请兵，行至夔府，听说笑侯们已到巫山，遂转至巫山。

因川军已发动，我无需又去重庆，只将自治筹备处公函送至刘甫澄处，我也随军出发，由巫山至巴东，巴东至秭归，一路上敌人早已退却，直到南沱（在宜昌西上六十里）宿营。前锋已抵宜昌城外东山与敌相持，鄂西总司令行营又由南沱移至三游洞。这是江北岸的一枝〔支〕兵，是四川第二军一部担任的。还有肃清江南岸的是张亚光带的兵，属四川第一军，早已至宜昌对岸。宜昌城外为一带山地，利于守，不利于攻。有一次已占领了东山寺，天晓时敌人见川军人数不多，猛烈反攻，川军遂败。当川军占领东山寺时，有一连兵奋勇冲至宜昌城内被缴械了。那时吴佩孚已将援鄂湘军击退，亲率舰队至宜昌抵御川军。北岸川军攻既不利，一时又无援兵，只有南岸兵可用。但四

川一、二两军积[极]不相能，无法疏通。他遂亲往南岸见张亚光，晓以利害。亚光允分兵助战。他连夜往返，行山路四十余里。吴佩孚新胜湘军，又亲临前敌，气势甚盛。南岸兵虽至，亦不能撑持危局，遂决定退却。

我们越天柱山至南沱，过了几天，又由南沱再退，经太平溪、翻铲子崖。我和他、潘怡如、王玄奕、罗定祉们一阵走，走时他的脚步最快，脚力不行的要算我了。铲子崖是江边子上的一个陡崖，光在远处望着，以为不至于翻那样高的山罢，我们走了几个钟头，看看还是在半山里，上到崖头我已没有气力，崖路如梯，每段相隔约二尺许，我是由他的勤务兵在后面推，另外还有一人拉，才上去的。我们一直退到秭归。战时我们没有多的事，有一天玄奕、质存和我，还有朱旭东到秭归东门外去玩，离城约三、四里的光景，有一座庙，庙的名字已记不着了。晚上就在城外一个人家借宿。那晚上我们谈的话很多，玄奕对于质存的短处说得最恳切，质[存]也接受他的忠告。

秭归还是守不住，再退。我记得是一个半夜的时候，大家出城去，质[存]和我还有一位姓何的一路走，出了城没有几远，我们三人就歇了，料到敌人未必就到，即令到了，我们空人也有法子走脱，所以大胆睡了半晚上。次日到巴东，县署的知事也走了，简直没有人负责任。那时天下大雨，我们赤脚草鞋，都象雨淋了的鸡，跑到县署内去，好容易才找到了几个干公事的人，叫他们去找地方的绅士出来维持地方的秩序。我们在巴东县内宿了一晚上，又过江到北岸电报局内住着。巴东自然也不是我们久站的地方，遂由火峰界岭退巫山。

一路都是大山，到巫山后，军事上又重新分配。四川第一军守北岸，第二军和鄂西军过南岸取施南，笑侯虽任总司令，其司令部不过是草草组织了一下。这次到巫山既决定过施南，特重新组织，从军人员裁的裁，留的从新分配职务。他们要我充司令部的秘书长，我觉得有点难处的地方，改用质[存]的名字任秘书长，他留夔府与各方接头，我代理他执行职务。我们先到建始，他也去过一次，住了一天，他就走了。他在总部时，一切计划他都参加，往来公文他也负责的批阅。他在夔府住不久，就代表鄂西军往广东。我们在建始见面时也谈了许多，不过当时革命意识都很含糊，知道要解放民众，要革命，实不知道唤起民众参加革命。他往广东去了，四川的局面逐渐变化，有一部分人竟勾结起吴佩孚来。我们在施南的一出滑稽剧，到民国十一年五月也就闭幕了。

他在广州任大元帅大本营宣传委员，可是那是一个名，实在没有宣传过。他每月有一定的薪水，他的生活也就很平凡，甚至做许多不应该做的事。十二年国民党改组，讨论容纳共产党的事，内部意见很不一致。可是赞成者是热烈的赞成，反对者也是热烈的反对。他以怀疑试验的态度处之，这是他事后对我说的。其实当时他没有把这种事认作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来研究。他平素好打牌，在广东熟朋友很多，更容易干这种把戏，差不多天天打。当革命潮流高涨时，居然有工夫做那样无聊的事，自然是没有心思顾及革命问题的一派人干的了。他虽然很关心革命的事，因打牌的缘故，日与无聊的人们相接触。那些人是老国民党，眼看见自己一天一天和党脱离关系，遂骂热心

办党者是共产党，热心做事者也是共产党。他对容共本无什么旁的意见，但是来他寓中打牌的人总是说的反共一派的话；他为要打牌，也就不理会。可是社会上就说他的寓所简直是反革命的窝子了，其实他对于办党的几个人，无论是否共产党都表示很敬服。直到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他才深刻的感受着要办党。

十四年十一月间，奉国民政府的命令到江西，经过上海长江一截，他知以前的生活太过于耽溺，社会上革命的需要也不容许有革命性的人耽溺下去了，他的态度积极起来了。那时方本仁在江西正怀疑广东的政策。他到江西，极力宣传讨平杨刘<sup>⑩</sup>以后，国民政府是怎样统一军民财政，怎样得人民的拥护，和党与政治上的关系，并辩明没有施行共产。经他说明以后，始将方本仁的疑团一扫，广东的东北方面有了一个缓冲地带了。他回广东，又将江西及长江一带的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情形报告当局，以坚其信仰。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刑事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他以未学法律辞了，改任国民政府参事。

我于他去江西的时候到广东。我那时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一分子。湖北与广东的交通，极感不便，省党部报告中央的事情往往被扣留。我们那时就用私人名义通信与他，要他向中央报告，这样才使中央和湖北的关系密切起来。我在湖北起程前有信知会他，他知道我要到广东去，所以他起程时就吩咐他寓中的人，说我到了那里，就搬到他那里住。湖北省党部自十三年四月成立，领了开办费一百六十元，直到十四年十一月我到广东才领到两千块钱。我的盘川是自己借的，当然不够用，幸而他吩咐人将我邀

到他寓中去住，才减少了我的无谓的麻烦。

他回来时中央已决定于十五年一月一日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央早就通告各地方选举了。我到广东不久，湖北的代表就到了，我也是代表之一。湖北省汉口市及海外的代表到了许多，所以中央才将开会的日期决定。他为鄂军（当时因出发东江故未改定名称，后编入第六军）特别党部代表之一。我们住在一块，差不多天天是谈党的问题。为团结在广东的湖北人，我们发起组织了一个湖北革命共进会。本来在党指导之下，不应再设什么地方色彩的会，不过那时广东黄埔军官学校里有一个孙文主义学会，有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右一左互相排斥，黄埔招生，又不限定是党员，并且不知会各地党部，所以学生中不能纯粹是赞成革命的。我们恐怕湖北学生走入歧途，所以设立这个会。会成立后举定他是一个执行委员。后来有一部分人以为他有什么政治作用，颇排斥他，这会也就若有若无了。

我们自民国十年在建始分手后过了四年才见面。他在这个中间，生活虽是很放荡，却看了不少的书，如文学、哲学、政治、社会、经济等类的书，在国内出版的只要他买得到，他就去买，买了就看。因为他看的门类很多，所以不能有深刻的研究。加之他的天分本高，容易领悟，但仅涉猎一过而没有反复的钻研，所以不能有所著述。我常常问他：“你有语言的天才，又任宣传委员，为什么总不演说？”他说：“不愿意说敷衍[肤]浅的话，且一点意思反反复复的说，也觉得乏味”。我说：“说话的深浅要看听的人的程度，如在大学当教授，听讲的是专门毕业的学生，当然要讲深



一点的话。现在是要唤起民众，应该是愈浅愈好，且反复的说明也很要紧。广东自打平杨刘后，作了许多宣传，但是一般人民对于党的主义和政策明白了多少？主义和政策是决定了的，民众未明了以前，我们除了反反复复的说明有什么办法？”最后他也很同意我的话。

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他提了几个重要的议案，政治报告决议案是他起的草。在会议时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以后，有李子峰提议全体起立向蒋致敬，主席未咨询大会遽令全体起立，他去信质问主席团，所以会议记录把这段滑稽史删掉了，就是他一信之力。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毕后，奉国民政府的命令，驻上海为代表与各方接洽。

五月在广州开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开会本系因三月二十日事变，汪精卫出国，党中顿失重心，蒋介石等提出整理党务案，而右倾分子想借势推翻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那时共产党不便多说话，左的一部分[憋]气不出席，出席的也多不发言。他出席后根据正义，无所回避。决议结果多出于他的主张，往往反于提案者所豫[预]期。那时右派很得势，左的分子如甘乃光、顾孟馀、何香凝、陈公博、邓演达和他想团结起来，商议了几次，没有什么结果，以后遂入于北伐时期了。

在决定北伐之前，我们和何雪竹、蒋雨岩商量在湖北的准备工作，我们四人分途与蒋介石、谭祖安<sup>①</sup>、李任潮<sup>②</sup>、张静江面谈。结果由政治委员会决定在湖北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专任探听敌人政治军事上的消息，报告总司令部，并得接洽队伍扰乱敌人后方。当指定潘康时、刘孝

澄及省党部推一人为委员，以省党部所推代表为主席，其费用公推我暂领毫洋一万元转交特种委员会。不过在广州、上海、武汉作工作的人的川资怎样发给，也由我们几人商定办理。他仍充国民政府驻沪代表，我和他同船到沪，在沪[上]也是住在他寓中。

他和方本仁接洽江西问题，适中央又开全体会，举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礼。他为报告与方接洽情形并参与会议，又赴广东，我则返汉。到北伐出兵时，他又代表蒋介石到沪和方本仁接洽。等到他和方到广东时，蒋介石已出发到了长沙。他又和方本仁赶到长沙。那时湖北省党部推我参加特种委员会的工作。我因为要报告敌人军事政治情况于总司令部，第二次到长沙，我们又见面了。那个时候李汉俊、耿仲钊都在长沙，我们一齐住在夏斗寅的司令部内。他因路上受了热，到长沙就病了，病还没有好，总司令亲赴前方指挥，他遂抱病冒暑前进，不愿意在后面总部，又赶到前线。他所随的军队就是后来杀他的人胡宗铎的军队。军队作战时他总在火线上。他无军服，无符号，只着一身短衣，军队的弟兄许多都认识他。

在围攻武昌的时候他还是不时巡视火线，直到汉口恢复，他才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过汉口来慰问刘佐龙，并帮同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公博与汉口商家接洽，因他于辛亥革命时颇得汉口商民的欢心。他还是着一件汗衫，到汉口后才将我的一件熟罗衫子著上。他的任务除代表总司令慰劳十五军外，就是帮同筹饷。陈公博虽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初到汉口帮忙的人未召集拢来，人地生疏，许多事摸不着头脑。幸而他到了，一方面将湖北情形告诉公博，一方面将

政府宗旨告诉商民。那时虽是战时，财政上尚不至毫无办法的，大部分可说是得力于他。

湖北官钱局的财产约值一千五百余万元，那时由省议会及地方团体的人保管，财政委员会委他为清理官钱局产业委员会的主任。象鼻山铁矿局为湖北省有唯一生产机关，又委他为局长。他本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又充湖北政治分会委员、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长、湖北财政委员会委员、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他清理官钱局产业，首将省议会及地方团体代表所保管的约据接收过来，分别追取欠款。他对于象鼻山铁矿局首裁冗员，节糜费，停止抛砂。以前矿局开支，多者月七万，少亦三万余元，大部分非用之矿山，用在局内。他接收后，初尚不到一万元，后万余元，百分之八十以上用在矿山上，百分之十几用在局内。后潘怡如接他的下手，根据这种办法，所以铁矿局成绩为湖北各部分行政之冠。固由潘怡如的励精图治，而他的披荆斩棘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任建设科长，武昌城下未几日即委人拆城，由汉阳门着手，设立航政局，一面维持武汉的交通，一面检验各水道的船舶。

〔造谣者〕最说他身兼十余要职，讨几个老婆，租几个公馆，汉口则坐汽车，武昌则坐马车，摔官派，包税局。甚至袁世凯以造假票相诬堕〔陷〕想引渡他的事，他们也照袁世凯害人的口吻来造他谣言了。省党部也有人怀疑他，提出质问，他按照事实，逐一说明。各项职务的计划及其进行的程度详细报告。汽车系财政委员会的，马车系铁矿局的，为节省时间，始用牠〔它〕们代步，其余子虚乌

有的事，用不着细辩了。省党部很谅解他。但是他却不愿意长在政府里混，辞去各种职务。政务委员会的事，交由张眉宣代，建设科长由潘怡如代，铁矿局委潘继任，清理官钱局产业委员会的主任交彭介石继任，财政委员会因财政部派有财政处长，已归于自然裁汰之例，无辞之必要，他遂一意办党。

汉口市党部于革命军未到武汉时，不过四千余党员，革命军到达以后，骤然膨胀至四万余党员。他于组织部中特设训练干事，将各区分部地点人数制成表册，定期开会，自身前往参加，或派训练干事参加，当时有政学会[系]分子混入党内，将其党羽分散在各区分部内，以便操纵。经训练干事察出，政学系的阴谋始不获逞。三月国民政府又任命他代理湖北财政处长。四月湖北省政府成立，他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湖北财政厅长。

那时湖北形势是怎样呢？北面河南被奉军占领，京汉路不通。长江下游因与武汉政见不合，一切封锁。北阀军正与奉军接触的时候，张联陞在襄阳联合于学忠<sup>⑬</sup>叛变了。夏斗寅在宜昌勾结杨森，退到嘉鱼来攻袭武昌。杨森的队伍已占领潜江，进窥仙桃镇。湖南许克祥也自由行动起来了。武汉可说是四面受敌。大宗收入如特税（即鸦片烟税）、盐税、烟酒、印花税等都由财政部管辖，财政厅所管辖者为地丁、契税、厘金。兵乱的年分[份]，契税毫无收入，地丁也只能勉强够地方官厅的开支。只有厘金为财政厅可靠的收入。然因四方包围，武汉及附近的几局，也大受影响。他遴选妥人竭力整顿，故虽只武汉及附近几局，乃受军事影响而比较尚不大差。各局收入的税款，解

交中央银行，财政厅只知道数目而已。后方振武的队伍到了襄阳，虽把张联陞赶走了，鄂北的民财政，都归方氏掌握。鄂西方面系二六军恢复的，也就不甚客气了。他虽向政府军事委员会力争，事实上终无法挽救。

革命军恢复河南以后，中央〔指国民党中央〕因讨论分共问题，政治上惹起一个绝大的波澜。他本想摆脱政权，一心办党，又恐怕在那时辞职有共产党的嫌疑，所以分共后改组的湖北省政府他仍充委员及财政厅长。那时湖北正闹铜元荒，他和地方商民商量，预备发行一种铜元票，商民极力赞成。他报告中央政治委员会，也通过了，印就三百万（？），他已签了字。因财政部所发的国库券，中央银行的钞票，中国、交通两银行的钞票相继失掉信用，他恐重累人民，所以铜元券印就了签了字尚未发行。

唐生智统治两湖的时候，他自信为中央所任命的，对唐不即不离，他那时有一个梦想，想改良湖北厘金的制度。他以为目前实事上做不通的地方暂且不管，总要立定方案，留供来者参考。他召集税局局长、财厅重要职员及人民团体代表开了一个会，议决改良的办法。他拟将整理湖北财政的意见印成一个小册子，这件事是委托危浩生办的。危于本年三月七日也被他们杀了，他的整理湖北财政计划也就如春梦一般的过去了。

在唐生智未失败时，他和李汉俊有来日本的话，我当时很不赞成，一则中国革命潮流正高涨时，我们不应该随便离开革命战线，一则人家说他弄了钱，跑到日本，更给人以造谣的资料。其实他们在省政府的，如孔庚、李书城、李汉俊和他几个人已成连鸡<sup>⑭</sup>之势，一个人无法摆

脱，所以当唐生智出亡的时候，汉口泊有一条直航日本的货船，他们竟没有说走的话。

那时他以为与程潜、李宗仁平素都无恶感，与陈嘉祐并且是很要好的朋友，与胡宗铎亦非新交，去年曾同上火线，现既抛弃政权，闲居总没有什么关系。又程潜对孔庚、李书城表示特别要好。他和汉俊都觉得趁这个机会弄个明白，以谋行动和言论的自由。中间因陈公博在广东，他有向广东去的意思，卒以想谋行动和言论自由的缘故，未去。他看见报上载着胡宗铎打电到南京说我潜伏日本租界如何如何，他嘱咐怡如要我注意。我虽和他寓居很近，因他那里常有人来谈天，我只去过两次。怡如于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午后来，把他这句话和我说了，不到三个钟头，他、汉俊、怡如、危浩生在他寓中一齐被胡宗铎捕去了，并且将他的一个听用的也捉了去。

我一闻此信，恐怕他的用人随便说，即转了一个地方，并托人去找朋友营救。当时并不知道怡如、浩生也被捉。次日午后才找着一分[份]报一看，他和汉俊一捉得去就被他们干了。我那时的悲痛真是无可形容，几个朋友都认[为]我在汉口不能再住了，设法将我化装来日本。事后听说他被捕到胡宗铎司令部时，陈嘉祐曾去电话保释。胡怕延下去不好干，所以赶忙将他杀了。在被害前向兵士们作了一次简单的演说，兵士中有去年在火线上见过了他的，认识他，说：“对不起詹先生。”他答应说：“这不干你的事。”遂瞑目遇害。

他有一女志方，嫁魏以新。一子名诗华，尚在小学校读书。他被害后，将他寓中抄洗一空，其妻陈希蕙只身逃沪。

胡宗铎用来杀他的罪名，说他是共产党。他之不是共产党员，大家都很清楚。据说胡之杀他因他任财政厅长赚了很多的钱，报上也常常这么样记载。我最近看见魏以新君写给他弟弟大权的一封信摘录几句下来，总可看得出事实的真相罢：“……二、十七日示悉，我于正月十六日到申……诗华和我们到申后，即送至陈希蕙处，本月初十间，我把他送到爱国女学（海宁路，天保里肄业）……学费潘虽允负担，但他并未划定专款之数目，人事的变迁是极无常的，假若潘一旦不在申，或更有其他原因，那费从何处出呢？而且潘只答应了教(育)费，衣服及假期中用费却未说明白，不久诗华就要生衣服的恐慌……”

“灵柩尚存在济生堂，大约数月后再搬，经费由潘怡如担任，……他遇害的次日，我过江去收尸，遇张准臣说现在不准收，要示众三日。次日至济生三马路见数人抬李之薄棺即追问其领取之手续，当由许巡官告知，谓须向公安局呈请，俟批准后再与他接洽。为李收尸者姓黄，他说昨天一夜未睡，不知费了许多手续，方才领取。……我即至公安局递呈文，门房索酒资，与一元，求添加，又与一元，送入马上批准，又索酒资，又与一元。到七署找许巡官同至遇害处找营长（看守者）领取尸身（已装入薄棺中）。许巡官便提出条件了，讲定和李家一样——二十元——……。言定之后，即抬至济生堂，看定寿木（一百五十两），讲好衣衾（九十三元余），大致与李不相上下。棺内装好后，即启薄棺，洗净身尸。见口眼均张，头胸各中一枪，穿衣入材，至九时完毕。一共用了四百一十元，都借来的，后由张杨曹的帮忙，温拿了二百一十元，朱允出

## 四百元由熊继贞经手的……”

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一日午后十一时记毕于日本京都。一晚约写三页，语气称谓有许多不联贯的地方，留待将来再改吧。

### 注 释

① 癸丑赣宁诸役：指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身死，在孙中山领导和推动下，同年七月江西、江苏等省先后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九月，各地讨袁军在袁世凯的进攻下先后失败。此役又称“二次革命”。

② 潘怡如（1880—1942）：名康时，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清末投入湖北新军，因组织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事泄，逃亡日本。他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以及国共合作后的北伐战争。他是董必武同志挚友，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病逝。

③ 指一九一七年董必武同志赴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

④ 姚幹青：名汝婴，他是董必武同志在武昌军政府时的同事。一九一七年七、八月他们应张澜的邀请同赴四川，并准备在四川任职，后因熊克武与刘存厚作战，形势变化，次年初两人又同返湖北。

⑤ 蔡幼襄（1886—1919）：名济民（原名国楨），湖北黄陂人。清末在湖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同盟会鄂支部成立，被推为参议部部长。武昌首义时率新军兵士首先攻占督署，并参加汉口、汉阳的保卫战。一九一三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讨袁。护法战争中，苏成章、牟鸿勋在鄂西组成鄂西靖国军，响应护法，邀蔡任总司令。

⑥ 张眉宣：又写为梅先、眉轩、眉先，名国恩，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曾与董必武同志赴日本留学，并参加中华革命党。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成立时，他是成员之一，但不久又脱离了小组。

⑦ 《改造》为日本东京改造社出版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停刊。《新潮》为日本东京新潮社出版的文艺月刊，一九〇四年创刊，曾大量介绍过欧洲文艺作品。《黎明》不详。

⑧ 川军援鄂之役：一九二一年前后，南方的湖南等省有一“联省自治”运动。湖北人因不满北洋军阀王占元的统治，想乘机赶走王占元，造成所谓湖北人自治的湖北，但因本省没有军事力量，故乞援湖南的湘军和四川的川军，主持湖北这一运动的主要是李书城，蒋作宾等人。当时湖北党组织刚建立，对此持赞助态度，同意董老赴四川联络请兵。这次战争就是所谓联省自治中的援鄂战争。战争从一九二一年八月下旬开始，先后进行大约三个月，它虽赶跑了王占元，但湖北却落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一派之手。董老在本文中嘲笑他们在施南的活动是一出滑稽戏。

⑨ 潘笑侯：一名正道，字虚吉，湖北黄陂人。

⑩ 讨平杨刘：指广东革命军一九二五年五、六月间，平定广西军阀刘震寰和云南军阀杨希闵在广州的叛乱。

⑪ 谭祖安（1880—1930）：名延闾，湖南茶陵人。当时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⑫ 李任潮（1886—1959）：名济深，广西苍梧人。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⑬ 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吴佩孚部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司令。全国解放前夕藏于四川乡间，拒绝蒋介石胁迫赴台。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⑭ 连鸡：缚在一起的鸡。《后汉书·吕布传》：“此于连鸡彘（势）不俱栖”。

#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一）

李志民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

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

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四十多年的岁月流逝，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年成千上万英姿飒爽的革命青年，高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嘹亮歌声，仍在我们的耳边萦绕；他们坚持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总结出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军事、政治教育工作经验，鼓舞我们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奋勇向前；也激励我们把抗大的战斗生活记录下来，让抗大的传统作风和革命精神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继续发扬光大。

## 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都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以院校为基地培养出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进入井冈山不久，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就在江西省宁岗县砦市的“龙江书院”，亲手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并亲自选定队长吕赤（后为梁军），党代表蔡会文，副队长周子昆，区队长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等同志负责领导教学工作，开始培养部队的基层干部。一九二八年四月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教导队更加扩大，于十月间随军部迁往井冈山中心茨坪，每期都从部队的班、排骨干和作战积极分子中抽调一百多人到教导队去培训几个

月，再回部队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区、各军团也先后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培养干部。我在一九二九年夏就曾在红五军随营学校担任过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三年春至一九三五年夏又在红三军团教导营担任过政治委员，从事培养干部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秋，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亟需大批训练有素的干部充实各级领导，因此，中央决定，除了各地区、各部队继续办好教导队、随营学校外，于瑞金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即中央红军学校），刘伯承同志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刘伯承同志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由叶剑英同志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红军学校先后办了六期（第五期与第六期同时举办，称五期团和六期团），每期学习半年左右，仅第一至第四期就为部队输送了六千二百多名连以上军政干部。一九三三年冬，全国工农红军进一步发展到三十万之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扩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任命何长工同志为校长兼政治委员，徐梦秋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并统一领导在中央苏区先后创立的第一步兵学校<sup>①</sup>、第二步兵学校<sup>②</sup>和特科学校<sup>③</sup>，继续培养大批军政干部。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长征前夕，为适应战斗环境的需要，中央军委将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学校以及卫生学校中的一部分教职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大部分则编成一个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干部

团，由原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任团长，宋任穷同志任政治委员，随军委机关行动。在长征途中，干部团保留随营学校的性质，不仅配合主力部队取得多次重要战斗的胜利，而且结合作战、行军、宿营、警戒、侦察等实际情况，进行教育训练。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转战到达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合。一九三六年二月，干部团一部分教职学员与红军直属队成立红二十八军，作为“红军抗日先锋队”第三支队，由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同志率领，突破黄河天险，进行东征；另一部分则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在瓦窑堡成立新的红军学校，由周昆任校长，袁国平同志任政治委员，莫文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同志任训练处长。这就是以后成立“抗日红军大学”的基础。

上面简略回顾我军从建军初期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办第一个教导队开始，先后创办各种军事、政治学校的历史，目的在于说明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抗日军政大学的诞生与发展，是有它的历史渊源和光荣传统的。下面将比较详细地介绍“抗大”是怎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越抗越大”的光辉历史。

## **学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第一期**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创办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开始时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这就是抗大的第一期。

这一期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开学，至十二月底毕业，

历时七个月。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继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我东北四省之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阴谋并吞华北进而并吞全中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仍然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寇卑躬屈膝，步步退让，反而集中力量继续进攻我红军和陕北根据地，镇压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妄图在我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举将我军消灭。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公愤。一九三五年冬，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在我党领导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犹如火山爆发，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与日寇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很大变化的情况，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路线，并提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进行东征，给予封锁我陕北根据地、阻挡我军渡过黄河东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的蒋介石、阎锡山部队以沉重打击。接着，五月又进

行西征，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开辟了陕甘宁边区纵横八百余里的新区，红军声威大震，为迎接第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们党和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创造了比较稳固的抗日前进基地。

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估计到内战终将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形成，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夜。面临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党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及时提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75页）

当时我们党和红军干部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和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经受长期革命战争和艰苦斗争的考验与锻炼，迅速成长，虽然在长征之后数量上大大减少，但质量却大大提高。可是，由于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全党全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遵义会议改变了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但那次会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问题作出决议，对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错误影响，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批判

与清理。而这些错误的影响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妨碍极大。因此，为了深入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经验，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提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高潮的到来，党中央决定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恢复长征前创办的红军大学，定名为“抗日红军大学”，并着手进行筹备工作。可是刚开始筹办时并未引起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sup>④</sup>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会后，各军团立即行动，只有几天时间就把干部选送到红军大学，保证了六月一日按时开学。

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作为红大校部的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举行。空地上临时堆起一个土台，放上一张长方桌，摆上几张木条凳，悬挂起“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庙墙上贴上红绿标语，使整个会场显得简朴而又隆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同志首先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接着，毛泽东同志又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



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全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群众》第四卷第十四期）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阐明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红大的教育任务，给全校同志很大鼓舞。

根据当时干部的状况，第一期学员编为三个科，第一科一个队，科长陈光同志，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主要训练红军团以上高级干部，共三十八人，人数虽少，质量较高，平均年龄仅二十七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有三处伤疤。他们中间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罗保连、周建屏、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苏振华、陈士榘、赵尔陆、杨立三、谭冠三、莫文骅、郭述申、耿飏、张纯清、贺晋年、符竹廷、刘惠农、宋裕和、彭加伦、边章武、张树才、张经武、杜理卿、吴富善、肖文玖、童小鹏、贾立夫、邓富连、张达志等同志。此外，还有朝鲜同志武亭。（刘鹏开学不久就离开了；越南同志洪水因到校较晚故未计算在内）林彪、黄永胜也是第一期学员。第二科两个队，科长周士第同志，主要训练营、连干部，二百二十五人。第三科六个队，科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同志，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八百人。三个科共计九个队，学员一千零六十三人，全部来源于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大多数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骨干。当时由于校舍和物质条件的困难，学校分住两地，一、二科住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的

瓦窑堡，又称一校；三科住甘肃省环县本钵寺，又称二校。

红大开始创办的时候，内战尚未结束，西征战役正在进行，陕北根据地还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因此办校规模较小。第一、二科的在职干部总共才十四人，专职教员只有杨兰史、张如心等三位同志。学校的领导干部除政治委员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外，大多由学员兼任，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党总支部书记莫文骅、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等既是领导干部又是学员，边学习边工作。教员不足，就邀请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兼课或作报告，毛泽东同志带头，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秦邦宪）、徐特立、罗迈（李维汉）、何凯丰等同志都来校讲过课或作过报告。同时，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的一些干部，如王智涛、伍修权等同志也来兼课。这样，就克服了办校初期缺少教员的困难，不仅坚持了教学，而且保证了机构精干，教学效果也比较好。

这一期第一、二科教学课程基本上是军事与政治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联共党史、军事战略学等内容。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对学员的教育启发很大。第一、二科学员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演，并认真地进行了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大大提高了干部的

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使他们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在政治上具有清醒的头脑，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不受蒋介石花言巧语的欺骗，不被其多次反共高潮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经住了狂风恶浪的袭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同志在红大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略方面的许多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所讲述的事例和总结的经验，都是这些老红军干部所亲身经历的，体会尤为深刻。

第三科学员都是班、排基层干部，工农出身的占绝大部分，文化程度较低，其中还有不少文盲和半文盲。所以，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筹办红大时，毛泽东同志就特地给当时担任校长的林彪写了一封信，对教学计划提出建议。毛泽东同志指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有限的……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他还指示二、三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要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增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第三科的教学计划采取文化与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第二科也加强了文化教育，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半文盲，使学

员达到初小或高小程度。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队一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经凉水湾、真武洞、边咀子等地，于七月三日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城。那时的保安县，由于长期遭受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地瘠人稀，物产不富，交通不便，广大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红大进驻保安城时，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之外，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羊棚，住着几十户人家，不到四百口人，到处野草乱石，遍地牛屎马粪。要在这里建设校舍的确困难很大。但困难吓不倒备尝艰辛、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管职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人人动手清除牛屎马粪、垃圾杂草，垒墙填坑，把作为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清理干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编条草帘作门窗，改造成简陋的校舍和课堂。他们把几个小石洞作卧室，一个较大的石洞作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晴天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课堂。教员站在石台上讲课，学员们坐在石凳上静心听讲。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来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也常开玩笑说：“同学们，不，同洞们，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保安的石洞，这是锻炼我们的熔炉啊！”红大学员自己动手把破庙烂石洞改造成整齐清洁的校舍，这种精神大大感动了

新解放的保安县人民，当地群众特地赠送给学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表示了对红大学员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

这一期学员虽然只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中途又经历行军转移和修整校舍的劳动，实际学习时间更短，但大家感到，在过去的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途中，要抽出半年时间坐下来学习是不可能的，现在党中央利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陕北根据地相对安定的空隙时间，集中干部学习，机会难得，所以学习的热情和自觉性都比较高。特别是第一、二科的中、高级干部，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也有一定的自修能力，每天除上课外，都抓紧时间自己阅读、讨论，研究问题。尽管讲义是利用废纸的背面油印的，有的红绿纸张油印得不清楚，他们还是刻苦地学习，白天听课、看书和校对、整理笔记，晚上摸黑讨论，联系自己的斗争实际，总结亲身经历的战斗的经验教训。他们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全校学员通过半年多的学习，进一步清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以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所以，许多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在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大多数经过实践锻炼都成长为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和优秀的政工干部，驰骋于各个战场，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坚持了“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从此，历时十年的内战停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和发展，全国进入一个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此时，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因此，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一期学员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 迎接抗日高潮到来的第二期

第二期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开学，至八月间毕业，历时七个月。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处于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前夕。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我红军西征战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为我们党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年十二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得不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停止内战，准备抗日。我们党和红军的威信迅速提高，全国的广大群众都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至此，十年内战宣告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实现，全党的主要斗争目标，已由“实现停战”转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新阶段。

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山西、甘肃、宁夏的阎锡山、马鸿宾、马鸿逵等国民党军阀看到统一战线已是全国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得不作出一番“抗日”的

姿态，放松了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所以，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尤其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等各大城市的学生以及东北流亡学生中的一部分救亡运动的骨干和先进分子，就利用这个空隙开始奔向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这就向我们党提出了教育培养知识青年的新任务。

面临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毛泽东同志及时对抗大作了指示。他说：“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这个增加抗日力量的方法是与其它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第四期第35页）。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七年春，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为刘伯承同志，教育长为罗瑞卿同志。开学后，先后成立了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傅钟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刘亚楼同志任训练部长；杨立三同志任校务部长。五月间，傅钟同志调离抗大，莫文骅同志升任政治部主任。

这一期抗大仍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两大部分。大学部共有十四个队，学员一千三百六十二人，其中第

一、二队大多数是红军的军、师、团高级干部，他们中间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康克清、邵式平、陈奇涵、陈克寒、王铮、刘希平、刘型、姚继鸣、刘转连、王集成、王宗槐、乐少华、李干辉、王尚荣、谭友林、戴季英、黄春圃（江华）、谢翰文、姚喆、张罕涛、伍云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军、余秋里、汤平、张震、张国华、马文波、谢振华、梁兴初、肖望东、胡立教、贺庆积、李宗贵、赖毅、王维舟、周纯全、黄志勇、李中权、陈宗尧、谭政文、王波、谭家述、曹里怀等同志；第三队至第八队是红军的营、连干部队。第一至第八队共有红军干部七百五十三人。第一队队长陈赓同志，第二队队长倪志亮同志，第三队队长谭希林同志，第四队队长韩振纪同志，第五队队长苏振华同志，第六队队长曹里怀同志，第七队队长贾若瑜同志（后为黄春霆同志），第八队队长方正平同志（各队政工干部均由学员选出的党支部书记兼任）。先后成立的第九队至第十四队组成第四大队，都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五百五十人；另有一个直属大队领导的女生区队，大多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五十九人。聂鹤亭同志为第四大队大队长兼第九队队长，边章武同志为第十队队长，何长工同志为第十一队队长，刘忠同志为第十二队队长，谢翰文同志为第十三队队长（后为文年生同志），李干辉同志为第十四队队长，金维映同志为女生区队区队长。中央军委特任命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同志为第四大队政治委员，以加强对知识青年的领导和教育。

随着学员数量的增加和学校的扩大，学校的组织机构



必须相应地建立与健全，教职员的队伍也应加以充实。所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同时，先后建立了政治部、训练部及校务部的机构，在职干部也由第一期的十四人增加到八十七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第一期毕业学员中挑选留校工作的。

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和校部组织机构的健全，大大加强了对教学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了抗大的基本教育方针是“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加强抗大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同志又亲临大会讲话，指出：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毛泽东同志就这样勉励全校教职学员特别是知识青年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开学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负责同志都亲自到校讲课。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朱德同志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同志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同志讲授中国问题，博古同志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肖劲光同志讲授游击战术。同时，李富春、何凯丰等同志也常来兼课或作报告。这些党的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军事科学，给予全体学员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帮助他们打下比较扎实的军事、政治理论基础。

第二期开学正值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不久。由于全国红军大会合于西北，第一次把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干部汇集在抗大学习，这就有可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总结和交流十余年来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并通过总结、交流经验，进一步肃清“左”、右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影响，从思想上统一和提高认识，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系统地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根源及其危害，号召第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抗大根据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精神，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这是一次极为生动、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次教育在认真学习中央决定和有关文件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历史实际，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来认识、分析和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许多会议上都绘出张国焘从党中央机关到达第四方面军后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形势图，具体摆出当时的情况，展开热烈的讨论。不管哪一方面军的同志，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讨论。通过对“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以及其它各个重大历史问题的具体分析，使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性质以及他给第四方面军和整个革命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特别是从西

路军历经千难万险幸存归来的同志，以亲身的经历和切身体会，诉说西路军失败的经过，揭开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对干部教育更为深刻。许多同志想起那些在党长期苦心培养下成长起来、一直与自己并肩作战的部队和战友，竟被张国焘所断送，悲愤交集，痛哭失声；对张国焘一贯假手“肃反”排除异己，杀害党和红军不少优秀干部更是切齿痛恨。同志们以第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危害下所遭受的损失，对比第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北上抗日，与红十五军团一起开辟陕甘宁抗日前进基地，取得伟大胜利的现实，进一步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更加信赖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从政治上、思想上与张国焘划清界线，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全党全军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此后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原第四方面军与原第一、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步调一致，并肩战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特地到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sup>⑤</sup>。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讲四个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从五月份直讲到“七七事变”以后，历时三个多月，讲课一百一十多小时。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干部的头脑，使大家认

清王明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对革命事业的危害，端正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这一期是抗大第一次接受教育培养外来知识青年的任务。学校领导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识到能否教育好外来知识青年是关系到能否争取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问题。因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和阎锡山等各地军阀，也打起“抗日”的旗号，在武汉、广州、西安等地办起名目繁多的学校和训练班，用优厚的物质待遇和封官许愿的办法吸引知识分子，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我们办好了抗大，就能把广大知识青年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造就一大批抗日军政干部。在抗大全体教职员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期先后吸收的男女知识青年六百零九人中，经过教育培养，毕业时共有四百二十七人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被吸收入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通过这一期培养教育知识青年的实践，抗大取得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经验，为以后各期更大规模地培养教育知识青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这一批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大多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通过他们与各地革命青年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抗大的政治影响，这也是以后各地知识青年大量投奔延安的一个因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第二期大学部学员立即结束学习，于八月间毕业，奔赴抗日战争

的各条战线。毛泽东同志在学员毕业证书上题词，要求毕业同学要“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一期除大学部外，还附设一所步兵学校。它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红大”第三科与第二、四方面军两所步兵学校（随营学校）合并组成的。开始称“红大”第二校，一九三七年三月改称“抗大步兵学校”，校址也由甘肃省环县的本钵寺迁到合水县庆阳镇。步校下分四个营、十二个队，学员全系红军中的班、排干部，共计一千四百人，校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同志，教育长郭化若同志，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同志。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学员也相继毕业，分赴各个战场，步兵学校的建制撤销，它的一部分成立八路军随营学校，开赴山西八路军总部继续办学。一九三八年五月又从前线返回陕北，编为抗大第四期的第六大队，大队长韦国清同志，政治委员陈明同志，政治处主任黄欧东同志。一九三八年底组建抗大第一分校时，它又成为第一分校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继续为扩大抗大分校作出贡献。

### 全面抗战开始的第三期

第三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开学，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五月间陆续毕业分配工作，历时八个月左右。当时国内正处于抗日战争在各个战线全面展开的新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下，节节溃败，使北平、天津、绥远、察哈尔、太原、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蒋介石政府仓惶逃往武汉，蒋管区一片混乱。在这民族危亡的紧

急关头，我们党毅然担负起挺进敌后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重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八月二十五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之第二十四旅第二十一联队一千余人以及广灵伏击战、雁门关截击战和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等许多战斗的重大胜利，先后开创了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南方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行动和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增强了他们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开辟的解放区战场取得不断的胜利，这同国民党战场的节节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更加提高。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很自然地就逐渐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民主的圣地。而且，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陷于日寇铁

蹄之下，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都大肆烧杀淫掠，使中国的大好河山到处硝烟弥漫，尸横遍野。仅南京一地就有三十多万同胞惨遭杀害，三分之一的房屋化为灰烬。日寇妄图以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压服中华民族的抗敌意志，但这种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并没有能吓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反而更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仇恨，也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从这血的教训中更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也才有生路。所以，全国各地进步的知识青年都纷纷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尤其是平、津、宁、沪沦陷之后，这些学生运动基础比较雄厚的地区，进步青年更是成群结队接踵而来。地方党组织和我们党设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现乌鲁木齐）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和设在广州等地的八路军通讯处，为满足广大革命青年的抗日要求，也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以合法机构的名义公开张贴、散发抗大招生广告和招生简章，积极宣传抗大办校的宗旨，大力开展招生工作，并千方百计组织运送，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把革命青年一批一批地输送到延安。所以这一期吸收知识青年很多，开学以后来入学的，仍络绎不绝。

抗大的教育任务是随着形势发展而变化的。当时，由于我军逐步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到处急需大量干部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游击战争。这时延安还有一批原第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

刚从西路军回到陕北，正待分配工作；而且每天还有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因此，提高红军老干部的军政素养和团结教育好知识青年，造就更多的抗日军政干部便成为抗大第三期的中心任务。对于红军干部主要是通过学习，继续贯彻一九三七年三月的“延安会议”和八月的“洛川会议”精神，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影响，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投入抗日战争。对于知识青年则着重于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育，改造世界观，把他们的抗日热情引导到为共产主义事业，即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思想高度。当时，因抗日游击战争需要大批能文能武的干部，所以从这一期开始，抗大在搞好政治教育的同时，特别重视加强军事教育和严格军事生活。各个队都普遍增加了军事训练的内容，包括有步兵战术概则，游击战术，军事地形学，单兵和班的战术动作，排、连、营、团战斗的组织指挥以及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技术训练，以便学员毕业后能更多地动员他们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去工作，为部队输送更多德才兼备的得力干部。

根据这一期的教育任务，全校学员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下属第一、二、三队，大队长韩振纪同志；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下属第四、五队和一个女生队，大队长苏振华同志，政治协理员王赤军同志。第一、二大队除女生队是红军干部与外来知识青年混编的以外，五个学员队都是红军干部，共六百一十六人。其中第二大队第四队大多是原红军的军、师以上干部，他们中间有：王树声、曾传六、许世友、李志民、王建安、卢冬生、郭鹏、



王奇才、丁秋生、洪学智、詹道奎、曹祥仁、丁国钰、罗舜初、李寿轩、欧阳毅、晏福生、杨光池、程世才、李天焕、詹才芳、叶德贵(叶明)、谢立泉、张正光、曹光清等同志。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大队，下属四个队，大队长刘忠同志，政治协理员李干辉同志，有学员三百六十六人。此外，还有训练老干部的一个军事队，一百一十二人；训练新干部的一个军事队，都是外来的知识青年，一百一十一人；训练老干部的一个游击训练队，六十七人。全校共计十三个队，学员一千二百七十二人，其中各地来的知识青年四百七十七人，占百分之三十七。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三期开学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被任命为一一五师师长，虽仍挂校长的职务，实际上已离开抗大，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副校长刘伯承同志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师长，也离开了抗大，率部进入太行山区，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全校工作由教育长罗瑞卿同志主持，其他领导干部还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等同志。这时随着学校的扩大，干部和教员更感缺乏，为了健全和充实各级领导，加强教员队伍，除继续邀请党中央、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干部兼课或来校作报告外，又从第二期毕业生及本期学员中选拔一批优秀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干事和军事、政治教员，并开办了教员训练队，开始自力更生解决干部和师资问题。所以这一期在职干部和教员的人数从第二期的八十七人剧增到三百多人。我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冬从学员队中抽调到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的(一九三八年春又兼党总支部书记)。

第三期开学以后，各地知识青年还是一批批接踵而来，本来就很拥挤的抗大校舍更有人满之患；加之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创办一所“陕北公学”，更多地接纳外来知识青年，要求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北公学校址，抗大的校舍就更加紧张。而且从当时的形势看，知识青年还将大批涌进延安，抗大势必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校舍的困难便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罗瑞卿教育长等领导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了解到陕北群众自古以来就利用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梁岭纵横、塬川连绵的有利地形，因地就势，依山傍坡，修建许多窑洞作为住房。开挖窑洞施工简便，造价低廉，建造又快，确是解决校舍困难的好办法。于是便拜当地群众为师，请他们当技术指导，号召全校教职学员，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开挖窑洞，开辟新校舍。

领导一号召，全校齐响应。十月二十二日，从校首长到全体教职学员，一千多人总动员，扛着镢头、圆锹，浩浩荡荡地开上凤凰山工地，同心协力开挖窑洞。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就沿山坡挖成了一百七十五个新式窑洞，超额二十五个完成了任务。窑洞建筑得很好，有土炕、写字土台，洞口安有门窗，窗户木樯糊上白纸，四壁用白灰粉刷，光线充足，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袭。窑洞建成后，大家又动手修筑了一条三千多公尺长的盘山“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方便。当时，我们站在山下往上看，顺着山坡地势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蜿蜒起伏的“抗大公路”宛若玉带，缠绕其间；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凤凰山间，与夜空繁星

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

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不仅解决了缺少校舍的困难，而且对全体干部尤其对知识青年是一次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传统教育和实际的劳动锻炼。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十月二十三日，在抗大师生开始挖窑洞的时候，就写信鼓励大家：“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抗大召开了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礼，党中央特地赠送了毛泽东同志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参加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指出：“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同时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抗大政治部编《我们的伟大事业》第21期）当时，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参观抗大，看到古今中外从未有过这样的大学校舍，都钦佩地赞誉抗大为“窑洞大学”；抗大的同学们也自豪地称自己为“窑洞大学”的学生。

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旬，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延安会议”和“洛川会议”精神，并联系抗大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入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一些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检讨。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这一实事求是的评价，使原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深受感动。他们一致赞同中央关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这个观点，坚决响应中央提出的“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的号召，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与张国焘划清界线，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进一步增进了原第一、二、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此后各方面军的干部团结战斗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与关怀下，开得很成功，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但是，张国焘本人对党中央和广大指战员对他所犯错误的批判，始终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执迷不悟，坚持错误，最后，竟于一九三八年清明节时，借口到黄帝陵扫墓，只身逃往西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叛变了革命。张国焘的叛变，使全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他的反动本质。大家异口同声地谴责他的叛徒行径，坚决拥护党中央将他清除出党的正确决定。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全校举行了“一·二八”抗战纪念运动大会，进行军事检阅、学习成绩展览和球类、田径、军事体育比赛，这对于军事、政治、文化学习，都有很大的推动。毛泽东同志对

这次运动会也很关心，亲自为大会题词：“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一致前进，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宣布罗瑞卿教育长升任副校长，训练部长刘亚楼同志升任教育长，许光达同志继任训练部长，莫文骅同志调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由张际春同志继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仍任政治部副主任，使学校的领导更趋健全。

一九三八年三月，“抗大同学会”和“抗大同学劝募会”相继成立。毛泽东同志特为“抗大同学会”题词，重申抗大的教育方针。题词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抗大同学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题词的精神团结教育广大同学，发扬学员热爱母校、团结同学的精神。同学们在校时，为了帮助学校的发展，慷慨解囊，把家庭汇来的钱捐献给学校，有的同学甚至把珍藏的订婚纪念品——手表、金戒指都捐献出来，表示自己热爱母校的一片心意。他们毕业分赴各条战线之后，还经常与母校取得联系，汇报思想，报告成绩，并把抗大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各条战线，向广大群众宣传抗大，对抗大的发展扩大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期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开始陆续毕业分配工作，至五月份全部分配完毕，共培养了一千多名坚强的抗日干部，其中一半以上的学员毕业后即奔赴全国各个战场，另有将近一半的学员留校工作，为第四期抗大的猛烈发展准备好必要的干部和教员。在三月间第三大队学员毕业时，毛泽东同志和毕业学员作了一次亲切的谈话。他说，你们

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鼓励大家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继续锻炼改造自己。

### 在抗日烽火中猛烈发展的第四期

第四期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正式开学，十二月陆续毕业，历时八个月。这个时期，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失败；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日寇在攻陷山西太原等主要城镇之后，企图从碛口、军渡渡过黄河，进攻大西北，进攻陕甘宁边区。虽然日寇遭到我八路军河防部队的英勇阻击，未能渡过黄河，但陕北吴堡、宋家川的炮声，已时时传到边区；日寇的飞机也屡次轰炸延安，使延安已经不单是抗战的后方，同时又是抗战的前线了。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南方的战线也已被击破，日寇侵占了长江下游，企图攻占徐州，打通津浦路，并进一步占领陇海路与平汉路，以配合沿江而上的日军进攻武汉，掠取中原。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和所谓“正规战争”已难持续。在这种形势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江南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箝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进攻，威震大江南北，声誉空前提高。

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战场、两种军队，胜败兴衰，泾渭分明。这对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特别对沦陷区许多跟随国民党军队向后方逃难的青年学生，是最实际最深刻的

教育。他们流亡他乡，无学可求，无工可做，无田可耕，无家可归；即使少数勉强可以上学，在国民党所谓“读书救国”谬论的限制下，也没有抗战的自由。所以，他们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之中，苦闷抑郁，悲愤交集，都急于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投笔从戎，纷纷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

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满足广大知识青年的抗日要求，决定抗大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导队大量吸收外来的知识分子，来者不拒，随到随即编队，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大量干部。在这种形势下，抗大第四期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一百多名新学员，确是抗大的“黄金时期”。毛泽东同志喜见抗大在抗日烽火中迅猛扩大，欣然命笔，为第四期开学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指示抗大把为前线培养知识青年干部，作为这一期的中心任务。

这一期学校领导干部略有变动，除罗瑞卿、张际春同志仍任原职外，许光达同志升任教育长，陈伯钧同志任训练部长，周文龙同志任校务部长，欧阳毅同志任秘书长。根据招生的实际情况，全校先后编成八个大队，四十三个队，学员五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七个队，九百零七人；训练知识分子的男生有三十一个队，四千零一人，女生一个大队，五个队，六百五十四人，共有知识分子学员四千六百五十五人，占全校学员总数百分之八十三。此外，还抽调在职干部和教员成立了教员训练班，政工干部训练班，区队长训

练班和参谋训练班，以培养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

这一期由于学员人数骤增，延安城已经容纳不下，于是采取分散办学的办法，除第二、三、四、八等四个大队驻于延安附近外，第一大队驻瓦窑堡，第七大队驻蟠龙镇，第五大队驻庆阳镇，第六大队驻洛川县。因驻地分散，要求进一步加强大队一级的领导。特别是第一大队地处瓦窑堡，既有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又有国民党的县政府，而且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反共顽固派，经常制造磨擦，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加之第一大队学员人数最多，老红军干部比例最大，而且远离校部独立活动，所以干部配备也比较强：大队长苏振华同志，政治委员胡耀邦同志，副大队长詹才芳同志，政治处主任王赤军同志。此外，各大队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是：第二大队大队长冯达飞同志，政治处主任李干辉同志；第三大队大队长方正平同志，政治处主任钟伟同志（后为谢立全同志）；第四大队大队长刘忠同志，政治处主任黄志勇同志；第五大队大队长何长工同志，政治处主任袁子钦同志；第六大队大队长韦国清同志，政治委员陈明同志，政治处主任黄欧东同志；第七大队大队长徐德操同志，政治处主任李呈瑞同志；第八大队大队长张琴秋同志，政治处主任孟庆树。

过去几期女生数量较少，一般都单独组成区队，然后编入各个学员队。这一期女生大量增加，达六百多人，所以学校于十一月十三日单独成立一个女生大队（即第八大队）。女生大队举行成立典礼那一天，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等三十多位领导同志和来宾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同志作了讲演。他指出：全民族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



幼都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尤其是我们妇女同胞所受的压迫尤甚；我们反对一切加于妇女的压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民族平等，而且要在抗日战争中求得中国妇女的地位平等。毛泽东同志还鼓励她们说：中华民族的责任不但男同志应当承担，女同志也要承担；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得到解放，妇女也得不到解放，中国革命如没有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积极抗日，必须依靠妇女自己努力争取权利。毛泽东同志对女生大队的关怀和期望，也是对全中国妇女的关怀和期望。这些指示给予女生大队的同志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第四期这一大批知识分子除西藏、西康、青海外，全国各省、区（包括最早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台湾省在内）的学员都有，其中为数最多的有陕西省六百三十二人，四川省六百二十五人，山西省五百四十八人，河南省四百九十五人，河北省（包括北平市）四百零八人，江苏省（包括上海市）三百九十三人。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六十四人。此外，还有朝鲜、越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抗日志士”的大汇合。这些来自各地的知识分子，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其中也有不少国民党员）各民族和各种职业的人，家庭出身有贫农、中农、工人、城市贫民等劳动人民家庭的，也有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官僚等剥削阶级家庭的；本人职业有工人、农民、学徒、学生、中小学教员、小职员，也有演员、作家、音乐家、

电影明星、律师、记者、大学教授、技术专家以及国民党军官和行政官员；文化程度有大学生、留学生，也有中、小学生；年龄上绝大多数是青年，也有少数十五、六岁的少年和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出现了一些母女、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同学，师生、官兵、叔侄同队，举家同来求学的动人情景。据第四大队一千零一十七名学员的统计：出身于工农劳动人民家庭的有五百六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五，出身于官僚、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一百九十四人，占百分之十九；本人成份是学生的五百二十五人，占百分之五十一，小学教员一百七十九人，占百分之十七；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只有八十七人，仅占百分之八，中学程度的六百六十五人，占百分之六十五，大学、留学生程度的二百六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的六百七十七人，占百分之六十六，二十四岁至三十岁的二百九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九，三十岁以上的四十七人，仅占百分之五。

随着学校的猛烈发展扩大，学校原有的教职员显然不够分配，亟需充实与扩大教职员的队伍。虽然在第二期时毛泽东同志就曾题词，勉励教职员“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可是此时抗日烽火已经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论是红军干部或第二、三期毕业留校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都以上前线杀敌报国为荣，宁肯“马革裹尸”，也不愿留在后方搞学校工作，纷纷打报告要求调到前线部队，甚至连刚入学不久的第四期学员，也争先打报告要求提早毕业上前线参加战斗。为了稳定情绪，毛泽东同志在开学初的全校干部会议上，针对这些思想情况进行了动员，要求一切干部

要下定决心来干，要认识抗大的教育是抗日事业的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增强抗日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具体的方法。抗大的任务是光荣伟大的，我们应为这光荣伟大的任务而奋斗。鼓励全校教职员安心于党的教育事业。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罗瑞卿等校首长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除了适当保留一部分红军干部作为骨干外，大胆地从知识青年学员中选拔一批优秀分子，经过短期训练，培养成新的干部。所以，全校教职员从第三期的三百多人猛增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其中学校本身选拔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达九百零二人，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这一大批骨干除了充实各大队、学员队和区队的领导干部外，还用来建立和健全系统的教学领导体系，在校部政治教育科和军事教育科的领导下，各大队设军事主任教员和政治主任教员，各队还有驻队的军事教员与政治教员（老干部队再增设文化教员）。据统计，当时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有二十三人，军事教员和军事助教九十人，政治教员和政治助教一百二十八人，文化教员十二人，总计专职教员达二百五十三人。

这一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学校猛烈扩大，为革命队伍增加了大批新鲜血液，但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以适应学校猛烈发展的新形势，一九三八年五月，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主要总结建校以来特别是第三期之后大量培养教育青年知识分子的经验，确定第四期党的任务，并选举产生党务委员会<sup>⑥</sup>，由张际春同志任书记。

当时全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sup>⑦</sup>的队员有二千多

人，占知识青年总数的一半，这是一支巨大的突击力量。加强党对“民先”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民先”的助手和突击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一九三八年六月特地召开抗大“民先”代表大会，总结“民先”工作的经验，检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纠正了对“民先”组织重视不够和未能适应青年的特点开展工作等缺点，建立全校范围的“民先”领导机构——抗大区队部，使“民先”组织真正成为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和学校教育计划的有力助手。

在加强党和“民先”组织建设的同时，为了加强学校的基本建设，罗瑞卿、张际春等领导同志亲自深入基层，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总结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人员，主持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条令首先明确地规定了抗大的性质和任务：“本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施国防教育，创造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忠实于国家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的抗日军政干部，争取抗战胜利及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条令以毛泽东同志亲手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规定“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在实际生活上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期在长期抗战过程中间，英勇奋斗，完成革命任务”。

为了实现上述教育方针，条令还规定了教育方法上的一些重要原则和课程。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联系，体力、智力统一，军事、

政治之适当配合，进行革命批判的教授制度，自觉遵守的管理制度及集体互助的学习制度等。”在课程设置上，根据这一期知识分子多的特点，政治课方面有：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民众运动等；军事课方面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政治工作等。但这些内容不是各个队都要全部进行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有选择地酌情增减。当时正值毛泽东同志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精辟地阐述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篇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决了抗战近一年时间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很自然地就成为抗大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依据，列入教学的必修课程。此后，这两篇著作一直成为抗大总校和各分校的必修课，指引广大干部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此外，条令在组织机构方面也作了规定：全校除正、副校长及教育长各一人外，校部机关增设秘书处，政治部把组织科改为干部科和训育科（即党务科），李志民为干部科科长，李逸民为训育科科长。校部下属各大队，设大队长和政治协理员（后因工作发展的需要，多数大队增设政治处），大队下属各学员队（第一大队还增设了三个支队），学员队下又分几个区队，区队下分若干班，组织序列更加明确。

组织条令的颁发和执行，使学校各部门、各单位都有章可循，保证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协调进行，把学校各项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罗瑞卿、张际春等领导同志对抗大建设的一大贡献。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成绩，因为大量知识分子蜂拥而至，在思想建设方面又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当时投奔抗大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不少学生运动的骨干，有的已入了党或参加“民先”，他们在沦陷区和蒋管区时，因参加救亡运动遭受过日寇和国民党的摧残与镇压，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极端不满，对我们党领导群众坚决抗日无比崇敬和信任。所以敢于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力，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奔向延安，寻求真理。到延安后虽然学习紧张，生活艰苦，但他们经常可以聆听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革命领袖的教导，受到红军老干部的亲切关怀，而且，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政策，促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根据地又处处洋溢着抗日救亡的热情，充满着自由民主、团结友爱的气氛。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海阔天空，如鱼得水，心情格外舒畅，因而能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希望很快学好本领，上前线杀敌报国。这是主流的一面，也是抗大日益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好似大浪淘沙，有些知识青年因急于寻找出路，被抗日的洪流冲向延安，他们接受党的教育比较少，缺乏经受艰苦生活锻炼的思想准备，而且刚刚脱离旧社会，难免带来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过不惯紧张的军事生

活，生活散漫，作风拖拉，怕苦怕累；加之，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也难免混进个别特务分子和政治不纯分子，他们夹杂在学生之中，利用有些知识青年政治上幼稚和少数政治上比较落后的青年，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不满情绪。所以有一段时间在一些学员队中，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较突出。比如，有的队的个别青年喜欢在一起拉拉扯扯，评头品足，上自中央领袖、学校首长，下至队长、指导员和司务长，都要评论一番，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指责那个，自以为高明，看不起工农干部，议论队长是“打绑腿的”（土气），指导员是“打绑腿穿皮鞋的”（以土充“洋”），政治干事是“教条主义者”等等。还有个别国民党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宗教徒，也以共产党提倡统一战线为由，公开要求成立小组织，并要求党支部派人列席他们的会议，有意无意地要与我们争夺群众。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大部分干部特别是红军老干部，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都能按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言传身教，把广大知识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争取教育后进青年，挫败个别坏分子的阴谋诡计。但也有少数刚从部队调到抗大工作的干部，因缺乏工作经验，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发现不良倾向就点名批评，甚至发动大会批、小会斗，给人家戴上一顶“大帽子”。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引起矛盾的激化，甚至个别落后分子因此开了小差。罗瑞卿和张际春同志及时将发现的这些问题向毛主席汇报，一九三八年七月，毛泽东同志针对这些情况，特地对全校教职学员作了一次《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着重指出，抗

大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这并不妨碍抗大的军事性质。同时，在报告中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运用民主等方面，也作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同志指出：

这里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这些教可以在我们这里，我们不能硬要非共产党员来信仰共产主义，当然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并且还要宣传共产党的理论。

这里有思想的自由，听说过去墙报里说的只有一套，以后你们什么都可以写，只要是抗日的。汉奸的说话在这里是没有自由的。写信也自由，过去对于这点，做得不好，以后就要改正。

这里的政治是民主的。只有汉奸在这里没有走路之权。还有一点，就是要保证军事的集中。

班长以后用选举产生，但还须要学校加委，这是军事集中。救亡室、民先队也一律以民主选负责人。

取消斗争会。现在，在斗争会里动辄戴上人家一顶大帽子，这是不对的。

这里有意见箱。共产党说话是要做到的。我们要保证，任凭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投到意见箱里去，可以不写名字，决不会戴大帽子。

还有告状的办法。你们尽可以由下级告上级，也可以不写名字，并且保证你们的意见，达到学校最高当局。当然诬告不诬告，我们有办法查清楚的。

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在抗大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通过



学习，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加强，行政管理也有很大的改善，上下级之间、干群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从沦陷区和蒋管区来的知识分子，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政治上不民主，思想上不自由，内心郁闷。到了延安，来到抗大，听到毛主席的讲演，呼吸到解放区的自由民主的空气，心情格外舒畅。他们听课、听报告后，在讨论会上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有时还召开专题辩论会，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自己教育自己，政治空气非常活跃。全校教职学员在这种气氛下愉快地从事工作和学习，不仅克服了自由主义倾向，加强了组织纪律性，而且培养了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这些讲话，当年抗大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记忆犹新。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调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的胡耀邦同志，学习当时苏联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创造突击队员运动”）进行革命竞赛的经验，结合抗大的实际情况，在第一大队发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革命竞赛活动，对调动全大队教职学员的积极性，改变拖拉、懒散作风，推动整个教学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罗瑞卿同志听了汇报很感兴趣，马上带领工作组到一大队去作调查研究，立即在全校推广胡耀邦同志这个经验。六月间，在全校掀起了一个迎接“七·七”抗战一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队与队、班与班、个人与个人展开了热烈的挑应战，提出了“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为争取成为突击队员，突击模范班，突击模范队而

斗争”的口号，霎时，“突击向前，突击向前，我们要做一个突击队员”的歌声响彻全校。全校教职学员振奋精神，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都以“突击队”的战斗姿态去创造优异成绩，课外活动方面也有了許多新的创造。运动历时一个月，涌现出五百二十名“突击队员”和一批模范单位。在总结授奖大会上，毛主席亲临讲话，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创造突击队员运动的成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学校工作中具体运用的胜利。通过这次运动，总结了一套适合青年特点和学校具体情况的工作经验，此后各期都运用这些经验，以革命竞赛活动推动教学与各项工作。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2页）会后，毛泽东同志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十时给张际春同志一封信，指示：“此次毕业生必须发给《解放》五十七期六中文件，并须加以讨论之后，才走为好。需要多少，速去徐冰处交涉领取，先领少数每队发二、三本也好。卅号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一号下午的毕业会我准备到，二号可以来讲六中全

会的总结。”

毛泽东同志对抗大师生政治上的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十一月三十日，抗大政治部立即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深入传达讨论六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通过了《为实现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予我们的任务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规定了执行中央决议的六项具体任务：“第一、深入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和讨论；第二、坚决以培养更多更好的抗日干部的成绩来拥护六中全会；第三、改善与加强教育工作，提高教学的效能；第四、加强党的工作；第五、提高干部的学习和能力；第六、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会后，全校掀起了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在此期间，学校利用各地区部队负责同志齐集延安参加六中全会的大好时机，先后邀请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彭真、博古、肖克、程子华、潘汉年等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对全校同志了解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深入领会六中全会精神，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水平起了很大作用，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由于抗大的迅猛发展，抗大毕业的同学活跃在全国各个战场，带领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国内外造成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国内外的进步报刊、杂志对抗大作了不少报道和赞扬，因而国内外许多友好人士对抗大寄托了很大希望，并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赞助。一九三八年七月间，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雷克难、傅路德、雅德（女）等四人慕名来到延安，访问抗大，得到很好的印象，要求抗大承认他们为“名誉学员”。他们说：“在中国各地以延安的

印象为最佳，在延安尤以抗大为最好。”

第四期第一、二大队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毕业，其余大队于当年底陆续毕业。毛泽东同志在毕业证书上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并亲临毕业典礼会上讲话，勉励同志们说：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这一期的教育确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是把四千多名知识分子教育培养成为坚强的抗日军事、政治干部。这些青年在入学之初，虽然一般都有高涨的抗日热情和寻求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的愿望，但是大部分人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经过教育和实际锻炼，他们普遍地提高了认识，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初步树立起跟着共产党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信念。多数同志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水平，光荣地参加了党的行列。在开学时，四千六百五十五名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员只有五百三十名，仅占百分之十一；到毕业时，共产党员的人数增加到三千三百零四名，约占知识分子总数百分之七十一。同时，通过这一期大批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进一步取得了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总结出“依靠老干部为骨干，团结教育新干部”以及“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造成一个新老干部亲密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党的事业并肩战斗的生动局面。这样，就为今后冲破敌人

的层层封锁、深入敌后继续办好抗大，发展国防教育事业，准备好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

### 挺进敌后办校的第五期

第五期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学，九月至年底陆续毕业，历时近一年。这一年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相持阶段。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占了广州、武汉之后，其战线更加延长，兵力、财力、物力不足的弱点更为暴露。我们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人民抗日力量的蓬勃成长，有力地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的侵华计划，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它的占领区，迫使它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因此，它对国民党改用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迅速调运兵力对付我们党和敌后抗日军民。至一九三九年底，在华北增加到二十三个师团，在华中增加到六个师团，占它侵华兵力四十三三个师团的三分之二，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并出动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妄图达到消灭我军、鼓励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投降的目的。

在日寇诱降下，国民党汪精卫已经公开叛国投敌。而蒋介石则加紧反共，制造磨擦，在我陕甘宁边区周围先后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堡垒的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对我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并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出动国民党军队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的八路军，同时令军阀阎锡山在山西进攻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sup>⑧</sup>，掀起了

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日寇向我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妥协投降危机象滚滚乌云向我袭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抗大“关于学校建制改变”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及时指出：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估计到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战争的形势要逐渐进入新阶段。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这里，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针是培植干部……在今天，广大的敌人占领区域没有普遍的游击队的活动，千百万群众没有人去组织、去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战争……这就是说，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国民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抗日武装，没有把这些生动力量统统都发掘出来。这些工作都要人去做。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建立第一、二分校，以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罗瑞卿副校长在全校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建立两个分校的决定，并进行政治动员，详细说明建立分校的意义与目的：一、为着迎接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与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二、为着不因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影响学校的教育事业；三、为着便于敌后广大青年来校就学；四、为着使理论与实践更能打成一片，使教育方针能更好地运用与发挥；五、为使毕业同学更便于分配工作；六、同时也为着更能实际吸收前线丰富的战斗经验。罗副校长动员后，全校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当时，我根据了解到的干部思想情况，在《抗大》校刊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编中对干部的几点要求》的文章，说明“这个改编并不是缩小，而是更大的发展；并不是消极的简单的疏散，而是积极的迎合战争的需要，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们将来反攻的力量的必要的改变。”因此要求干部“到学员中进行深入的动员工作；以身作则，作执行新编的模范，无论留在延安或到敌后，都要从大局出发，牺牲小我，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

十二月十五日，学校正式颁布第一、二分校组织及干部配备的命令：第一分校由第五大队和第六大队全部及第三、四大队各一部分，与原陕北公学枸邑分校大部分及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一部分合并组成，任命何长工同志为校长，周纯全同志为副校长，黄欧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第二分校由第七大队和第一大队第一支队全部及第二、三、四大队的另一部分，与原陕北公学枸邑分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等各一部分合并组成，任命陈伯钧同志为校长，邵式平同志为副校长，袁子钦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十二月二十日，第一分校由何长工、周纯全、黄欧东等同志率领，以“何纵队”为代号，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南。同时，第二分校由陈伯钧、邵式平、袁子钦等同志率领，开赴晋察冀。两个分校的教职学员冒着隆冬的风雪，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先后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开学。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得悉第一、二分校已胜利到达目的地，特地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

谭政、罗瑞卿等同志的名义，给前总、军区发了电报，明确第一、二分校的领导关系及其教育任务，规定：一、抗大学生以培养八路军及其游击队之军政干部为目的，将来学生之来源以八路军战士及干部为主，毕业生应分配到八路军工作；二、抗大为培养八路军干部，应保证其有最低限度的教职员干部，由抗大分校抽出主要干部应经军委批准；三、应继续用抗大名义，分校应向母校经常报告工作及经验，而分校工作之指挥领导及监督则由前总、北方局、军区及分局负担之。电报中还规定如果要改变上述规定，应征得军委的同意，否则不得改变。这就保证了各分校干部的相对稳定，使他们能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为建设和发展分校作出贡献。

这时总校还在延安，也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学。总校领导干部基本不变，只有王智涛同志接替陈伯钧同志继任训练部长。总校直属五个大队，计四十一个队，学员四千九百六十二人；加上第一、二分校和七月间新成立的第三分校，全校学员总数达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人，其中八路军干部二千九百八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二；外来知识青年一万零四百零三人，占百分之七十八，比第四期增加一倍多，是抗大吸收外来知识分子最多的一期。所以，罗瑞卿同志在开学典礼时曾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这一期总校除了第五大队的政工训练队、区队长训练队、参谋训练队、敌军工作训练队等四个队是培养学校在职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第二大队的职工队是培养为部队建设服务的技术工人外，其余各队（其中包括第一大队一



个女生队，第五大队两个女生队)，都是新吸收的外来知识青年。这期学员的情况与第四期比较，虽然仍以外来的青年学生为主，但由于广州、武汉沦陷后，交通阻隔，南方的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的学生到总校来的人数有所减少。总校主要是靠近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占多数，其中河北省（包括北平市）八百零七人，河南省六百八十三人，山西省六百三十二人，陕西省四百四十一人，数量最多。第四期时没有青海、西康两省来的学员，这一期也有了这两省来的学员。

这一期学员的文化程度与第四期相比有所降低，小学程度占百分之二十六，中学程度占百分之六十四，大学以上程度者仅占百分之十。

第五期是抗大空前大发展的一期，不仅学员人数成倍增加，而且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开始创办分校，挺进敌后办学，为前线培养了大批干部。可以说，抗大第五期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值得回忆的事很多。下面我着重回顾这一年中的四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响应党中央号召，深入检查总结学校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底，党中央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号召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群众团体各单位，进行一次工作大检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使干部的思想和各项工作能适应于抗战新阶段形势的要求。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全校干部大会上作了指示，号召大家对过去工作要作一次检查，其目的在于使我们的学校向前发展；并为抗大校刊《检查工作特刊》题词：“检查越深入，越彻底，

越能够发挥学校成绩，克服缺点。”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抗大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成立了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欧阳毅、李志民、李逸民、谢翰文、周文龙、蒋耀德等九人组成的抗大检查工作委员会；各大队、学员队也先后成立了五人或七人的工作检查委员会。随即于一月十五日开始了对全校工作的大检查。

这次工作大检查的方针是：发扬工作中的成绩，纠正工作中的缺点，要求做到认真、切实、深入地检查工作，发扬民主，全面估计优缺点，有功者奖，有缺点、错误的指出来，但不记帐。检查的方法是采取自下而上地总结工作。首先由每个同志检查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进而检查学校的教育工作、政治工作、行政工作、供给卫生工作，一直到校首长的领导工作；从个人开始，再由班、队、大队到校部领导，层层认真检查，然后于三月六日召开全校第一次检查总结大会，由各大队派代表参加。在大会上，由教育长许光达同志报告教育和行政工作，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报告政治工作，校务部长周文龙同志报告行政管理的工作，卫生处主任蒋耀德同志报告卫生工作。接着分组讨论，并召开各种专门座谈会，进行深入检查总结。这一次检查总结大会开了八天，因春耕季节已到，全校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突击开荒生产运动，体会二十多天。四月六日继续召开第二次检查总结大会，由罗瑞卿副校长根据上次大会检查总结情况，对抗大过去工作中的优缺点和工作经验作了全面总结，对今后的工作方针也作了详细的阐述，内容十分丰富，反应很好。四月八日下午，毛泽

东同志亲临大会作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晚上举行文艺晚会，由抗大文工团作了精采表演，庆祝检查总结工作的胜利。四月九日召开授奖大会，奖励了政治部训育科、文工团、训练部油印股、秘书处、文书科、一大队、五大队、管理连和第四期的四大队三队等九个先进单位，奖励了张如心、任白戈等政治教育人员十二人，王智涛等军事教育人员九人，李逸民、李志民、谢翰文、邢亦民、郝汀、牛克伦等政治工作干部四十六人，苏振华、刘忠等指挥人员二十人，许凤翔等秘书人员八人，丁雪松等妇女干部五人，张济民等供给人员二十二二人，陈昌满等管理人员七人……共计奖励干部一百三十六人，战士和事务人员九十九人。奖励大会后，到会同志还摄影留念。至此，历时两个月零二十五天的工作大检查圆满结束。

通过这次工作大检查，抗大自下而上地认真检查了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总结了办校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三十种工作条例，从而大大推动了学校的建设。党中央对抗大这次工作大检查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中共中央《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中指出：“中央书记处听了罗瑞卿同志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报告以后，一致同意报告中对抗大工作的成绩、困难与缺点的估计，以及报告中所提的今后抗大的工作方针。抗大领导机关及党的各级组织应根据这一报告方针，深入全体教职学员中报告和讨论，以便在报告和讨论中，更加改进抗大各方面工作。同时，中央对于在抗大工作的同志们，从校首长至各级工作同志，深致慰勉之意，他们在抗大的工作是有很大大成绩的。”

第二件大事是开展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残酷的“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遭到极大困难。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党中央召集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进行生产动员。二十九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初步通知》，通知指出：“为了克服抗战新阶段中的困难，为了改善人民与工作人员的生活，应在陕甘宁边区人民中，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发动劳动热情，展开生产运动。”“中央号召党政军民学各部门全体人员立即动员起来，抓紧快要到来的耕种时机，有计划有组织地发扬每一个人的劳动热情，在基本上不妨碍战斗，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办到人人或大多数人参加劳动生产。我们相信以艰苦奋斗的精神，集体生动的力量，开展生产运动的结果，不但可以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而且可以改善生活，锻炼身体，推进工作，使之与伟大的抗战相配合。”为了加强对生产运动的领导，通知还规定“每一部门的各个伙食单位应组织生产委员会，其上再组织每一个部门的生产委员会，计划动员实施本部门、本伙食单位的生产工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志来到抗大。在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困难时提出：现在财政经济这样困难，我们是等着饿死呢？还是把抗大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任何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任何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我们不仅要把抗大办下去，办得更好，而且还要发展、扩大！鼓

不打不响，灯不拨不亮。毛泽东同志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引起抗大同志们的深思：是啊！要坚持抗战就必须把抗大办下去，要办抗大就必须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要克服困难唯有自力更生，积极生产劳动，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同志们明白了开展生产运动深刻的政治意义，立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

二月九日，学校召开了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进行生产动员，罗瑞卿副校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作动员报告，提出了具体任务：一、生产细粮三千三百担，折合粗粮六千六百担，平均每人应生产四斗细粮，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开垦二万亩荒地，把它变为丰腴肥沃的粮田；二、生产五千套单衣春用，五千套棉衣冬用；三、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四、全校所需绑腿由学校自己解决；五、全校全年所需的肉、菜由学校自己解决。为了完成上述指标，学校采取了下列措施：一、全校教职学员及事务工作人员总动员，参加生产劳动，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之内，统一安排时间，每人开荒二亩至三亩，并要求共产党员作劳动的先锋，切实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二、在生产期间，全校取消炊事员，由学员自己轮流做饭，把炊事员集中起来到延安城外十里铺创办一个“抗大农庄”，开荒种地；三、积极准备春耕生产工作，预计开荒两万亩；四、开展多样性的生产，除农业上的开荒种地外，自己弹棉花、纺线、开办缝纫工厂，解决穿衣问题，并自己制作粉笔、墨水、肥皂、纸张等日用品和学用品；五、生产劳动期间要改善给养，保证生产人员能吃饱饭；六、厉行节约，把节约运动与生产运动结合起来。

动员大会后，各单位马上着手进行开荒的准备工作。三月二十日开始掀起了生产突击高潮，从校首长到教职学员，从行政管理人员到炊事员、勤务员，男女老少荷镐扛锹向荒山野岭进军。有的大队就在山上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利用时间上课、学习。许多干部一面生产一面工作，白天生产，夜晚办公；有些红军老干部在过去战斗中负过伤，身有残疾，仍然带头劳动，作出表率。大多数知识分子过去从未握过锄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现在都争先挥镐扬锹，手上打了血泡，脚板被镐锹砸伤，仍咬牙忍痛坚持劳动。有些女同志替换炊事员做饭，送开水上山，肩膀压肿抬不动，就用手套、破棉絮，个别人甚至用绣花枕头垫肩。一些有技术的同志，白天开荒，晚上还加班打铁，制作和修理工具；还有不少同志带病参加劳动。这种高涨的劳动热情十分感人。当时李富春同志在《新中华报》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盛赞这种革命精神。他写道：“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的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扬扬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这段生动的描写，确实是当时大生产运动的真实写照。

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到四月二十五日全校便基本

完成了开荒任务，使多年荒芜的山地披上了绿装。七月间总校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就把这些土地留给三分校或移交给留在延安的机关、部队和地方政府。到秋收时，共收获粮食一百多万斤，基本上解决了三分校当年的口粮。这次生产突击运动，不仅改造了自然，而且改造了每个从事生产的人，特别是知识青年，使他们更深刻认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因此，毛泽东同志特为抗大题了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在生产运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大农庄”一百多个炊事员，劳动热情很高，收成很好。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夸奖“抗大农庄”路线是最好的！号召全国都应该学习“抗大农庄”的办法，人人要劳动，人人有衣穿，有饭吃。

第三件大事是举行盛大的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的庆祝活动。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是创办抗大三周年纪念日。为了宣扬创办抗大三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扩大抗大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用雄辩的事实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抗大的污蔑与诽谤，以推动国防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决定举行热烈而隆重的庆祝活动。

这次庆祝活动的规模很大，事先就成立了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张如心、李志民、欧阳毅、王智涛、胡耀邦、乐少华、金城、王赤军、李干辉、钟伟、黄志勇、黄欧东、袁子钦、徐兴华、刘鼎、路一、王钰、张正光、柏克、谢翰文、沙旅等二十四人组成的“抗大三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在校刊上刊登向抗大校友征集诗文、英雄事迹和展览品的启事，发出邀请校友返校参加庆祝活动的请

束。在校内则进行紧张的队列训练和战斗演习，排练丰富多采的文艺节目，选拔优秀的运动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六月一日下午五时半，规模盛大的庆祝大会开始了（当时因防空袭，大会都在傍晚以后进行）。参加大会的有在延安各个大队的教职学员，驻瓦窑堡和蟠龙的两个大队和晋东南、晋察冀的第一、二分校的代表，以及在延安附近的抗大校友和各兄弟部队、学校、群众团体的来宾约四、五千人。

会场设在延安南门外校部门前的体育场上。会场左面山腰上用青草就地剪裁成的“抗大万岁”四个大字葱翠醒目；右边山顶上用松枝扎成的“抗大三周年纪念”的大标语牌高耸云霄，气势非凡；会场中悬挂着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部队、各单位赠送的旗帜，五光十色，迎风招展，使整个会场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先后作了重要讲话；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同志、校友代表胡耀邦同志也出席大会并致热情洋溢的祝词。

大会首先举行隆重的阅兵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检阅了学员队伍，并拍摄了电影纪录片。

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二十六日就为抗大成立三周年写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篇著名的文章。在庆祝大会上，他又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抗大办了三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三年以来创造了很



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他还指出：“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反对投降。……‘反对投降，抗战到底’，我们抗大一致的拥护。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人讲和，要全体一致的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三年是这样，以后三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方针。”（见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新中华报》）毛泽东同志富有鼓动性的讲演，使全场同志热血沸腾，雷鸣般的掌声和“反对投降，抗战到底”的口号声，响彻会场，经常打断了他宏亮的声音。

接着，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讲话，他那庄重、浑厚的语调，给全场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刘少奇同志说：“有一种人，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抗大；他们中途阻挠毕业上前线去的抗大同学，虽然他们口说抗日，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准备当汉奸，准备投降的。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我们要把抗大一定办下去，一定办的好，把汉奸打倒，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见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新中华报》）

陈云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说：“抗大的同志很多是青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我们要准备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见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新中

华报》)

朱德总司令因为在前线指挥作战未能出席大会，特地从前方寄来题词：“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

在庆祝大会上，抗大全体人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由教育长许光达同志率领，几千只铁拳高举，字句千钧般地宣誓：

“当此民族革命的巨浪澎湃，抗日战争更趋于艰苦、紧张，我们举行纪念三周年，为着向社会人士宣告我们的主张和信念，发扬国防教育事业的伟大力量，为了表示我们坚决与团结的精神，为着勉励同志们今后更努力，更向前进，我们全校教职学员、事务人员，特别郑重宣告，坚决遵守以下誓约：

一、我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我们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反对任何汉奸妥协投降的活动。

二、我们要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坚决完成我们的任务，以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成绩，献给民族国家与中国人民。

三、我们是学校忠实的工作者和学员，我们要坚决执行学校的校规、纪律，与坚定、勇敢、艰苦、灵敏的校训，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风。

四、我们永远是抗大忠实的儿女，我们爱护我们的学校，要象爱护我们的保姆一样；我们要与一切破坏母校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五、我们要遵守学校以上的誓约，如有违犯，愿受国人之谴责，校友之唾弃和学校纪律之制裁。

谨此宣布誓约。”（《抗大》校刊第十三期）

庄严、宏亮的誓言象阵阵雷鸣，冲破夜空，在群山中回响，在每个革命战士的心扉震荡；它表达了全校同志的心声，使大家更加坚定了为争取抗战胜利，为祖国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信念。

宣誓毕，大会举行隆重的献旗仪式。在一对对高擎的火炬前导下，学员代表手捧一面面红灿灿的锦旗走向主席台前，然后两个代表一组，两个代表一组，循序走上主席台。一位代表朗诵“献词”，一位代表接着献上锦旗，把火一样的热情与诗一般的语言溶汇成的“献词”和鲜红的锦旗分别献给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和母校，表示了抗大同学一片赤诚之心。

当晚，举行了野火晚会，在皎洁的月色和熊熊的篝火辉映下，各大队分别表演了提灯舞、集体舞、秧歌舞等许多精采节目，直至午夜才尽欢而散。

庆祝活动连续进行了四天。白天举行运动会，进行球赛、田径赛、着装比赛、负重爬山比赛、会操、武术表演、集体游戏等活动；夜晚举行晚会，表演了京剧、话剧、活报剧、大合唱、秧歌舞等许多节目，特别是抗大文工团的演出更为精采。

在庆祝活动期间，抗大成绩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九个陈列室展出了三千多件照片、图表和胜利品等实物，非常丰富。其中包括抗大发展史，抗大的国防教育建设，在校同学的学习成绩和学习、生产、生活情况，毕

业同学在抗战各个战场上的功绩和英雄模范的事迹，充分反映了抗大三年来的伟大成就。

庆祝活动期间，在延安附近工作的抗大校友都返母校参加活动，战斗在全国各地的校友也纷纷来电来信祝贺，并汇报自己的成绩。全国各地一些进步团体也发来充满激情和良好祝愿的贺电。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的贺电中写道：“自抗战以来，贵校以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训练出万余优秀的干部，散布在全国各个战线上，从事于伟大的抗战事业，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敝会对此光荣之历史，深致敬意，兹值贵校三周年纪念，谨电申贺。”世界学联秘书长柯乐满也发来贺电，电称：“抗大的成长与其两个分校建立的消息，将为世界各地青年所欢欣祝贺。抗大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事业，已闻名于世界各国学生团体，并深为他们所钦佩……”各地的贺电贺信如雪片飞来，它对全校教职学员鼓舞教育很大。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抗大办得更好，决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期望。

在庆祝三周年活动期间，抗大出版了《纪念特刊》。同时，校首长还为《新中华报》和《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介绍抗大情况和经验的文章。罗瑞卿同志发表了《纪念抗大三周年的应有认识》、《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方针》；张际春同志发表了《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抗大政治工作及其经验》；许光达同志也发表了《“抗大”在国防教育上的贡献》。他们从各个侧面介绍了抗大在抗日烽火中“越抗越大”的基本经验，为推动全国的国防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每当抗大的校友汇集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回忆起纪念抗大三周年的庆祝活动，不少同志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可见这次庆祝活动给人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

第四件大事是抗大总校东征，深入敌后办校。这次东征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延安到晋察冀。**

由于日寇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造成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也使广大沦陷区与蒋管区的青年难以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为了继续发展国防教育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决定指出：“开办学校吸收大批青年到共产党及八路军方面来，是党最大的成绩，以后还应继续这项工作。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唯学校之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

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副校长宣布中央决定，并指出这一决定的政治意义：“第一，我们的东迁，给日本法西斯蒂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防’，而且在他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先到他们后方去。第二，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国民党的许多学校都迁往大后方逃避敌人，我们却向着敌后挺进，这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华北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争，还可以办学校；不

仅办抗大分校，还要办抗大总校，这是非常使人兴奋的。第三，抗大上前线，是给反共分子、磨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他们污蔑我们，说我们创造一党势力，专事在后方宣传。我们现在到前线去，正是给他们一个回答，让那些顽固分子睡在‘被窝里’逞英雄吧！第四，抗大上前线，也给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滥炸我们的学校，摧毁文化机关，企图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的罪行一个坚强的回答，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第五，抗大上前线，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条件。总校到华北去，不但可以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同时对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更有其重大的意义。”

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得到抗大全体同志的热烈拥护。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抗大总校除由留下的第一大队之工农干部队、第二大队之职工队、第五大队之敌军工作训练队和参谋训练队为基础，组成第三分校，许光达同志任校长，李逸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继续培养陕甘宁边区我留守兵团的干部和继续接受培养附近省区的革命青年外，校的领导机关和第一、二、三、四大队以及“华北联合大学”<sup>⑨</sup>合编为一个纵队，共五千多人。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和迷惑敌人，抗大总校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的野战军番号，由罗瑞卿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仿吾同志任副司令员，张际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同志任参谋长，欧阳毅同志任副参谋长。“华北联合大学”则改称为“独立旅”，由校长成仿吾同志兼任旅长和政委。同时，将原来的教学单位——大队、支队、学员队、区队依次改称团、营、连、排的战斗序列。一团团长苏振华同志，政治处主任王赤军

同志；二团团长郭林祥同志，政治处主任李呈瑞同志；三团团长刘忠同志，政治委员黄志勇同志；四团团长罗华生同志，政治委员李干辉同志。出发前夕，中央机关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欢送大会。毛泽东同志亲临大会作了重要指示，以“三个法宝”作为临别赠言：“一、坚持统一战线；二、开展游击战争；三、巩固内部团结。”他说：这是同志们上前线去的总方针，是拯救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

七月十日早晨，凉风习习，细雨霏霏。延安党政军机关干部和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女子大学、抗大三分校等院校师生以及当地群众上万人怀着惜别的心情，冒着雨敲锣打鼓，挥舞彩旗夹道欢送抗大东进的队伍。罗瑞卿同志向欢送的同志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别辞”。他说：“敌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敌后抗战！”这篇言简志坚的“告别辞”，也是我们誓师挺进敌后的“誓词”。它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和阵阵口号声：“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此刻，口号声、掌声和欢送的锣鼓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震撼山河的进军乐章，激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这是抗大同学们的共同宿愿。可是，如今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告别，向陕甘宁边区的乡亲们告别，大家的心情又象整装待发向母亲告别的战士们那样，既向往着战场上的胜利，又留恋着慈母的温暖；抗战的热血在胸中奔腾，惜别的感情又在心头缠绵。此时歌声最能表达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大家不约

而同地一遍又一遍唱起了《延安颂》、《延水谣》和《毕业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日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纵或有点点留恋……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这歌声，抒发了我们依恋的深情；这歌声，表达了我們杀敌报国的意志。同志们牢记着党和人民的嘱托，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在欢送人群热烈的掌声、祝愿声中，沿着奔流不息的延水河，绕过巍巍挺立的清凉山，走过宽敞平坦的飞机场，耳边仍不断传来送别的歌声和口号声，犹如母亲的呼唤。使大家不能不停下脚步，回首一瞥延安宝塔的雄姿，把它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作为指引自己前进航向的灯塔。

别了，延安！别了，战友们！抗大的同志们在心底里再次向延安告别，挺起胸膛，迈开坚定的步伐，踏上挺进敌后的遥遥征途。

我们的队伍在陕北各地群众的热情接送与积极支援下，经过几天行军，很快到了延川、延长一带。按预定计划，纵队拟分两路在军渡、柳林和延水关、永和关一线同时东渡黄河，经山西省永和、石楼等地，在灵石县附近徒涉汾河，然后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到达晋东南的长治、



潞城一带继续办学。可是，罗瑞卿同志带领先头部队渡河到永和关后，派出侦察队四出侦察，得悉连日大雨滂沱，山洪爆发，汾河水涨，不能徒涉，而且日、伪军从七月七日开始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敌情和水情都发生了变化，不可能按预定的行军路线行动了。罗瑞卿同志当机立断，立即率先头部队自永和关西渡黄河，返回延川县，与成仿吾、张际春、王智涛等纵队领导同志研究，请示中央军委改道经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再待机挺进晋东南。

七月三十日，纵队首长罗瑞卿、成仿吾、张际春、王智涛等同志于延川城指示各团的军政首长：“我纵队最近因受前进道路上河流水涨与敌情之阻，曾一度停滞于黄河西岸。现在为了避免上述阻碍，以便迅速完成原来的行动任务，已决定改道向北，取清涧、绥德、米脂之线继续东进，不日即将开始行动。”

八月初，纵队分成三个梯队先后从延川、延长一线出发，折向北行，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即佳县），到达盘堂渡口，分批乘船渡过惊涛骇浪的黄河，抵达东岸的黑峪口。黑峪口属山西兴县县境，这里是我军一二〇师主力部队开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队伍在兴县曹家坡一带稍事休整后，即由彭绍辉、罗贵波同志率领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一个团和地方武装一个团护送我们三个梯队先后出发，继续东进。

纵队从兴县出发，在康宁镇附近，翻越著名的吕梁山，经娄烦镇，徒涉汾河，再跨高耸入云的云中山，到达忻县以南、太原以北的庄磨、豆罗一带的同蒲路封锁线。

由一个团护送到铁路西，一个团在铁路线上接送。三五八旅和地方武装部队是久经战斗锻炼的英雄部队，他们对担负这次护送任务非常重视，事先经过认真的侦察，周密的部署，充分掌握了敌人动态；遇到敌情时，指挥员临机应变，灵活果断地指挥，战斗员英勇战斗，顽强抗击，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抗大的安全。有了这样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掩护，抗大师生的心里更加踏实。大家紧跟着掩护部队在敌占区内敌人的碉堡、哨卡群中穿插行进。掩护部队在敌人的封锁线上往返六次，掩护抗大三个梯队分成三批胜利地通过封锁线，登上五台山南端的一座大山。这是在定襄、五台、盂县、杨兴、西烟、上社、下社、会里这些日、伪军据点中间的空隙地区。翻过这座大山，就进入我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同志的关怀和晋察冀部队的掩护下，在根据地群众的热情支援下，顺利徒涉滹沱河，又经过几天行军，终于到达河北省的灵寿县陈庄一带，粉碎了日寇妄图在途中消灭抗大的阴谋。

这一次“小长征”，历时两个半月，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二十五个县的广大地区，渡过黄河天险，徒涉水流湍急的汾河、滹沱河、翻越吕梁山、云中山、太行山的崇山峻岭，穿过敌后日、伪军据点林立的地区，通过日、伪武装严密封锁的铁路线，行程二千五百余里。从陕北到达晋察冀边区，这确是件不容易的事。特别是这支五千多人的庞大队伍，除由抗大各班挑选个别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或学员骨干，配备一、二支步枪（每支步枪仅十发子弹）组成小分队，准备必要时担任掩护任务外，其余学员有的

携带两颗手榴弹作为自卫武器。他们虽已经过一段军事训练，但绝大多数学员还缺乏行军、作战的实际经验。他们每人除了自己的背包外，还要背六天的粮食和必要的书籍，负担颇重，每天行军七、八十里，过封锁线时，一天跑一百五十多里，有的团队还是在敌人碉堡的炮火下通过的。在这种敌情的威胁下艰苦行军，他们能胜利完成挺进敌后的任务，除了依靠沿途三五八旅等兄弟部队掩护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外，主要是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依靠老红军干部的骨干模范作用，带领知识青年去战胜各种困难。东进之前，纵队政治部就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大家明确东进的政治意义；出发前夕，党中央、毛主席和延安党政军领导机关、兄弟院校及人民群众的热情欢送，对抗大寄托了很大的希望，给予大家极大的鼓舞，为东进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

行军中，正值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字，全面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等等，这些问题在教职学员中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纵队首长在抓好行军的组织领导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指示各团领导说：“我们是个教育和学习集团，我们不仅要坚决完成行动任务，而且应当开展行动中的教育和学习，每天出动之初，大小休息之间，甚至行进中都应尽量开展教育和学习的工作。在这些场合中，不仅可以进行正规课程的学习，而且可以进行时事的、临时政治问题的、各地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介绍；进行行动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教育和组织干部学习”。根据纵队首长和政治部的指示，各团在行军中

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他们以红军老干部为骨干，组成一支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利用行军休息、待命的空隙或出发之前，作简短的报告、讲话，组织看书、看报、划分小组座谈；行军时边走边讨论，边走边讲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学习了中共中央抗战两周年宣言，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及结论，纪念“八一”的宣传教育材料及国际、国内形势等内容，使大家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坚定了持久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行军中，在没有敌情顾虑的时候，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活跃，唱歌、讲故事、猜谜语、说笑话，欢歌笑语此伏彼起，驱散了行军中的疲劳，使大家保持旺盛的情绪。

在行军中，还结合实际进行侦察、警戒、行军、宿营、战斗队形等军事课目的训练，并于休息、宿营时组织学员轮流站岗放哨，轮流当炊事员烧水做饭。这样，既增加了学员的军事知识，又培养他们适应战斗环境的能力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行军中，部队还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良传统。各团组织宣传队，连队组织宣传组，并发动所有人员沿途进行宣传活活动。宣传队除了在途中组织“行军鼓动棚”，给同志们说唱、加油鼓劲外，沿途还写标语、画漫画、表演小节目，向群众讲演；在情况允许时还深入驻地群众，进行调查访问，或召开军民联欢晚会，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我军的胜利喜讯。在宣传工作中最大量最有效的是我们队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并为群众打扫庭院、挑水劈柴；临离开时

还派出群众工作组检查群众纪律，归还借用的门板、铺草、用具，赔偿损坏的东西。所以，我们经过的地方无论是游击区或敌占区，群众都异口同声称赞我们部队纪律的严明，主动为我们带路和传送情报。

诚然，艰苦的行军和敌情的威胁，开始时，曾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产生过动摇，甚至发生个别事务人员和学员“开小差”的现象。因此，各级党组织都很重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反逃亡的组织领导。行军途中，党的组织生活非常严密，经常召开小组会或个别碰头，汇报情况，分工帮助周围的群众。当时特别强调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许多党员同志本身体质并不好，仍然争着帮助别的同志背背包，挎粮袋，搀扶掉队的同志赶上队伍。有时粮食不够吃，党员同志宁肯自己挨饿，或以野菜充饥，也尽量照顾群众多吃一点；宁肯自己舀脏水沟的水解渴，也要省出一点清水给群众喝，就这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群众向前，使个别动摇的同志坚定起来，跟上了队伍。对于在行军中经受住考验，表现较好的非党积极分子，党支部也很注意考察教育，及时发展他们入党。这样，既能不断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增强党的战斗力，又能激励知识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改造自己，创造条件争取入党，造成一个积极上进的政治空气。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队伍准备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时，三个梯队都普遍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誓词的大致内容是：我们誓必完成党中央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通过封锁线，直到最后胜利……如遇非常危险，宁肯义死，决不变节！事实证明，这种宣誓仪式并不是形式主义，而

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的。当时，整个纵队分为三个梯队在忻县以南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第一梯队靠近封锁线时，发现预定的通道有日寇埋伏，纵队首长与护送部队的首长研究，临机应变，立即改道从敌军埋伏点的南边十几公里处迅速通过。当敌人发现我第一梯队已通过封锁线时，赶忙转头南下，企图伏击我第二梯队；此时，我第二梯队得悉敌军在我第一梯队通过的地点设伏，随即绕道北上，由原第一梯队预定的通道附近快速通过，使敌人再次扑空，一筹莫展。第一、二梯队顺利通过封锁线，激起了日酋的震怒，马上重新部署兵力，对同蒲铁路沿线严加封锁，下狠心要在封锁线上消灭抗大。当时已是深秋时分，天气转冷，部队没有棉衣，粮食也很困难，第三梯队非及早通过封锁线不可。可是，第三梯队是由抗大第三团和华北联合大学组成，其中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入伍时间不长，过去缺乏军事训练和夜行军的锻炼，当先头部队通过铁路线不久，后续队伍中一些掉队的同志急于赶上部队，划火柴照明查看地图，寻找行军路线，暴露了目标，因而遭到日寇的截击，虽经三五八旅同志的英勇抗击，没有遭受大的损失，但仍有少数人员不幸被敌人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员绝大多数在这生死考验的关头，都能实践自己的誓言，表现得十分英勇。有的机智地用破砖头砸死看守的敌人，逃离虎口；有的在被押往太原的列车上，冒着九死一生，跳下火车脱险，返回部队；有的经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壮烈就义。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将永垂青史。

总校第一、二梯队于九月下旬先后到达河北省灵寿县

陈庄驻地，原驻陈庄一带的抗大二分校把校址让给总校，迁往韩信台一带。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二十八周年纪念日，总校在校政治部驻地张家庄举行了“第五纵队”远征祝捷大会，同时庆祝九月下旬（旧历八月十五日）我晋察冀部队和途径晋东北的一二〇师部队联合作战，歼灭由灵寿出动袭击我陈庄的日、伪军一千五百多人的重大胜利。会上，贺龙师长和罗瑞卿副校长都讲了话。不久，第三梯队也历尽艰辛到达陈庄，与第一、第二梯队会合。至此，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进军任务。

### **第二阶段：在晋察冀边区进行教育、休整。**

由于日寇在晋东南的“扫荡”仍在疯狂进行，总校进入晋东南还有困难；同时，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根据对第三分校工作的检查结果，发出了《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所以，总校领导决定利用在晋察冀待机的时间，对前一段行军中的工作进行检查总结，并根据军委的指示对今后在敌后办校的方针、办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理方针，应当如下：

（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中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二)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抗大过去确有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必须加以纠正（检查三分校教育计划只完成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三) 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四) 因过去公开招生，特务人员混进不少，现在必须立即提高政治警惕性，三个分校立即进行全部干部的审查，洗刷有特务嫌疑分子的学生，党员应重视登记，弄清每个学生的政治面目是最重要的工作。抗大领导者应认识这不仅关系抗大，而且关系八路军，因为特务人员经过抗大可以打入八路军，希望你们严重注意。但此工作必须很好领导，避免及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

一九三九年十月，党中央、毛主席又电示抗大：强调教育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坚持政治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中心；并强调马列主义教育，加强政治教育与党的支部工作，加强思想意识的锻炼，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同时，根据当时坚持敌后斗争的需要，强调要特别加强军事生活的锻炼与军事技术的提高。



根据中央的上述指示，总校到达晋察冀后立即采取措施贯彻执行：

首先，确立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机关的组织机构，提高政治工作的地位。在各大队及后勤部门普遍配备了政治委员，明确政治部主任同教育长是平行的，后者负责领导校务行政及训练工作，前者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为加强政治工作，总校政治部扩大编制，组织科、宣传科一律改为部，我任组织部长，谢翰文同志任宣传部长；总务科改为处，由杨光池同志任总务处长；同时，增设了保卫部，由吴格成(吴实)同志任保卫部长。部、处下设科，政治部的干部较前加强。此外，对连队的政治组织，包括党的支部和青年队、俱乐部、宣传队等，也作了组织整顿和加强。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把巩固及严密党的组织列入中心任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上，采取更为慎重的个别考察个别吸收的做法。同时，加强锄奸保卫工作，对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进行重点审查，并清除个别政治上不纯的分子，使学校更加纯洁。

在整顿组织的基础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校政治部提出了“为创造模范党支部而斗争”的号召，开展创造模范支部活动。各党支部根据模范支部的条件，抓紧进行党课教育，在两个月内即学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一书，并联系实际，加强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到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政治部召开了创造模范支部总结大会，奖励了一批先进支部。这一运动对基层党支部的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学校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如何巩固党的组织，加强阶级教育与马列主义教育；如何创造有决心深入下层工作、接近工农的八路军干部；如何保证全体学员毕业后都到八路军工作等问题。最后，大会还选举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大会通过回顾抗大创办以来的经验，学习党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明确“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同时实行起来”的深远意义，进一步增强了全校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团结。

在陈庄休整期间，总校根据北方局检查第二分校工作的意见，派出工作组帮助二分校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并进行了组织调整。我与袁子钦同志对调，由我接替袁子钦同志任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袁子钦同志接替我任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长。不久，又由孙毅同志接替陈伯钧同志继任二分校校长。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盘踞灵寿县的日、伪军数百人再次出动袭扰陈庄。我们总校和二分校及时转移，使敌人扑空，没有受到损失，但总校驻地陈庄及附近几个团的驻地牛庄、女庄等村庄，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烧毁了不少房屋。敌人撤走后，我们返回陈庄，开始时少数群众有些埋怨情绪，认为如果不是我们抗大驻在陈庄，敌人不会来骚扰。我们针对群众的这种思想情绪，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奴役中国人民，我们只有武装起来坚持斗争，把日寇驱逐出中国，才能过太

平日子。同时，我们发动全校同志为群众修房、安家，劳动生产，救济受难群众，很快安定了群众的情绪，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 **第三阶段：从晋察冀边区向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挺进。**

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总校刚到达陈庄不久，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曾经发来电令：“罗（指罗瑞卿副校长）率领校本部全部干部及一部分学生于到达军区（指晋察冀军区）后，按适当时机转往晋东南。”据此，总校在陈庄一带休整待机时，就积极进行向晋东南转移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〇年元旦，第五期的教学计划已基本完成，总校及二分校即于陈庄联合举行毕业典礼暨欢送毕业同学大会，欢送十三个连队的学员毕业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〇师部队工作。一二〇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甘泗淇主任等首长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讲了话，欢迎抗大毕业同学到部队工作。不久，总校又将余下的六个连转给二分校继续进行训练，并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派出抗大总校第三团到冀中地区与冀中军区随营学校合并，就地培训干部。这样，抗大总校的队伍就大大精简，为挺进晋东南作好了组织准备。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晋东南地区已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局势比较稳定。总校即从陈庄一带出发，冒着料峭春寒，向南徒涉结着薄冰的滹沱河，于十三日夜在河北省井陘附近越过正太铁路封锁线，经南障城抵达测鱼。原计划拟从测鱼折向西南进入山西昔阳县境的东冶头，但侦察员报告东冶头发现敌人，所以校首长临时改变行军路线，避开东冶头的敌人，绕道山西和顺县境的皋落、青城、

松烟，再经辽县的拐儿镇、芹泉、麻田、桐峪，于二月二十六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与何长工、赖光勋同志率领的第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地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此后，抗大总校靠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便于直接接受其领导，也更便于加强对各分校的统一领导和工作指导。

### 边学习边战斗与进展华中的第六期

第六期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开学，至十二月全部毕业。这个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除陕甘宁边区外，在敌后陆续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等六个大的抗日根据地，拥有九千多万人口。在我抗日军民的严重打击下，日寇已经无力从正面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死，仍然梦想灭亡中国。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订立军事同盟后，日寇为配合德寇在欧洲的侵略行动，准备向太平洋扩张，急谋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以巩固它南进的后方。因此，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顽固派诱降，极力促进蒋汪合流，破坏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对我解放区实行更加残酷的“三光政策”、“铁壁合围”和反复“扫荡”，妄图一举荡平抗日根据地。

在日寇诱降下，蒋介石更顽固地坚持其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以此为投降日本作准备。当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他仍不断制造磨擦，并于一九四

○年十月公然停发全国人民给予八路军每月二十万元的抗日军费，千方百计限制我们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民主政权。这样，我们党和军队就面临着一个既要抗击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复杂局面，整个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阶段。

一九四〇年春，为了克服投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党中央、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下，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阴谋，提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口号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在全国掀起了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当时敌后斗争十分错综复杂，而且处于游击战争环境，部队经常分散活动，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较好的军事素养，以及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的能力，才能临机应变，灵活处置各种复杂的情况，在日、伪、顽势力的包围中得以生存、发展，去争取胜利。因此，培养训练干部便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一九四〇年三月，当我军消灭进攻太行山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三个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晋冀豫边区稍趋安定后，四月十五日，抗大总校第六期便在山西省武乡县的蟠龙镇开学了。

这一期开学时，总校领导干部基本未变，只有何长工

同志接任教育长。总校下属四个团、一个特科大队和两个直属女生队，学员四千九百多人。第一团团团长苏振华同志，政治委员王赤军同志，政治处主任张力雄同志；第二团团团长郭林祥同志，政治委员杨光池同志，政治处主任傅崇碧同志；第三团团团长刘忠同志，政治委员黄志勇同志，副团长聂凤智同志，政治处主任张昌大同志；第四团团团长罗华生同志，政治委员穰明德同志，副团长洪学智同志，政治处主任何善元同志；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同志，副大队长邓国卿同志，政治处主任铁坚同志。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野战政治部傅钟主任都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作了指示。朱总司令鼓励同学们说：“你们这一期比以往任何一期都幸福，能够直接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来受教育，接触更多的实际，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前五期的光荣成绩，努力学习，吃苦耐劳。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它的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要求大家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在毕业以后积极参加部队工作，下决心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接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大会上作了《民族危机加深与怎样争取时局好转》的形势报告。他指出：“在两年多抗战中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与转战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已经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发展了许多抗日游击队。八路军与新四军在人民拥护和自动参加之下，扩大起来了。两年多的经验证明八路军与新四军是战胜日寇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之一，没有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巩固与扩大，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为了担负起来历史赋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任务，游击队必须及

时地转变为正规军，使其成为抗日的铁军，为此，首先要创造大批军队的骨干。抗大这个学校就是创造铁军骨干的学校，没有这样的学校来创造铁军的骨干，就不能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队变为正规军，把正规军变为抗日铁军，就不能战胜日寇。因此，今天六期开学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特别你们的第六期，开学是在敌后华北举行，这更加容易使你们的学习与你们担负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彭副总司令还指出：“在抗大六期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正当汪精卫组织伪中央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民族危机更加深重的时候，同时在抗大六期开学的时候，也正是抗战处在相持阶段，即准备反攻阶段的时候，抗大总校来到敌后华北，并且举行了六期开学典礼，这就愈加证明了抗大是打击汪精卫、克服民族危机的一支可靠的生力军；抗大是准备反攻的一支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抗大的坚强和壮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彭副总司令勉励抗大同志发扬光荣传统，把抗大办得更好。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重要指示，鼓舞大家满怀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决心，把这所“创造铁军骨干”的学校办得更好。

这时，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沦陷区和蒋管区的知识青年进入抗日根据地已经十分困难。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除了由抗大总校继续派出有教育经验的干部、教员深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分校，就地吸收附近省区的革命知识青年外，抗大总校及各分校学员的来源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以及地方民主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基层干部。这样，第六期的学员与第四、五期学员的特点就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期大多是本地土生土长、经过一定革命斗争实际锻炼的基层干部，其中从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抗日决死队及地方民主政权和“民族抗日先锋队”、“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sup>⑩</sup>等群众团体来的干部占百分之八十五。所以，山西省籍的干部占百分之四十四，河南、河北省籍的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二。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大多数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和革命工作的实际锻炼，具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和工作经验，习惯于敌后紧张的战斗生活，与群众也有密切的联系，这对坚持敌后斗争与学习都是有利的条件。

这一期知识分子学员数量大大减少，工农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据统计：学员中出身于贫农、中农、工人家庭的占百分之八十六，出身于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和旧军官家庭的占百分之五，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家庭的占百分之九。本人成份为工人、农民、学徒、店员的占百分之三十八；学生、小学教员占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小学教员仅二十一人），大多数是农村及中、小城市的初中、小学学生，即所谓“小知识分子”和“农村知识分子”。由于工农成份的大量增加，他们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参加抗日斗争比较坚决，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比较好，经得起艰苦斗争的考验。

但是，这一大批工农干部在文化程度上与第四、第五期比较就大大降低了。第四、第五期学员大部分是中学以上程度，而第六期学员中，文盲与半文盲占百分之四十三，高小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四，中学程度的占百分之三十一，大学程度的仅占百分之二，这就给教学工作带来许多



困难。因为他们有许多人不能作笔记，或只能作简单的笔记，自习和理解能力也比较差，不得不增加文化教育的比例，并加强课外的辅导活动。同时，由于农民成分的学员增多，而且大多数是本地人，所以在思想上往往反映出比较浓厚的农民意识，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顽固派“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较难理解；而且因靠近家乡故土，家庭对他们的影响也比较大，特别是在敌人“扫荡”，家乡遭到敌人摧残，斗争比较残酷的时候，往往有些家庭问题的牵挂。

根据上述学员新的特点和当时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抗大从这一期开始，办学的方针和教学任务就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作了相应的改变，从第四、五期以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干部为主，转变为以培养提高部队工农干部为主；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又要研究如何适应工农干部特点的内容与方法。当时罗瑞卿同志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的精神曾经强调指出：“抗大今后的方针主要为我党军队培养干部，应在我党军队建设上起着骨干作用。因此，抗大今后不仅有初级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上级干部之培养；不仅有一般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各种特殊技能干部之培养，而应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使与整个党军的建设相适应起来。”为了适应当时在敌后办学的特点，罗瑞卿同志还特别强调抗大的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说：“抗大的教育应与整个前方部队取得极密切的联系，过去这种联系是万分不够的。这种联系应表现在学校与部队的双方，学校有帮助前方整理经验之责，而部队应有供给学校的材料之责，如此，于部队于学校的发展均有好处。”

要培养我军建设的骨干，政治教育是一环。所以在教育中反复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一基本原则，针对学员大多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特点，特别加强基础理论的教育，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马列主义观点为依据，编成政治讲义进行教育。把学员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思想高度，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在政治教育中，也特别加强了形势任务教育、解放区各项政策教育和学习部队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当时抗大处于敌后斗争的环境，而敌后斗争主要是武装斗争。因此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加强军事训练，根据学员具有一定实战经验的有利条件，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论述，联系他们自己的实战体会，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更重要的是，在军事训练中特别强调实际动作的演练，加强近战、夜战的战术演习和掌握武器性能的技术训练，要求做到动作熟练，会教会用，以便他们回到部队时既能当指挥员，又能当教练员，普遍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根据部队发展的需要，这一期还专门成立了特科大队，下属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和参谋、机枪、通讯、工兵等四个研究室，专门从事参谋业务和特种兵技术的教学工作。

为了解决工农干部文化低，学习军事、政治比较困难的问题，在文化教育方面重点抓住扫除文盲和语文教学，并适当穿插一点射击原理、防毒知识等军事科学常识的课

目。当时的学员和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在职干部都渴望学习文化。他们利用反“扫荡”和大背粮行军途中的休息时间，积极学习文化，因而这一期文化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虽然教学与实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但在敌后经常要对付日寇的“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流动性很大。在這一期的八个月时间里，仅总校校部就转移过两次：一次从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一带转移到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一带；一次从黎城县又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一带。形势逼人，只有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才能坚持教学。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我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一百多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先后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八百多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抗大曾派出一部分干部参加战斗，从中总结与吸取对敌作战的经验，以充实军事训练的教材。因为抗大是个教育单位，八路军总部和主力部队都尽一切努力组织部队加以掩护，使抗大尽可能避免直接参加战斗，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从事教育工作，以保留和提高部队的战斗骨干。但是，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深入敌后办学的抗大十分痛恨，派出汉奸、特务四处侦察抗大的动向，声言要“消灭抗大”，这就使抗大不能不随时作好反“扫荡”反磨擦的准备。在“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中，日、伪军遭到惨重损失，于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日寇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黎城、襄垣、武乡一带，纠集

几千日、伪军袭击我后方，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山区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在这危急时刻，我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在洪岭一带阻击由黎城向西井突袭的敌人，打击和疲惫敌人，迟滞敌人前进，以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转移，争取时间，等待主力部队进行新的战斗部署，歼灭进犯的敌人。

十月二十二日拂晓，由抗大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和抗大第一团第三连（又称“青年连”）、第六连共五百多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在第二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占领了洪岭东南方公路两侧山上的阵地。上午八、九点钟，敌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沿着公路向洪岭我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当时抗大的武器装备很差，每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教学用的杂牌步枪，弹药也很少。但参战的连队除“青年连”是一批十五、六岁至二十岁的“小八路”，领导上有意把他们放在第二梯队配合作战，让他们在战斗中锻炼外，其余四个连队都是部队调学的连、排长和优秀班长，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战斗一开始，敌人即向公路右侧第一团第六连的阵地和公路左侧第二团第一、三连的阵地展开猛攻。这三个连队中老红军干部都占半数以上，战斗力很强。他们不怕敌人来势汹汹，沉着应战，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勇抗击进犯的敌人，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见攻击不下，竟卑鄙地向我阵地发射“催泪瓦斯”炮弹，借助“催泪瓦斯”的毒烟，发起第四次猛攻。我阻击连队见敌人使用化学武器，马上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继续坚

持战斗，再次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三个阻击连队以伤亡二十多人的代价，歼敌五、六十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节节抵御，边打边撤，天黑时全部撤离洪岭，经曹庄到达“三十亩”（地名）休息待命。

可是，当我阻击部队在“三十亩”一带休息、准备做饭的时候，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越过洪岭，占领曹庄，朝我“三十亩”方向推进。这时，我抗大第一团第三、六连已经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他们不顾一天来粒米未进，立即占领“三十亩”以南的高地一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晚上七点多钟，狡猾的敌人突然改变过去夜间不走、小路不走的活动规律，不走大路钻山沟，由步兵前面带路，炮兵牵着驮炮的骡马随后，偷偷摸摸地沿着山沟向“三十亩”悄悄逼近。我阻击连队严阵以待，待敌人钻进我们的火力圈时，一声令下，突然开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毙伤敌指挥官以下六、七十人。战斗开始时，敌人原以为我们是“土八路”（指游击队），当遭到我沉重打击后，才惊呼碰上“老八路”，慌忙丢下尸体，向黎城方向仓惶逃窜。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既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又掩护了校部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安全转移，避免了损失。击退敌人的进攻后，总校校部立即分东西两路：东路由何长工教育长和张际春主任率领；西路由训练部王智涛部长和抗大二团郭林祥团长、杨光池政委率领，趁夜摸黑翻越辽县芹泉附近一座荆棘丛生的摩天岭十八盘，摆脱掉“扫荡”的敌人，安全转移。

十一月初，敌人“扫荡”宣告破产，我东、西两路队伍

在冀西会合，总校校部即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的浆水镇。在庆祝反“扫荡”胜利的大会上，滕代远副校长表扬了抗二团、抗一团的阻击部队，并由郭林祥团长介绍了洪岭、“三十亩”阻击战的经验。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生动实际，使全校师生很受教益。

坚持敌后办学，经常处于战斗环境，流动性大，加之晋冀豫边区是刚创建不久的新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也刚刚建立，阎锡山军阀长期盘剥和日、伪军的蹂躏破坏所造成的经济凋敝，一时还难以扭转，因而使抗大在生活上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九四〇年二、三月间，抗大总校刚到武乡蟠龙镇一带时，有好几个月时间吃的尽是高粱、荞麦和黑豆。这种黑豆，本是牲口的饲料，而且因石磨少不能磨成面，只能用石碾压一压，非常粗糙，不易消化。但在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主食，不仅饭是黑豆，做菜也用黑豆，只是做菜的黑豆加点盐，以示区别。因为黑豆不好消化，许多同志都闹胃病。即使是这样的粗粮，也不是轻易可得到的，每次都要到距离驻地几十里外的游击区或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去背，而且要学校自己派人去收集，并在长达一百三十里的交通线上，设置十几个粮站，按敌情布置武装掩护转运粮食。为此，校部专门成立了购粮委员会，统一划分地区，组织购粮工作队，负责采购、收集，然后通知机关和各团发动全体同志都去背粮；有时甚至要停课一个时期，集中全力去背粮，形成大背粮运动。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间，总校转移到黎城，正是麦收季节，虽然有点麦子吃，但抗大人多，村庄石磨少，只能用碾子或石头把麦子压扁煮着吃，还是和粗粮差

不多。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总校转移到浆水镇后，食粮主要是小米，但此地柴火很缺，为了解决烧柴的困难，经常要组织大家上山砍柴、背柴。有一次文工团的同志砍柴误砍了漆树，发生皮肤过敏，很多人全身红肿，连衣裤都穿不上去，披着被单下山，形象吓煞行人，由此可见当时条件之困难。不过，经过一两个月的锻炼，大家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并摸索出一套经验，利用背粮、砍柴途中和休息时间，开展军政文化教育和文娱活动，使学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采，减轻劳动中的疲劳。

当时蔬菜和日用必需品也很困难，有时没有菜吃，不得不发动大家上山采野菜。以后，学校又自力更生，先后开设了豆腐坊、粉坊、畜牧场(喂猪、养羊)，并开办工厂，制作被服、鞋袜，开办合作社，采购经营日用品和学用品，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困难。同时，为了加强新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学校组织全校同志帮助群众抗旱，抢收抢种，坚壁清野；帮助地方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训练民兵、自卫队等地方武装。这样做既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也培养锻炼了学员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

紧张的战斗生活，艰苦的斗争环境，最能锻炼人，陶冶人的思想情操。所以，战斗越频繁，生活越艰苦，斗志越坚强，士气越高涨。在行军作战、背粮背柴途中，总是一路欢声一路歌；在劳动生产和课间休息时间，也是笑声朗朗，歌声扬扬：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

……”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它拼到底！”

这歌声多么高亢，多么激昂！它唱出了太行山上抗日战士杀敌报国的豪气，唱出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高尚的情操！

第六期正处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时期，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急需大批干部；到敌后特别是进展华中到新四军创办新的分校也急需大批干部，因此，这个时期组织变动和人员变动极为频繁。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在纪念抗大成立四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命令：调副校长罗瑞卿同志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继任抗大总校副校长。与罗瑞卿同志同时调出抗大的还有抗大第一团团团长苏振华同志，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同志、副大队长邓国卿同志等一批中高级干部。一九四一年初，又调出训练部长王智涛同志、宣传部长谢翰文同志等一批中高级干部去加强总部领导机关和充实主力部队的领导。

为了加强抗大分校的建设，在华北、华中地区培养部队干部和吸收当地知识青年参军，中央军委决定这一期再成立三个分校：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总校派出第一个华中派遣大队，由刘清明大队长、李干辉政委率领，去安徽省涡阳县北麻冢集加强华中新四军豫皖苏地区初建的第四分校。六月十三日，总校又根据北方局的决定，派出抗大第四团第一、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共九个连队，由第



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政治处主任铁坚等同志率领，前往山西涉县王堡，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十一月间，第六分校在武乡县蟠龙镇正式成立时，因洪学智同志调往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穰明德同志调回总校，总校另派刘忠、黄欧东同志接任）。十一月间，总校又从六月份由冀中军区调回总校的抗大第三团中，抽调了一百名教职员，组成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由洪学智、吴胜坤同志率领，去华中新四军盐阜地区，加强在江苏省盐城县新成立的第五分校。

抗大最早在晋东南建立的抗大第一分校，因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往晋东南，所以，他们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除留下一千多名新学员，由何长工、赖光勋同志负责组成太南留守大队，等待总校到晋东南后与总校合并外，大部分干部和少数学员由校长周纯全同志、政治部主任李培南同志率领，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到山东省沂水县孙祖、张庄一带继续办学。当年十一月，总校又派出原抗大第三团的四十五名教职员，组成山东派遣大队，由聂凤智、张英渤同志率领，开往山东省沂水县，加强第一分校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反“扫荡”反“磨擦”的斗争日趋尖锐，敌后斗争更加残酷，更加艰苦。党中央指示各后方机关、学校必须适应形势，更加紧缩，更加隐蔽。所以，抗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上述派出大量干部到华中地区创办新的分校和加强一些分校的力量外，八、九月份一部分学员就提早毕业，派回山西决死队或转学炮兵团。同时，总校领导机关开始紧缩编制，调出一大批干部到总政治部巡视团工作，或参加扩兵工作；其余的编余干部则成

立干部队，组织他们学习，待命分配到部队或分校工作。一九四〇年冬，总校在削减人员的基础上，根据今后训练任务的需要，颁布了新的编制：将原属第一、二、四团（第三团已大部分参加山东大队和第二华中大队，建制撤销）改为第一、二、三科，第一科为上干科，专门训练团以上干部；第二、三科为基本科，训练营以下干部。同时，校部的训练部撤销，分设军事教育科和政治教育科，直属教育长领导；政治部建制不变，撤销校务部，设经理处（后改为供给处）和卫生处，直接由校部领导。经过这次大整编，校部机关大大精简，层次减少，指挥灵活，更能适应敌后的战斗环境。为了提高学校的机动性，增强学校的自卫能力，改善学校的供应给养，总部特给抗大增配了一部分马匹，加强了警卫连的兵力和装备，并在供给处下面增设了一个管理连和营业部（包括工厂、合作社、豆腐坊、畜牧场），从而提高了粮食、给养的运输力量，减轻学校的负担，逐步改善了物质供应工作，使大家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工作。十二月十一日，总校特地成立了以滕代远副校长为首的点验委员会，领导和检查各部门、各单位执行新编制的情况，检查全校的装备、装具是否符合战斗要求，并教育全校同志养成切实执行编制、遵守命令的习惯。通过点验，使新编制更加落实，各项工作转入正轨，为第七期加强学校正规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第六期结业，学员分赴各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特为毕业学员亲笔题词：“努力工作，造成铁的干部，准备反攻”。这一期是在敌后边学习、边战斗、边总结经验中度过的，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据统计，

这一期总校与分校共培养干部一万四千零四十名，实现了党中央赋予抗大“培养我军建设骨干”的光荣任务。同时，还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创办与加强六个分校，使抗大的旗帜从黄河之滨飘扬到华中的江淮两岸，为抗大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加强总校正规化建设和分校领导的第七期

第七期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于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开学，至一九四二年二月陆续毕业，历时一年。这一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布置二十余万兵力阴谋围攻我江北新四军，另以二十余万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伺机进攻，反共声浪甚嚣尘上。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我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揭露下，至三月初即被迫收场。通过这场斗争，我们党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国民党则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在此期间，国际局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动闪电式的进攻，苏联展开了卫国战争；十二月八日，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国、英国同时进行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在德、意、日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战争时，日寇为巩固其“后方基地”，一方面继续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一方面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从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十一月，就先后

出动了十三万多兵力，分别对我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苏北、苏中等根据地进行“扫荡”，使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整个敌后斗争开始进入一个空前困难的时期。

面对这样艰苦、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对抗大今后的发展，给予了新的指示。军委的指示首先强调：“我们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党的分局及最高兵团首长负责，完全统一领导是不可能的。总校应当注意总结经验，指示方针，统一材料之编印，统一各科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接着，军委指示中对总校与分校的任务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总校“坚持在华北训练部队干部，着重训练上级干部，训练参谋人员，培养教员，有计划地编写教材，整理总结教育经验，加强对于分校的领导。”“各分校不仅办下级干部班，且应办上级干部班，过去军委及总政在延安集中办高级班，在抗大集中办上级班的计划，应有部分的变更。”

对于军委的上述指示，当时张际春主任曾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军委这一指示指明了学校在华北坚持训练部队干部的方针。华北是敌人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我八路军主力活动所在地，毫无疑义，学校在华北坚持训练部队干部，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对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支持和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接着，张际春同志详细阐明了总校本部着重训练上级

干部、参谋人员与培养教员的重要性。他指出，从领导关系说，八路军的干部有高级、中级、初级干部的区分。我们这里所说的上级干部是指相当于团及支队一级的中级领导干部。但三级领导干部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有了上面的正确领导，又有下面普遍的革命热情，如果中间一级没有健全的领导者，上下两端衔接不起来，整个党的路线与全部军事意图就无法融合和贯通起来。以华北地区之大，加上游击战争的独立性与果断性，中级干部的指挥能力便显得特等的重要。自干部大量提拔之后，团级、支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已经从一个单位和不大的范围提到更大的范围，由比较单纯进到比较复杂的领域。由于许多干部事前没有足够的政治准备，工作能力一时也难以提高，整个领导就在团及支队一级发生某种程度的阻碍，象电话线上的打结一样，上情下达与下情上映时，故障就从这打结上发生出来了。我们干部工作的责任，在于尖锐地看到这种薄弱的环节，用教育的力量，从速消除这种状态。所以，目前选择、培养、调剂干部的工作，应当十分注意于团及支队这一级干部。

张际春同志在讲到训练参谋人员的特殊重要性时说，目前参谋工作是军队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一个进步的军队为了指挥作战，为了研究战略战术，为了进行军事教练，为了整理过去的战斗经验，为了提高我军的军事水平，假如没有健全的参谋机关是不能很好完成其任务的。因此，参谋机关应当吸收一批有军事文化知识的学生出身的人进来，老的参谋人员应当加以训练，假若参谋机关都是一些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人员在办事，那是无法适应参

谋工作的。

张际春同志还指出培养教员和有计划地编写教材及整理经验的重要性。他说，在全军广泛开展培养干部的工作中，无论部队或学校本身，教员教授的人才都是缺乏的。各地分校纷纷来电报或书面请求派出干部；部队中轮训队、教导队的教育人员也很缺乏，从我们几次到部队了解工作时都知道这种情况。因此，有计划地培养教员、编写教材与整理总结经验，则是我们校本部应负的责任和今后奋斗的方向。

最后，张际春同志指出：“军委指明校本部应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帮助。分校散布在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地区中，虽然已确定分校在各战略根据地最高党政领导下进行其工作，但校本部应尽可能给予分校以领导和帮助。这无论对于经验的交流，教材的供应，干部的调剂补充，教育方针的统一确定等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他号召全校同志要“深刻地研究与讨论军委的指示。”

总校第七期开学时共有学员九百二十八人，都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团、营、连、排干部和少数班长、老战士。编为上干科和基本科两个科，上干科科长汪乃贵同志，政治委员李呈瑞同志，副科长赵玉珍同志；基本科科长胡汉标同志，政治委员雷钦同志，副科长吴恒夫同志。下分上干队、军事队、政治队各两个队，参谋队、敌工队、工兵队各一个队，共九个学员队。

这一期学员人数虽然不多，但质量比第六期有所提高。原因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总校曾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书”，肯定抗大创办以来招收的学员

质量是好的，同时，根据第六期招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抗大转到华北敌后以后，“虽然当地最高军政机关曾经严格规定入学条件，但由于部队中部分的不正确倾向和部队中自己随营学校、教导团、营等组织的存在及训练干部分工之没有严格划分，仍然不能遵照规定选送学生。有的部队甚至将运输员、饲养员、聋子，没有过过军队生活的老百姓，生病的及老弱分子，以及非常落后的分子也送来了；有的还没有入校就逃跑一批。因此学生来校后，由于程度参差，教育设施困难，不好编班，不好订教育计划，进步缓慢，成绩也微弱。”建议中央通知各部队严格掌握选送学员的条件。因此，这一期学员的质量较前提高。从学员的职务上看，第六期营以上干部数量很少，这一期营以上干部有九十八人，其中团级干部三十六人，营级干部六十二人。此外，连级干部一百五十四人，参谋、干事、秘书、科员、技术人员等机关干部二百八十六人，军事、政治、文化教员四十五人，排长、司务长九十人，班长、老战士一百一十四人，其他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地方武装干部）一百四十一人。第六期老干部数量很少，这一期老干部数量大大增加，绝大部分参加过战斗和地下斗争，其中参加过北伐战争的五人，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二百九十六人，参加过地下革命斗争和东北义勇军的三十五人，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的七十四人，参加过抗日战斗的二百八十九人。这一期党员的比例也比第六期高，占总数百分之八十，其中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入党的一百六十二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入党的四百二十四人；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入党的有一百零五人，候补党

员仅三十三人。学员质量的提高，就为这一期加强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来按军委指示，这一期还应多招收团以上干部或营级干部，但实际招生后连排干部还是占了多数，仍然要设立连排干部队。这是为什么呢？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总校在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书”中就曾经分析过以下原因：“（一）目前斗争的紧张，不可能有大量上级与高级学生集中学校受训。各个地区送学生来，因为地区分散与交通不便，亦不可能有多的学生送来；同时各个分校亦应尽自己的力量设立高级队。（二）为了总校实现对各个分校的必要领导，亦应有一部分直属初级队的设立，而作为领导的根据。（三）对于目前的学校力量（教员、教材、教法……等）说，实在说培养高级干部的能力亦非常有限，现在无论总校与分校，对于培养干部的能力上说，还是对于初级干部有把握些。”

鉴于上述情况，为迅速提高教员的水平，以适应今后部队发展的需要，学校特地抽调了八十名在职干部，成立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政治工作三个研究班，让他们集中精力专门进行学习和研究，提高水平，准备担负培养更多的高级、中级干部的任务。同时，为了使学校与部队建立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和部队对学校的要求，使教学工作更好地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这一期曾四次派出干部、教员到一二九师参观学习。他们深入部队收集典型战例及部队战斗、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提炼，形成比较系统的材料，以充实教学的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使学校培养的干部更适合部队的需



要，也使学员所学到的东西能够到实际中去运用。这样做，部队与学校双方都比较满意。

这一期是在我军取得“百团大战”伟大胜利之后开学的。日、伪军在遭到我军沉重打击后正在调整部署，准备进行新的反扑，所以，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河北邢台地区相对比较安定；下半年虽然日寇对我晋察冀边区重点发动“秋季大扫荡”，抗大二分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因敌人兵力不足，总校驻地仍少战斗。正因为这一年环境比较安定，所以滕代远副校长、何长工教育长、张际春主任等抗大领导同志特别强调总校的正规化建设，坚持“以教育为中心”，建立各科正规化制度，要求各个部门都围绕中心、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干部，无论是军事、政工或行政干部，大家都密切配合，协调一致为提高教育效果而努力工作，因此，虽然学校领导机构精简缩小，干部人数大量减少，但工作效率却大大提高，教学质量也较前期更好。就以教育计划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印为例。过去教育计划都由训练部门自行制定下发，这一期的教育计划则先由训练部门在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写草案，然后由校首长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详加讨论、修改，再分别抄送政治机关以及供给、卫生等有关部门，由他们提出政治工作以及供给、卫生的各项工作保证计划，再经校首长和有关部门领导审查修订，最后以命令正式颁布，在全校传达，贯彻执行。对于教材的编写更为重视，凡是教育计划上规定的课目，不论军事、政治、文化教材，都由校首长分工主持，召集各课目的教员集体讨论，推选专人执笔，再经集体研究修改，交由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通过，

以命令颁发进行教育。据统计，这一期共编印出版军事、政治、文化、卫生等各种教材四十一种，发行一万八千零三十六册。这些教材质量比较好，深受教员和学员的欢迎，不仅满足了总校与各分校的教材需要，而且还提供各部队使用。

由于教育计划制定得周密，教材内容充实，整个教育工作就较前几期更为正规。教员在课前都作了充分准备，有时还组织试讲、示范讲课等活动，提高教员讲课水平。讲课时注意联系实际，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按学员对象的不同程度，深浅适度，使学员更容易接受，同时注意对学员的课外辅导，避免个别学员的掉队。在学习方法上，经常以排为单位组织讨论会、辩论会、问答晚会或组织全队学员的大型讨论会。这样做能更好地开拓学员的思路，集思广益，把学习引向深入。在军事训练方面，军事演习的准备与组织指挥也比过去正规化。演习前对方案的研究制定、情况的设想与处置、干部的分工指导等等，都按教育计划的要求办事，一丝不苟，这就使学员通过近乎实战情况的演习，提高军事技术和组织指挥能力，收到更好的效果。一九四一年三月底，学校进行了第七期第一阶段工作的检查。检查结果说明学校正规化建设不仅大大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严肃组织纪律，贯彻各种条令，执行各项制度和严格军容风纪等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全校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当时敌后经济比较困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学校生活，全校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在经济开支上，提出了“节约一分钱，增加一份抗日力量”的口号，严格执行预

算、决算的审批制度，避免浪费。在生产上，号召各伙食单位，做到蔬菜、柴火自给。所以每天晚饭后，大家都自觉地到菜地锄草、施肥、浇水，每逢星期天都纷纷上山砍柴或外出背粮。

这一期全校还召开过两次很有意义的大会：

第一次大会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召开全校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历时三天。这次大会检查、总结了抗大总校深入敌后一年多来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根据当时的时局与军委赋予学校的任务，讨论如何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第七期教育任务的完成。大会要求每个学员“安心地学习，忠诚地工作，坚守工作岗位，求得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要求全校同志“在实际行动中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号召——增加知识，反对落后，提高党性，力求进步”。最后，大会改选了校党务委员会。这次大会对加强党的建设，保证第七期教育任务的完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大会是举行抗大创建五周年纪念大会。这是继在延安庆祝抗大三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又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

学校领导十分重视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为了全面总结抗大创办五年来的成绩与经验，由副校长滕代远等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专题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对五年来特别是深入敌后一年多来，军、政、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对工农干部与知识青年两种不同对象的教授法与学习法，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政治工作经验，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和事务人员的教育，以及供给、卫生等工作的

经验，都分别进行了研究、总结。然后分工专人执笔整理，集体讨论定稿，写出了长达四十余万字的《抗大五年来工作经验》一书，上报中央军委，下发各级干部和各分校，作为对抗大五周年纪念的献礼。

六月一日，在南峪村总校校部驻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会场右侧的山上矗立着用松枝结扎的大标语牌，上面写着“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八个大字。标语牌有两层楼高，从十几里外就可以看到，十分壮观。会场上布置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和中共北方局、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的题词，以及各兄弟部队、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赠送的一百多面旗帜和五十多份贺电贺信，五彩缤纷，使会场显得更加热烈隆重。朱、彭总司令的题词是：“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左副总参谋长的题词是：“锻炼铁的党的干部”；罗主任的题词是：“提高技术，提高学术，必须是与近代技术与新的科学化的学术结合了的军队，才会是真有力量的军队，愿抗大今后作更大的努力”；中共北方局的题词是：“用马列主义武装千百万青年”；野战政治部的题词是：“发扬抗大五年来的光荣传统，创造抗大新阶段，为党军培养大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干部而斗争”。

出席大会的有野政罗瑞卿主任和集总、野政、野供、北方局、联办、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党政机关、团体、学校、报社等七十多个单位的来宾三百五十八人；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还派来了代表团，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总校参加庆祝大会。

大会开始前首先举行阅兵式。由于开学以来强调了正规化，学员训练有素，受阅队伍的阵容更显得严整、威武。

阅兵毕，由张际春主任致开幕词，滕代远副校长作工作报告，何长工教育长致答谢词，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作指示。罗主任向抗大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求抗大培养出大批模范干部。模范干部的条件，首先要政治坚定、党性强，而军队里的干部党性更要强，因为军队拿着枪杆，脱离了党便会进行反革命；如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会产生象张国焘那样的家伙。第二，要求抗大每个干部、每个学员都要下个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者与专门家，在学术上有些研究。第三，要求抗大要特别注意政策问题的教育，要求每个抗大学生都要懂得政策，都能把政策正确地运用到实际中去。”罗瑞卿主任最后号召大家要爱护抗大，关心抗大，他说：“因为抗大是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宝贵财产，假如不爱护不关心抗大，就是不爱护党，不爱护党军。”罗瑞卿同志对抗大干部学员的三个要求，虽然已事隔四十多年，但对今天的院校工作和培养四化人材仍有指导意义。

在庆祝大会上，滕代远副校长代表总校首长表扬、奖励了五年来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各种模范干部和工作人员。其中有总校干部二百一十名，分校干部八十八名；总校战士、事务人员一百四十一名；总校学员九十名；还有已英勇牺牲的总校干部十九名、战士二名。

最后，大会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致毛泽东同志暨中共中央电》，汇报了抗大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坚决

表示，誓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永远高举着党的教育事业的旗帜，为创造大批坚强的革命干部，为建设铁的党军而斗争。”

庆祝活动历时七天。在此期间，白天举行运动会和展览会，晚上举行晚会。通过这次庆祝活动，充分反映了抗大创办五年来，特别是挺进敌后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一期总校开学时虽然只有九百二十八名学员，但开学后，为了提高总校与各分校干部、教员的水平，陆续举办了教员训练队和干部轮训班，分批轮训在职干部和教员。同时，为了提高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干部的质量，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和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又先后成立了地方武装干部营、地方干部队和一些短期轮训班。所以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七期毕业时，总校共培养了干部二千五百五十一人。在此期间，总校除了继续加强对原有六个分校的领导外，并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晋西北兴县附近的李家湾，以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建立了第七分校；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安徽省天长县以新四军江北干校留淮南的一个大队为基础，建立了第八分校。各分校与总校的关系较前密切，分校的教育计划和重大活动都向总校报告，总校也根据具体情况向分校派遣干部、教员，提供教材，并通过文件和《抗大》校刊交流经验，给予分校必要的指示和工作指导。这样，第七期抗大总校与各分校培养的学员总数比过去更多了，约计有万人以上。所以，在举行第七期毕业典礼时，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同志亲临大会讲话，赞扬抗大在敌后培养干部所取得的成绩，希望抗大毕业同学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到部队

去，到前线去，发挥骨干作用。毕业典礼后，因有的根据地还在进行反“扫荡”战斗，毕业学员只能根据形势的发展陆续分配。所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第八期已经开始招生时，第七期毕业学员才全部分配完毕。

## 储存干部、准备反攻的第八期

第八期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开始招生并陆续上课，五月一日正式开学，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全部毕业，历时三年半，是抗大创办以来学习时间最长的一期。这一期正处于国内外形势的大转折时期：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已从疯狂进攻逐步走向全面崩溃，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广大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日趋强大，最后夺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境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稳定其“后方”，以支持它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一面对国民党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诱降政策，一面集中其主要兵力对我敌后根据地连续不断的反复的“扫荡”。至一九四三年，日寇最多时曾以它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兵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仅以其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的兵力监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留在后方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利诱，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变成伪军，配合日寇进攻我们；而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顽固派则一再制造磨擦事件，仅在西北一地就集中了四、五十万兵力包围封锁我陕甘宁边区，并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日、伪、顽的夹攻与封锁下，我抗日根据地由原来九千多万人

口的地区缩小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由五十万人减少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有一段时间曾经弄到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36 页）

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熬过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最艰难的岁月，从一九四三年开始逐渐好转，到一九四四年以后，我军即先后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普遍发起攻势作战，袭击日、伪军据点和交通线，收复了许多城镇，恢复并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人民的力量。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我们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拥有一百万平方公里、九千九百五十万人口、包括十九个省份的广大地区，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武装也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军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乘胜进行大反攻，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从战略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岁月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指引革命航船冲破惊涛骇浪，绕过暗礁险滩，驶向胜利的彼岸。面临黎明前的黑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并从



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作好战略反攻的准备。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抗大第八期把“艰苦地坚持教育，保存和培养干部，准备反攻”作为主要任务，利用各部队和地方机关精兵简政的时机，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吸收到抗大学习，通过长期培训和短期轮训的办法，加以培养提高。

这一期学习时间比任何一期都长，学习环境和学校的组织编制也几经变化，基本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在敌后坚持办学；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三年三月自敌后返回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直到抗战胜利抗大完成其历史任务为止。

### **第一阶段：坚持敌后办学。**

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路军各部队开始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着手进行整编，抗大总校就陆续接受新学员。四月二十八日，根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的决定，原设在山西省武乡县一带的抗大第六分校除留下一个“太行大队”归一二九师直接领导，坚持在晋东南继续培养基层干部外，其余的教职学员与总校合并。五月一日，总校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举行第八期开学及附设陆军中学成立典礼，并于五月十四日正式上课。

这一批学员大部分是八路军总部直属队、一二九师、

晋冀豫军区等机关、部队的干部和少数新吸收的抗日根据地知识青年及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大学部仍为上干科和基本科两个科，领导干部未变。上干科四百五十九人，其中有三个团、营干部队，二百六十一人；一个营、连知识分子干部队，一百二十一人；一个轮训地方武装干部的短期轮训队，七十七人。基本科有三个营、九个队，一千零六十七人，都是连、排干部和少数班长、老战士。此外，还有一所附设陆军中学，五个队，六百三十人，都是十六岁至二十五岁的年轻班、排、连干部和老战士。全校学员共计二千一百五十六人。

这批学员大多是从主力部队和游击队选拔来的工农干部，他们经过长期的实战考验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政治水平也比较高。但他们因长年驰骋疆场，戎马倥偬，学习时间很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影响他们军政素质和工作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未能适应加强部队建设的需要。因此，在制定教育计划时，就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规定上干科和基本科的教育时间都是两年，陆军中学的教育时间为三年。除了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外，第一年都按文化程度编队，主要进行文化教育，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课程；第二年才按他们原来的职务、工作性质编队，安排军事和政治理论课程，提高其军政水平。对于知识青年队则采取另一套教育办法，学制还是两年；第一年着重组织他们到农村和连队中去参加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使他们更好地接近工农兵群众，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同时穿插进行一些政治时事教育；第二年才进行军事课和政治

理论课的教育。还有一个地方武装干部队，只轮训三个月，主要是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政策及民兵中的军事、政治工作。上述教育计划后来虽然因参加反“扫荡”战斗、学校转移和参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受到一定影响，但整个教育时间延长，毕业时还是基本上达到预定的要求，收效良好。

抗大挺进敌后办学，培养出成千上万优秀的军政干部。他们活跃在敌后各个战场，带领部队和民兵、群众，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打伏击，毁碉堡，扒铁路，炸桥梁，拔据点，打得日、伪军人仰马翻，魂飞胆丧。所以，日寇把抗大看成是埋在他们心脏地区的一颗炸弹，下狠心要“消灭抗大”。当时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曾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象输红了眼的赌棍似地押上了大笔赌注：“宁肯牺牲二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出动五、六万兵力对我华北的冀中、太行、太岳、晋西北等根据地进行了野蛮的“拉网大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在这次“拉网大扫荡”中，抗大总校很自然地成为日寇进攻的重点目标之一。五月二十一日，日军出动四路兵力合击总校驻地浆水镇。北路之敌，由河北的临城、赞皇经宋家庄向浆水猛扑；东路之敌分为两股，一股由邢台向浆水直插，一股由沙河迂回向浆水南面的路罗镇急进；西路之敌，从山西的昔阳、和顺经松烟向浆水合击。四路敌人来势汹汹，大有“踏平浆水”之势。

但是，我们抗大对敌人这一招早有戒备。还在第七期

时就曾反复研究过前线大量的战例，制定出一套反“扫荡”的作战预案。根据历次战斗的经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跳出敌人合击圈的时机选择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跳早了，敌人容易发觉，调头尾追；如果犹豫不决而跳晚了，则有遭到敌人合击的危险。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当敌人进至它合击点前约一日行程距离的这一线时（当时通俗地称其为“利害变换线”），我们就要当机立断，果敢而勇猛地“起跳”，从两路敌军中间的空隙穿插出去，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这次敌人四路合击，我们也采取这种“敌进我进”擦邦而过的战法。当敌人进到“利害变换线”时，校首长根据敌军队形比较密集的特点，将全校分为几个独立行动的分队，分途转进：基本科有一部分向北转移，凌晨就突过敌人的合击圈，插到北路之敌背后；还有几个队向南转移，当时未能突破敌人的合击圈，但他们都是连队的基层干部，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就在敌人的合击圈内利用山地分散游击，与敌人周旋，除个别连队受到一点损失外，大部分连队都先后寻隙跳出了合击圈。上干科则西上太行山，虽然在行进中遭遇敌机轰炸，但无损失，安全转移到西路之敌的后方去了。总校校部开始向西南方拐儿镇、黄泽关方向转进，发现敌军在前面不远，马上折向东行，在路罗镇、浆水镇一带与敌人兜圈子。因校部非战斗人员多，物资多，行动不便，为了缩小目标，提高灵活性，校首长决定，供给、卫生等部门就地分散隐蔽，校部机关人员分成三路，每路约百余人，由滕代远副校长、何长工教育长和张际春主任各带一路，分途转进，然后在王莽寨山谷会合，乘夜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到达内邱县境休

整。此时才得知陆军中学在向路罗川以南转进时，途中与日寇一个大队遭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奋战，校长史紫千等几十位同志英勇牺牲，大部分同志胜利突围。学校运输队因没能跳出合击圈，损失骡马数十头。而全校大部分队伍都先后突围，安全转移。

抗大总校在晋、冀边境与敌人周旋了两个多月，边战斗边教学。在我华北军民歼灭日、伪军一万七千余人，彻底粉碎敌人“拉网扫荡”的凯歌声中，胜利地返回浆水镇，继续进行正常的教学。党中央得悉抗大总校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粉碎了敌人“剿灭抗大总校”狂妄计划的捷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特来电祝贺。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在辽县不幸牺牲。八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滕代远同志继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升任张际春同志为抗大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升任何长工同志为抗大副校长。

华北日寇在“拉网扫荡”失败之后，对我根据地又采取所谓“蚕食政策”，在平汉路西侧我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强拉民夫修碉堡，筑封锁墙，挖封锁沟，企图以此办法，逐渐向我根据地推进、蚕食，缩小我根据地。抗大总校驻地浆水镇、将军墓周围的邢台、内邱、临城、武安、赞皇、和顺等城镇都有敌人。日、伪军妄图用“蚕食”的办法吃掉我们，到处修碉堡，向我们步步逼近。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总校离敌人最远的地方只有三十华里，最近的仅八华里，对我们的威胁很大。七月十一日，为了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蚕食斗争，总校派出基本科的第三、八、九连和校部警卫连、通讯排约四百多人，组成反蚕食斗争挺

进大队。由基本科副科长吴恒夫、三营营长王诚汉等同志率领，配合地方武装和当地民兵袭击敌人据点，在十五天内作战四次，连战皆捷，毙伤日、伪军三十余人，俘虏伪军和伪政权人员十二人，缴获步枪七支，截获伪军抢掠群众的牲口一百五十九头，解救被敌人掳掠的民夫七百余人，并缴获不少军用品和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在这次反“蚕食”战斗中，两次内邱伏击战打得最为出色。七月十九日清晨，我抗大反“蚕食”斗争挺进大队一支小分队深入内邱敌人碉堡公路网活动，恰遇柳林镇敌军数十人，押送运输队民夫数百名路过申家峪，我埋伏的小分队立即出击，战斗四十分钟，击毙日寇小队长一人，日军五人、伪军五人，俘虏伪军七人，缴获步枪六支，牲口四十九头，其它军用品一部，解救民夫三十人。我仅轻伤二人。当天上午十时，我深入内邱的另一小分队，配合内邱独立营在刘家沟合击敌人另一支运输队，杀伤日、伪军二十余名，俘伪军一名，缴获牲口七十四头，步枪一支，军用品一部，解救民夫二百余人。内邱一带的日、伪军经我连续打击后，不敢轻易行动，我即乘胜宣传、组织群众，平沟毁墙，进行反封锁，维护了总校及驻地群众的安全。在此期间，日寇在我基本科三营驻地将军墓以东八华里的一个村庄修筑碉堡，企图在此设置据点，把我们挤走。总校首长决定针锋相对，趁敌人还没有把碉堡修起来，就把这股敌人撵走。当即命令三营营长王诚汉同志带领一支小分队乘夜袭击了这股敌人，把它撵出三十多里外，并缴获敌人修筑碉堡的铁轮大车、牲口、木料以及饼干、汽水等不少食品。但敌人仍不死心，不久，又连续两

次企图在此地修建碉堡，但每次都被我们打跑了，始终没能建成，从而保证学校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进行教育工作。

## **第二阶段：返回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一九四三年一月，党中央决定由何长工副校长率领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张际春同志调任北方局宣传部长。抗大的教职学员听说要返回陕甘宁边区，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心情十分激动。但想到即将离开抗日前线，告别几年来在敌后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战友和群众，惜别的心情又油然而生。此时，太行山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显得格外亲切，令人眷恋。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总校除分配一部分干部、学员留在晋冀豫边区工作，陆军中学由任白戈校长、陈鹤桥政委带领，暂时留在浆水镇继续进行教学外，其余一千多名教职学员冒着“三九”严寒，踩冰踏雪向陕北绥德进发。当队伍来到山西省辽县桐峪镇时，彭德怀副总司令特地赶来送行，并向总校直属队全体同志讲了话。彭副总司令在讲话中，简要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之后，着重讲述了华北地区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抗日根据地大肆烧杀抢掠，实行封锁、“蚕食”政策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曾一度使我们的根据地大大缩小。但是这两年我们采取自力更生、增加生产的各项有效措施，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经济攻势与军事攻势相结合的人民战争，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把敌人又一步步地挤出去，渡过了相持阶

段最困难的时期。而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虽然开始时气焰嚣张，但是现在它的攻势已大大地减弱，处处遭到失败，形势对它极为不利。今年也是它不吉利的年头，它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已是强弩之末，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一定会很快恢复并继续扩大，抗战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最后，他对大家表示欢送，希望大家返回陕甘宁边区以后，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为迎接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作好准备。彭副总司令的报告给大家以很大的鼓舞，使大家对敌后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继续向陕北挺进。

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一带到陕北，要横跨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省界，通过白晋公路、同蒲铁路、太汾公路、离岚公路、万石公路和汾河等七道封锁线，特别是同蒲铁路到汾河西岸这一带封锁线，敌人碉堡林立，日、伪军日夜巡逻，封锁十分严密。我们要穿越这一百二十多里的敌占区，并在山西平遥县敌占区内一个镇子里我游击队一块称为“小根据地”（实际上是我们“堡垒户”的几个大院子）内隐蔽一天，再继续通过封锁线，行动更加困难。但抗大总校在主力部队、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进行了周密组织：首先，由上干科副科长赵玉珍、组织股长邢亦民同志带领上干科干部四五十人和警卫排三十多人作为先遣队，负责侦察敌情，与接送的兄弟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建立了南北两条交通线，安排整个队伍由山西太谷东南方下太岳山后，就分两条路线从太谷与平遥之间通过同蒲铁路和汾河封锁线，南线到达汾阳与文水之间的三道川后，进入晋西北吕梁山八分区根据地；北线到



达交城与文水之间的草张头后，也进入晋西北吕梁山八分区根据地，这就为全校四个梯队开辟了通路。接着，何长工副校长率领校部直属队约二百人为第一梯队，携带电台，经常与接送的兄弟部队密切联系，从南线通过封锁线，并指挥后续梯队行动。上干科李呈瑞政委率领两个学员队二百余人作为第二梯队；基本科雷钦政委率领两个学员队二百余人作为第三梯队；校供给处张济民处长、张澄波政委率后勤、卫生部门三百余人作为第四梯队，根据敌情变化及接送部队的安排，分别从南北两线通过了封锁线。由于侦察、接送工作做得好，何长工等各级领导同志指挥灵活，队伍行动隐蔽、迅速，各梯队在敌人的碉堡群中寻隙穿插行进，历时四十多天，行程二千多里，终于在三月上旬胜利地西渡黄河，回到了离开四年的陕甘宁边区——陕北的绥德县。总校到绥德不久，彭德怀、刘伯承同志回延安开会也路过绥德，顺道看望了何长工副校长等抗大的同志。两位首长很风趣地赞扬说：长工同志，你真“神”啊，过去在红军九军团时你就很会钻；这次你带抗大一千多人，通过一百二十几里的封锁线，还在敌占区住了一夜，既没有暴露，又没有损失，硬是给你们钻过来了。你们真有办法，实在了不起！

总校到达绥德前，原留在延安的第三分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改称军事学院）已奉命先期来到绥德。总校到达绥德后，原驻晋察冀边区的第二分校和原驻晋西北兴县的第七分校，也先后调回陕甘宁边区。经党中央决定，总校与原三分校（军事学院）以及二分校、七分校的一部分合并（当时曾使用过一段“军事学院”的名称，不久仍恢复

抗大校名)，除各校原有的一部分学员外，又陆续接收了包括陕甘宁边区以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各个敌后根据地的部队与地方机关、学校送来延安学习的一部分干部。全校学员达六千余人，先后编为五个大队，校部设在绥德县城的西山寺。

总校与三个分校合并之初，由于教职学员刚从敌后回来，经过长途跋涉，比较疲劳，学校组织机构又处于进行改组调整的过渡阶段，所以全校人员的情绪不很安定。党中央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及时任命徐向前同志为代理校长，李井泉同志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长工同志为副校长，彭绍辉同志为副校长兼第七分校校长，徐文烈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并决定四、五、六月份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整编工作。经过整编，校部下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秘书科、管理科及供给处、卫生处；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保卫科、总务科，机构比较精简。

学员一般以原来的职务编队：一大队下属八个队，由原总校上干科两个队，原二分校高上科一个队，原七分校和原军事学院两个上干队及原冀鲁豫干部一队组成，大队长韩先楚同志，政治委员高兰亭同志，政治处主任益余元同志；三大队下属八个队，由原总校基本科两个队，原军事学院两个队，原二分校两个队组成，大队长赖光勋同志（后为徐绍华同志），政治委员雷钦同志，政治处主任涂锡道同志；四大队下属九个队，由原七分校三个连级队，前后方新生三个队及白求恩学校三个队组成，大队长王泮清同志，政治委员许凤翔同志，政治处主任张义之同志。一

九四四年春，原在晋察冀边区的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四个队和一个骑兵区队转移到陕北，也并入总校，编为第二大队，大队长李钟奇同志，政治委员方国南同志，政治处主任黄作珍同志。不久，因一大队人数太多，又将原第二、第七分校上千科的营、团干部分出来，与从敌后八路军、新四军选送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合并，组成第五大队，调三大队大队长赖光勋同志任大队长，丁国钰同志任政治处主任。

绥德地区原来就耕地少、人口多，这时骤然增加六千多人，粮食、住房都发生困难，使校址不得不作适当的分散。除校部领导机关驻绥德县城西山寺外，一大队分驻绥德城外二十里铺，二大队分驻清涧县城，三大队分驻瓦窑堡，四大队分驻子洲县双湖峪。后来，新成立的五大队也驻绥德县城校部附近。

在学校进行整编的同时，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四、五、六三个月政治工作指示》，强调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迅速稳定情绪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生产建设，准备转入安定的教育阶段。这时，全校教职学员在“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下，一起行动起来，投入生产安家的劳动中去。宿舍不足，自己新挖了近两百个窑洞；课堂不够自己盖，操场不够自己开，仅建设校舍一项，就节省材料、工资九十万元（边币）<sup>⑩</sup>。为了解决粮食、蔬菜等生活上的困难，大家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掀起开荒生产热潮。因为当地可耕地太少，平均每人还不足两分地，大家就创造了“麻雀战”的方法，在驻地周围五里之内到处寻找可以开垦种植的零星边角土地，东一丘、西一垄，大的几方丈，小者几方尺，三棵白菜、两棵南瓜便成一丘，

积少成多。就拿四大队来说，上级分给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四百五十亩，而他们自己零星开垦的土地就达二百三十亩。各大队都以这种打“麻雀战”的精神，多开垦了土地七百二十一亩二分一厘。这一年，全校农业生产，加上捻毛线、织麻袋、做鞋、编筐、养蚕等副业生产，就收入二百九十八万九千四百五十元，从而初步改善了学校的物质生活，并为一九四四年参加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

一九四三年六月，国民党顽固派胡宗南调动四十万兵力包围我陕甘宁边区，并多次进行挑衅，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激起陕甘宁边区和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纷纷集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为了迎击敌人的进攻，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保卫边区，抗大在党中央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指示下，进行了紧急备战活动，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作好战斗动员；把原来的教学机构，改为战斗机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战备教育和战备训练，很快扫除了学校返回陕北后出现的和平麻痹、生活散漫、斗志松懈等不良倾向，使全体教职学员振作起精神，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学习、生产和工作。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很快被粉碎，当形势渐趋缓和之后，整风运动便开始了。

从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后的两年中，抗大主要是进行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开展文化教育、学习“七大”文件等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进行整风运动。

抗大整风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历

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工作比较充分。早在一九四二年学校还在华北敌后时，总校和各分校就已经开始组织干部学习整风文件；一九四三年三月回到陕甘宁边区以后，便结合政治教育，组织教职学员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大家对整风运动伟大意义的认识。七月十五日，学校又举办了整风干部训练班，集中校直属队各机关和各大队的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取得经验，提高思想和政策水平，为运动的全面开展培训好骨干。

运动一开始，为加强领导，根据上级的规定，由徐向前代校长、李井泉政委、何长工副校长、徐文烈副主任及各大队政委组成抗大总学习委员会，以徐向前代校长为书记，负责领导全校的整风运动。总学委会下设秘书处，有主任一人，秘书四、五人，在政治部办公，负责总学委会的日常工作。校部直属队和各大队分别设立学委会分会。直属队以党的分总支委员会作为学委分会，由分总支书记为学委分会书记，下设秘书二人；各大队则由大队长、政委、政治处主任等三至五人组成学委分会，由政委任书记。各连队党的支部委员会即为整风学习干事会，领导整个连队的整风学习。

在整风运动初期，全校同志在学委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整风文献，联系思想实际和教学工作实际，自觉地对照检查。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开展认真的和风细雨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自己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名利地位观念、不安心学校工作以及教学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等缺点错误。同时，每个同志本着对党忠诚坦白的态度，写出了自传，个别历史上有些政治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的同志，也主动作了交待。运动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可是，从十月中旬到十二月下旬，由于康生在延安掀起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极“左”歪风刮到了抗大；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派到抗大指导运动的工作组又竭力推行这一套错误的审干方法，下令全校开展“全面突破”，要求在几天内就要“突破”多少特务嫌疑分子，为促使其坦白交待，进行所谓“示范坦白”、“五分钟劝说”，号召“特务分子”上台“即席坦白”等等，大搞“逼、供、信”，因而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幸好，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抗大总学委会召开了整风工作总结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根据党中央提出的“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九条方针，总结经验教训，反对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错误方法，作出了纠正反特扩大化严重错误的决定，立即停止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入以专职保卫干部与骨干、积极分子相结合的甄别复查工作，召开大会宣布摘掉被错斗的一些同志的帽子，赔礼道歉；对有些历史问题的同志，实事求是地作了结论，让他们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对少数问题复杂一时难以弄

清的干部，另专门成立一个干训第四队，继续进行甄别审查。而对大多数教职学员，则组织他们继续学习文件，听报告，座谈讨论，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到一九四四年春耕季节到来后，全校即投入大生产运动，实行半天整风学习，半天生产劳动，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下旬，整风学习才全部结束，全校转入正常教育。

这次整风运动，虽曾一度发生过“左”的错误偏向，使运动遭到一些损失，但总的看来，整风运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收到很大成效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重要报告中指出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6页）诚然，这次整风运动确是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对加强干部的思想改造，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抗大端正学风，进行教学改革，使理论与实际更紧密地结合，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加强学校建设，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件大事是一九四四年年的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四年春，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

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抗大在回到陕北绥德以后，已经开始了“自己动手，建立革命家务”的生产运动，为生产自给打下了一定基础，此时，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持半天整风学习、半天生产劳动。各大队驻地附近的土地都被群众开垦完了，抗大不能与民争利，就把队伍开到几十里外的山沟里去，开垦生荒地。这种没有耕种过的处女地，特别肥沃，产量更高。全校同志人人动手，个个参加，起早摸黑开荒、下种，共开荒耕种七千四百三十一亩。当时正遇天旱，大家又挑水抗旱，拾粪积肥，共捡粪肥七十六万余斤，保证增产增收。为了改善生活，各伙食单位还利用“打麻雀战”开的边角地块，种瓜种菜，饲养猪、牛、羊、鸡、兔等家禽家畜，仅养猪就有一千一百七十四头。同时，自己学会生豆芽、磨豆腐、做豆酱、腌咸菜，基本上做到菜、肉自给。此外，学校还开办酒精厂、畜牧场、豆腐坊、铁木工场、缝衣厂、印刷厂，组织开挖小煤井，并进行纺纱织布，捻毛线，打毛衣，织手套、毛袜，造粉笔、肥皂，编筐子，打草鞋等手工业生产。还开设合作社、商店、货栈，经营商业。据统计，全校在十个月劳动中共创造了四亿七千六百一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九元的财富。生产自给运动不仅解决了学校的经济困难，改善了学校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提高了大家的劳动观念，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当时大家一致反映，从抗大创办以来，大生产运动以后的物质生活比任何时候都好，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

第三件大事是进行文化教育和学习党的“七大”文件。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取得整风与生产双胜利之后，



学校转入正常学习。由于这一期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低，其中还有不少文盲和半文盲，这就给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带来不少困难，也闹过不少笑话。在敌后一次反“扫荡”时，部队转移要“空室清野”，有个司务长写张条子请村干部把公粮埋起来，以免被敌人抢走，但他把“埋”字错写成“卖”字，结果村干部按他的条子办，“把公粮卖了”。反“扫荡”胜利后，队伍返回驻地，司务长向村干部要公粮，村干部把条子拿出来给他看，才知道闹了误会。这次转入正常学习后，有一天，文化教员布置作业，要求每个学员写一篇最近的日记，规定不会写的字可以划“○”代替。有个学员写了这样的日记：“我○了个毛○去○○，毛○○了，我把他○了。”教员看了莫明其妙，问他什么意思？学员说，前两天“我牵了个毛驴去驮肉，毛驴死了，我把它杀了。”象这样的例子不少，所以，许多学员和文化程度低的在职干部多年来都渴望学习文化。这次进行文化教育，他们有了机会，都抓紧时间积极学习，开展学习互助，很快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到毕业时基本扫除了文盲，不少干部还达到高小程度，学会看书报文件、做笔记、写书信，为进一步学习军事、政治，提高工作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制定的正确路线，鼓舞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会刚结束，学校领导立即对全校同志进行传达，组织学习大会文件，使大家明确，当时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决战，

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随时准备接受党给予的战斗任务，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

第八期的学员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都得到全面提高，成长为战略反攻阶段和解放战争中一支坚强的骨干队伍。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大反攻的需要，也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后开创新局面的需要，第八期学员六千多人全部毕业，大部分学员当即分赴各个抗日战场，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历时九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完成了它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学员奉中央军委命令，由何长工同志率领从绥德出发，经晋绥、晋察冀、冀察热辽等边区，向东北进军，一九四六年二月底到达通化市筹办东北军政大学。其他各分校，也先后筹办华中、华北、华东等地的军政大学，担负起培养新干部的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国后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 注 释

① 第一步兵学校：为纪念在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彭湃、杨殷烈士，又命名为“彭杨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政委刘西平同志，校址设在九堡。

② 第二步兵学校：为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烈士，又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校长林野同志，政委张际春同志，校

址设在零都。

③ 特科学校：这是培养特种兵初级干部的学校，下设机关枪连、炮兵连、工兵连。校长胡国杰同志，政委袁血卒同志，校址设在武阳围。

④ 大相寺会议：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率领“抗日先锋队”东征胜利返回陕北后，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开了两三天，毛泽东同志作了东征战役经验的总结报告，高度评价东征胜利的重大政治意义；周恩来同志作了政治形势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号召全军指战员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高潮的到来。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作出决议，要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同时，会议还决定红军西征，组织了西征野战指挥部。

⑤ 辩证唯物论：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二期讲授哲学课时，总的课程题为“辩证唯物论”，其中包括：“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论辩证法”等三章，各章又分为若干小节，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揭露和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对提高抗大教职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这个讲授提纲的主要组成部分。

⑥ 校党务委员会：它不是一级党委，其任务是负责批准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和解决党内纠纷。

⑦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由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我们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蒋介石政府强迫解散。在解放区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⑧ 抗日决死队：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之下新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亦称“新军”。

⑨ 华北联合大学：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全部和安吴堡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的一部分合并组成的大学。

⑩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是一九三六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在我山西地下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抗日团体，简称“牺盟”。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

⑪ 边币：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银行发行的流通券。本文所述货币数目均以边币计算的。

##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

——中联部八年

（1958年10月——1966年12月）

### 一、初到中联部

（1958——1960）

#### 部里的三项任务

一九五八年五月，我由南斯拉夫回国，由于曾为南共说过几句实事求是的话，接受了外交部高干会议的批判，又在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就靠边呆着，心情当然是很不舒畅的。正在这时，王稼祥同志极力推荐我到 he 主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去工作。中联部的工作主要是同外国兄弟党打交道。王稼祥同志考虑到我是中央委员，与外国兄弟党交往时具有一定的身分，同时我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对这一工作比较熟悉，也能胜任。长期以来他就对我较为了解。在我刚刚受了批判，思想上正有负担时，他建议我到 he 那儿去工作，不仅表示了他对我的信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对当时这场批判的态度。可是我那时思想上还有点疙瘩，在了解到中央正在考虑调动我的工作，我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写了封信，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次调我到中联部工作，是不

是因为我在外交部犯了错误，呆不下去才调动的？安子文同志接信后，找我当面作了解释，说这次调动不是因为我的“错误”，主要是由于中联部的工作需要，他认为我去是合适的，也鼓励我去。听了他的解释和动员，我也就放心了，服从了组织决定。这样，在建国以后我工作的第一个八年——外交部八年，就正式结束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我到中联部报到，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当时部长是王稼祥同志，副部长已有刘宁一、李初梨、赵毅敏和许立同志。我去后不久，李初梨同志因身体不好离职休息了。熊复同志开始是秘书长，六十年代初也是副部长。王稼祥同志是在成立中联部时就担任部长职务的，“八大”一次会议以后又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联部部长。部里的日常工作由我们几个副部长负责。我主管的是自己较为熟悉的苏联和东欧方面的工作，又担任了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十年动乱前期“红”极一时的王力，那时也在中联部，起初他只是一个搞对外宣传工作的处长，六十年代结识并投靠了康生和陈伯达，很受他们的赏识，成为当时“反修”写作班子的一个活跃人物，“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足了风头。只是后来又被林彪、江青一伙抛了出来，成为他们的“替罪羊”之一。他的这一结局应该说主要还是由于他自己错误的结果。

中联部经常的工作，第一项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向中央作出报告和提出建议。这是主要的工作，每天都要阅读和审批各种文件和情报资料，并在一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和提出相应的工作方

案。第二项是负责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会谈并陪同访问，这也是经常性的工作。接待任务繁重的高峰是一九五九年我国十周年大庆，各友好国家的首脑和各国兄弟党的领袖，大批地应邀来到我国参加庆祝活动。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是成员之一。按照分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和所有处于非执政党地位的兄弟党代表团，都由中联部负责接待。所以我们那时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事后周总理还表扬了我们，说中联部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好，热情而有秩序。中联部的第三项任务是出席外国各兄弟党的党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从我到中联部直到十年动乱初期被停止工作的八年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出国几次，苏联、东欧去得最多，西欧和拉丁美洲也去过。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大会，我基本上都参加了。与苏共发生分歧后，又参加了几次中苏会谈。在这些活动中，既有初期的与各兄弟党的友好交往与增进相互了解，也有后来的同一些党的针锋相对的论战斗争。这些工作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取得了不少知识、经验以至教训。

### 出席波兰党“三大”

我到中联部后出席的第一个外国党代表大会，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尚未恶化，国际共运中的分歧也未公开化，我们同各国兄弟党还保持着一定的友好关系。我党出席波兰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是中央副主席朱德同志，团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同志、我和我国驻波大使王炳

南同志。三月六日，我们与波兰驻我国大使基里洛克同机离京，八日到达华沙，十日参加了波党“三大”的开幕式。和我们同时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四十多个兄弟党的代表团。在大会上受到特别欢迎的除照例有中苏两党的代表外，还有古巴的共产主义政党——人民社会党的代表，两个月前古巴才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所以当时他们很引人注目。当大会主持人哥穆尔卡宣读到中国、苏联和古巴几个党的代表名单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三月十一日，朱德同志向大会宣读了我党中央致波党“三大”的贺电。他在致词中赞扬波兰党近年来击退了国内反动力量，纠正了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保卫了马列主义的纯洁性等等。苏共代表团团长是伊格纳托夫，他在大会上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这些话看起来都是很平常的，实际上已反映出一些问题，因为自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各兄弟党之间以至国际共运中，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虽然没有发生公开分歧，但是在各党的言论中已经各有侧重，并且话里有话了。波兰这次党代大会也是这样，大家都心中有数，只是不便明说，因此会议开得还比较正常，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情况。

大会于三月十九日顺利结束。会后我和王炳南等同志应邀到波兰的卡托维兹和克拉科夫参观访问，接待我们的就是后来取代哥穆尔卡的盖莱克。他那时是一个地方的党委书记，给我们的印象还不错，似乎是个精明能干的人物，却没有料到他最后的下场。

## 出席英共“二十六次大会”

在波兰的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代表团就兵分两路，一路由朱德同志率领，加上由国内赶来的习仲勋副总理和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同志，组成新的代表团转赴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另一路以王稼祥同志为首，加上我和张香山、俞志英同志，组成我党出席英国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转到了伦敦。当时我国同英国只有代办级的外交关系，我国代办是宦乡同志。我们代表团就住在代办处内，每天从代办处赶到英共“二十六次大会”的会场去，俞志英同志担任翻译。英共不是执政党，当时全党只有二万多党员，英国又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们大会的规模和气氛当然就比不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会了，连我党代表团在内，只有十八个兄弟党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于三月二十七日开幕，英共名誉主席加拉赫主持了会议，英共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等作了报告，讲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争取工人阶级的生活权利和国际和平。他们在讲话中曾经把资本主义世界及其统治者，形容为“一个十分危险的、不想死的、却又是患了病的制度和患了病的代理人”。二十八日王稼祥同志代表我党向大会致了贺词，对他们争取实现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表示了支持。当时，英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形式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同我党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在大会的发言中也有所反映，不过还只属于在内部平静地发表意见，没有形成公开的争论，两党的关系也还是友好的，所以这次大会开得



也还正常。

会后宦乡同志安排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在伦敦作些参观访问，其中一项是到伦敦郊区的一个农场访问。宦乡同志同那个农场主相识，我们去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这处农场耕种了约一百公顷土地，种的是甜菜等农作物，却只有四个劳动力。农场主父子俩是主要劳动力，又雇用了两个农业工人。农工各有自己的一幢小楼房，同他们的家属住在一起。耕作活动全靠机械，场里拥有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械。同我国的农民比起来，他们的劳动相当轻松，收入及生活水平却不低，这情况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一些新的特点。参观访问，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状况及社会生活，增加了一些了解。事隔二十多年，那里的情形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那个“患了病的制度和患了病的代理人”，仍然“不想死”，也可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

我们代表团于四月回到国内。由于王稼祥同志在内战时负过重伤，身体一直不太好，这次出访以后，他就再未出国了，但是他仍然关心和领导着我们的工作，只是后来的许多事，也就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

### 出席古巴党“八大”

一九六〇年八月，我还作为我党代表去拉丁美洲，出席了古巴人民社会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人民社会党是古巴的共产主义政党。一九五九年初，古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组织取得了政权，古巴人民社会党由地下转为公开，支持卡斯特罗政府，与“七·二六运动”组织

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后来就完全合并，组成了古巴共产党。

当时我国同古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两国之间已经有了不少友好往来，我国已有新华分社的曾涛等同志常驻在哈瓦那。一九六〇年四月下旬，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和夫人，应我党中央邀请来华访问并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中联部由我和副秘书长李启新等同志负责接待。他到后，朱德、邓小平和彭真等同志会见和宴请了他，还请他到北京电视台向我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当时毛主席正在天津，邓小平同志和我陪着罗加乘火车到天津，毛主席在他乘坐的专用列车上会见了罗加和夫人。在会谈中，罗加向我们介绍了古巴的情况，赞扬古巴现政府“是一个革命的、爱国的、民主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新政权”，感谢我国对古巴革命的关切、支持和援助。我们也向他介绍了我国革命的经验。在去天津的往返途中，邓小平同志向罗加详尽地谈了中国党的发展情况和历史经验。针对古巴的情况，我们着重讲了三条：一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二是要建立强大的民兵武装，三是要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罗加对我们这几条很赞赏。

我和徐和等同志陪着罗加和夫人，在北京参观了工厂、火车站、郊区人民公社、人民大会堂和古巴图片展览。又陪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五一”节的宴会和游园活动。所到之处，群众一听说是来自古巴的客人，都特别热情欢迎。罗加也曾表示：“我们每到一地，都看到正在建设新生活的中国人民的快乐心情，看到中国人民关心古巴、支持古巴革命，使我很受感动，感到象在家里一样。”五月二日

罗加访华结束，王稼祥同志也同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一起，到机场为罗加送行。也就在罗加这次访问中，他说他们将于八月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邀请我党派代表去参加。邓小平同志听后略一考虑就对我说：“那就派你去吧！”不久又确定了去古巴的其他人选。在这期间，我还随彭真等同志参加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对此我将在下面专门叙述，这里就不说了。

八月上旬，我和中联部的陈清海、杨恩瑞（西班牙语翻译）等同志，离京至西欧，在瑞士搭乘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与法国、意大利、朝鲜和东欧几国党的代表团同机前往古巴。飞机离开欧洲大陆前，在里斯本停机加油，葡萄牙机场检查站对我们很不客气，让我们每个人都下飞机进行了检查。重新起飞后就横越大西洋，直飞加勒比海。到古巴以前，先在委内瑞拉北侧的荷属库拉索岛降落加油，又上来了智利等南美国家党的代表团，一起飞抵哈瓦那。

古巴党代表大会于八月十六日开幕，“七·二六运动”成员列席了会议，罗加作了总结报告。十九日我代表我党中央向大会致了贺词。在致词中我说，我国党和人民将全力支持古巴革命，把古巴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刚刚取得胜利的古巴人民对于我国的支持，是相当重视的，对我国的代表也十分欢迎。在我致词结束时，大会代表们竟用汉语高唱我国歌曲《东方红》，高呼“中国人民万岁”等口号，充分表现了古巴人民对我党领袖的尊敬和对我国人民的热爱。这次大会虽然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召开的，

但是各国党特别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还没有直接影响到古巴，当时对古巴革命，各国党都是支持的。

大会结束后的一天夜里，各国代表团正准备第二天应邀到古巴各地参观访问，我突然接到通知，说古巴革命政府总理卡斯特罗少校（这也是古巴的革命措施之一，全国最高的军衔就是少校）要接见我们。当天夜里我们就去到他办公处，同他举行了会见。这个人真能说，一个人口若悬河地讲了几个小时。从他们的起义经过讲到今后的发展道路，有的人听得晕晕乎乎，困得要命。直到天亮，他才终于结束了这次会见。一早我们又要出发去外地，他的过度热情，使我们一夜没睡成觉，也使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认识了这位劲头十足的年轻总理。

卡斯特罗接见我们以后，各国代表应邀到古巴各地参观访问，新华分社的曾涛同志与我们同行。我们沿着横贯古巴全境的中央公路，从位于古巴东端的哈瓦那直到接近西端的圣地亚哥港，几乎走遍了古巴全岛。我们代表团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那时的古巴，到处都是一派革命气象，我们看了也颇为兴奋。每个国家的革命斗争中，胜利初期都有这么一股劲头，问题是建立政权以后，把人民朝哪个方向引导，能不能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古巴今后怎样发展，这是它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八月下旬，我们由原路返回。过瑞士时，在那里当大使的李清泉同志邀我们在那里休息几天，亲自陪我们观赏了中欧的绮丽风光。刚在那里呆了三天，接到国内的电报，让我们赶到莫斯科待命，准备执行新的任务。我的古巴之行，也就到此结束了。

## 二、参加庐山会议

(1959.8)

我到中联部的第二年中，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参加了我党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建国以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揭露彭德怀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集团”，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无论是对于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经济事业，还是对于我们个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庐山会议分为两段，前一阶段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参加，但后来逐渐了解到一些情况。会议开始时，本来是要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过左倾向，进行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的。到会的许多同志，首先是彭德怀同志，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是正常的。正是在此情况下，彭德怀同志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归纳了他在会上的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这就是那封著名的“意见书”。彭德怀同志写出这样的信不是偶然的，他在我们党内，向来以为人正直、原则性强著称，对上级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他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早在内战时期的反对第五次“围剿”中，我曾亲自看到他不顾个人得失，义正词严地斥责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抵制了当时的错误领导和瞎指挥。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不怕冒犯和得罪领导，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无畏精神和原则

态度。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行动，正是他这种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的表现。他平时就一向比较接近群众，这次会前他又曾几次下乡，亲自作了调查研究，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听取了来自下层的呼声，才到会上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但是当时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了某些违反民主原则的不正常现象，一些正确意见往往受到压制。有的领导同志，急于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加之康生、陈伯达之流在庐山会议前后，又起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从当时的形势中，看出了会议上的苗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可能会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和支持，而他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就决定早些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更多的人跟彭德怀走，跟着犯“错误”。于是就将彭德怀同志给他个人的信，作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出来，名为让大家讨论，实际是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结果使会议发生了本应批“左”实际却批右的逆转。由此进入了会议的第二阶段，即中央八届八中全会。

我和一些同志于七月底得到通知，第二批上了庐山。一到庐山，会议的形势已成定局。鉴于自己一年以前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次就格外小心，特别是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就觉得除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以外，很难再作出别的选择了。

但是当时我心里却是很矛盾和沉重的。我了解彭老总的为人，他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许多同志的共同看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象彭老总那样毫无顾

忌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同志们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彭老总敢于提出意见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正确立场受到了误解，他的原则态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会议上展开了对他的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斗争，又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错误的文件。在大会上我也违心地举过手，因此在我党的这一错误中，也有我一份责任。至今我一想起这事，还觉于心有愧，当时的心情就更可想而知了。按说那次上庐山，是我第一次到这久已闻名的游览胜地，但是在会议的特殊环境和气氛下，我却毫无赏景的雅兴。所以那次虽然在庐山住了不少日子，除了参加开会和闷在住所里，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庐山下来，我把会议上发的一些文件和简报，交给部里一些领导同志传阅，也在会上谈了会议的情况，大家了解了党内发生的问题，心情都比较沉重。这时中央成立了专门的小组，审查彭老总的全部历史和各项错误，其中有一项是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因为与中联部的工作有关，有一次通知我参加对彭德怀同志的揭发批判会。会议开始后，专案人员声色俱厉地要彭老总交代他怎样搞“里通外国”的。当时我坐在他的左手边，见他的情绪和健康状况都明显下降了，精神上显得很颓丧。我只是半是批评半是规劝地对他说：“老总，你有什么就讲什么嘛，如实地讲吧，把问题讲清楚了，就好了么！”他自己曾生气地说，他不会说外国话，同外国人打交道都要通过翻译，真要搞什么“里通外国”的事，翻译可以揭发，他自己实在“交代”不出

什么问题。

庐山上吹出的这股“反右倾”之风，很快刮到了全党以至全国。中联部也按上面指示展开了“反右倾”运动。由于我是中联部的机关党委书记，负责部里运动的领导任务。在党委的掌握下，我们部的运动进行得还算是比较稳妥的，没出什么大的岔子。但是在总的形势影响下，同样发生了斗争过火和扩大化的错误，也整了不该整的同志。被搞错了的主要有两个同志，一个叫刘谈锋，他在香港等地工作过，并有些海外关系，在运动中被当成了重点对象审查，结果为了“纯洁组织”，竟把他的党籍给开除了。还有一个叫张维冷，他在五十年代初是我国驻印度的记者，因为他写过些小品文，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被认为“斗争意志衰退”，加上工作能力确实差点，也被错误处理调出中联部，还被送到外地。直到前几年，三中全会以后，才重新提出了他们的问题，虽然我已经不在中联部了，但当初是由我负责部里的运动的，对他们的处理当然负有责任。中联部党组织征求过我的意见，经重新审理，恢复了刘谈锋同志的党籍。这位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去世前得知这样的讯息，也就瞑目于九泉了。对张维冷同志的错误处理，虽然也纠正了，但是因为户口关系等问题，还不能迁回北京，对此我也只能向他表示歉意。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也曾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错误处理，我也为此感到抱歉，在此就不作细述了。总之，在这样大的运动中，中联部这个部门，打击面不能不说还是比较小的，这也是领导上注意政策有所控制的结果。



### 三、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6)

#### 会议的前奏和序幕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中苏两党和国际共运中开始出现了分歧。一九六〇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则成为使内部分歧走向公开分裂的起点。对于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后人自会评说，我仅将自己参与的活动和知道的情况，作些回顾和叙述，以供人们去分析研究。

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集团全面攻击和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掀起了一股“非斯大林化”浪潮。接着，又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我党对此一开始就在内部表示了不同态度，曾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发表文章继续肯定和赞扬斯大林，在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等处仍旧树立斯大林的画像。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提出与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等建议，遭到我党拒绝，使他们控制我国的图谋未能实现。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的。一九五九年初的苏共“二十一大”，出现了批评我党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路线政策的言论。同年九月，苏联又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一方，紧接着赫鲁晓夫又在我国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前后，攻击我国是“好斗的公鸡”，警告我们不要“用武力去

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国内外多次发表讲话，对我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影射攻击。说我国搞的是“冒险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运动“实际上是反动的”，是“唯意志论”和“跨越社会主义的必要阶段”等等。这些事实表明，中苏分歧是深刻的，并且越来越严重了。这种分歧又在一九六〇年初的华沙条约国家会议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〇年二月上旬，在莫斯科召开了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苏联及东欧各国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加上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还有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科涅夫等参加了会议。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也派观察员参加会议。我国观察员是康生、我和驻苏大使刘晓。我同康生于二月二日到达莫斯科，越南的长征和武元甲与我们同时到达。二月四日，就在匈牙利总理明尼赫主持下开会了。各国代表讨论了当前的国际局势，交换了关于裁军和对德和约等问题的意见。康生也以观察员身份讲了话。讲稿是在国内起草并经中央审定的，实际上同赫鲁晓夫等人唱了反调。当时赫鲁晓夫正热衷于周游列国，到处鼓吹他的实现“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等主张。我国则认为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必须警惕帝国主义者的两面手法。赫鲁晓夫等人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解决主要的国际争端问题以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我国则认为国际局势出现缓和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苏联在大会上宣布将单方面裁减掉一百二十万军队，即将苏联军队裁去三分之一，加上华沙条约其他各国裁减的军

队，共达三百七十九万五千余人。苏联鼓吹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裁军、禁止核试验等协定。我国则认为裁军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凡是中国没有参加的一切协议，对我国都没有任何约束力。

这次会议实际上只是走了个形式，二月四日上午作了些“讨论”发言，下午就由苏联和东欧各国党、政主要领导人联名签署了《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会议只开了一天，就宣布“圆满结束”了。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他在祝酒词中又影射攻击了我党，说我们口头上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在拆苏联的台。他还侮辱我党领袖是“破套鞋”（苏联人冬季为防冰雪路滑套在皮鞋外头的胶鞋）。第二天，波斯别洛夫和葛罗米柯又在苏共中央大楼专门会见了我们代表团，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一件“口头通知”，再次对我党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进一步表明了两党的分歧。面对这一情况，我们代表团当即进行必要的有力驳斥。关于这次会议，我国《人民日报》于二月六日发表社论《维护和平的决定性力量》，加以支持和赞扬。当时在我国报纸上仍然宣传“中苏同盟永远不可动摇和不可战胜”，继续高呼“中苏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等口号，目的仍然是为着维护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实际上已事与愿违。四个月后，召开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争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如果说在华沙条约国家会议以前，中苏两党的内部论争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前奏，那么华沙条约国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序幕，中苏争论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 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

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国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时，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阐述了我党对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回答了苏共对我党的种种批评指责，对苏共的一些论点和做法也作了不点名的批判。对于这些越来越明显的严重分歧，中苏两党及各兄弟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企图设法解决它。苏共提出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党未同意，主张经过充分准备后再开。后来经过协商，决定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趁各国兄弟党代表团来到布加勒斯特时，就已经出现的分歧和召开兄弟党会议问题，内部交换意见，但不作决定和不发表任何正式文件。为此，我党派出了以彭真为团长，由康生和我加上我国驻罗大使许建国为团员，还有熊复、张香山和阎明复等为工作人员的中共代表团。出国以前，我们先在钓鱼台集中了一段时间，为即将举行的会议进行准备。六月十六日代表团启程赴罗，十九日到达布加勒斯特。由赫鲁晓夫亲自出马的苏共代表团先我们一天到达。二十日罗党“三大”开幕，有五十来个兄弟党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

二十二日，彭真同志代表我党中央向大会致贺词。他在贺词中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说应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先我们一天在大会上致词。也就在这一天，他们片面地向参加大会的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和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发起了对我党的突然袭击。这一通知书同赫鲁晓

夫的致词，以及他们后来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都是一个腔调，公开宣称列宁主义的若干原则，是在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出现以前提出的，现在不能机械地重复当时的论点，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等等。

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会谈（即布加勒斯特会议）是在罗党“三大”的同时，利用大会的空隙时间进行的。赫鲁晓夫一开始就控制了会议，在他的带头发难和直接指挥下，对我党展开了猛烈的围攻，从我党的理论观点到我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进行了全面的批驳和指责。赫鲁晓夫和一些东欧党的代表，把我们党骂为“要发动战争的疯子”，说我们搞的是“假革命的极左路线”，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义”。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团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与我们关系较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是后来被宣传为我党“最亲密的战友”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他们的代表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因为他们采取的只是半肯定半否定的折衷态度，并未立即明确支持我们。不过就这种态度赫鲁晓夫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阿尔巴尼亚党马上施加了压力，逼迫阿党代表参加对我们围攻，结果却反而惹恼了他们，

促成阿党干脆明确地支持了我们。

会议开始以后，我们代表团立即将被围攻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很快复电给我们，指示用我党中央名义向各国兄弟党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来国内写的声明稿。我们收到电报后，立即将声明稿译成了俄文和罗马尼亚文，做好散发的准备。由于当时的气氛比较紧张，作为东道国的罗马尼亚党，见此状况很为不安，他们担心我们代表团因为受到意外的围攻，会退出这次兄弟党会议，这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比较难堪的。就在一天晚上，由罗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和他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出面，约请我们代表团长彭真同志去谈话，我陪同他参加了这次会谈。见面以后，罗马尼亚领导人反复地劝说我们，希望中共代表团能继续参加这次兄弟党会议，说如果我们中途退出会议，不仅将使兄弟党代表会议流产，也使他们很为难。乔治乌·德治和他们政治局的同志，一个接一个，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地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愿望，努力说服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把会谈的时间直拖到深夜。这真是一次疲劳战术的会见。彭真同志对乔治乌·德治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可以被辗得粉碎的，但决不会在错误的围攻面前屈服。我们是心里有底的，根据我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并不打算退出这次会议，相反正要在这个会议上发表声明，以回答赫鲁晓夫等对我党的攻击，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听了罗马尼亚同志的劝说，我们也就顺水推舟地表示接受他们的好意，同意继续参加会议，他们也就放心满意了。考虑到即将在兄弟党的会议上发表新的声明，会谈结束后又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因为用口头发表声明的方式，很

可能被赫鲁晓夫的一伙人打断，他们不会容许我们顺利讲完，就决定利用书面方式，将声明稿分发给各国代表团。我们把已经译成外文的声明稿打印出来，分别装在写有五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名称的信封里，作好了分发的准备。

### 我们的坚决反击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我们就将五十封声明译稿，送交给大会执行主席乔治乌·德治，说我党有一个声明稿，请他们分发给出席罗党“三大”的各兄弟党代表团。我们还表示这是为了尊重主人，才请他们代为分发的。乔治乌·德治当时来不及看我们的声明全文，顾及到礼貌也不便拒绝我们的要求，马上交大会工作人员一一替我们分发了。我们看到各国代表团接到我们的声明稿，立刻急忙地打开阅读，有些人脸上马上露出了惊异或紧张的神色。苏共代表团也收到一份，赫鲁晓夫原想把我们一下子就压服吓倒，大概没有估计到我们的反击如此迅速，内容又如此尖锐，一时似乎有些恼怒和慌乱。

我们在声明中揭露了苏共代表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协商原则和对此次会议的事先协议，组织了对我党的突然袭击，极其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兄弟党采取了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在国际共运中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声明指名批评了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同他在马列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表示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又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两党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性质，两国都

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党都是马列主义党，应该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兄弟党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使国际共运的团结得以巩固和发展。

在我党声明的第一节中，就严正指出赫鲁晓夫“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运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做法将会在国际共运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惯于以老子党自居的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看了我们这样的批评，实在被刺痛得太深了，怎么也忍受不了，马上又组织了对我们代表团新的猛烈攻势。赫鲁晓夫再次一马当先，带头对我们声色俱厉地攻击了一番。别的党的代表团也一个个跟了上来，按照赫鲁晓夫定的调子把我们骂了一通。在这种紧张气氛下，我们代表团岿然不动，冷静地准备再次予以反击，顶住迎面而来的强大压力。我见到彭真同志情绪也很不平静，想提醒他不要激动，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哀兵必胜”四个大字，传给了彭真同志。他看后会意地朝我点点头，各自都坚定了斗争的信心。随后彭真同志作了一个尖锐而激烈的即席发言，对苏共代表团发起的攻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他借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又借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说赫鲁晓夫现在的做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自己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谁不听他的就组织对谁的围攻，还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这种行为，完全破坏了国际准则。为彭真发言作口头翻译的是阎明复同志。由于共同的义愤



情绪，他翻译得不仅迅速清晰，还用语准确，译词有力，我听了也很兴奋和赞赏。在双方辩论激烈时，我曾经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当面指责赫鲁晓夫组织对我们的围攻，却不准我们进行答辩的霸道行为。赫鲁晓夫在我们的反击后，当然不会认输，他们运用多数通过了会议公报。我们代表团按照中央的指示，在会上发表了声明，不赞同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的错误立场，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在这次会议的会谈公报上签了字，以便对外缓和一下已经出现的严重分歧和对立。

### 会议结束 分裂开始

六月二十五日，罗党“三大”宣告闭幕。当天下午在布加勒斯特“八·二三广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以示庆祝。各兄弟党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但是却只安排赫鲁晓夫和法国、意大利、古巴、日本等几个党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没有给我们发言的机会，大概是怕我们又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批评赫鲁晓夫，造成他们的难堪。我们当时也看出，赫鲁晓夫对我党和我们代表团未能压服下来，是决不甘休的。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我们在作回国的准备时，相互商量说，按照原定路线，我们得经过莫斯科回国，赫鲁晓夫一伙会不会制造事端，找我们的麻烦。通过赫鲁晓夫的一贯作风和这次会议的情况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赫鲁晓夫等人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为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开始曾考虑将我们代表团的人分成两批走，如果前一批人出了问题，后面还有第二批人在，不致把我们一下子都整掉了，弄得回去汇报情况的人都没有。后来

再三分析了情况，认为形势还不至于一下子恶劣到这个地步，思想上要提高警惕，行动上却不必过于紧张。决定还是整个代表团一同走，只把会议的有关文件和资料编了两份，一份由我们自己带着，一份留交驻罗大使馆保存着，万一我们代表团出了事，还有一份完整的文件资料在，不致使这段历史事实湮没。

六月二十七日，我们代表团包括许建国大使在内，一起离罗经苏返国。我们在路过莫斯科时，倒未遇到什么特别的刁难。不过就在以后不久，赫鲁晓夫终于图穷匕首见，他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没有捞到多少便宜，就一不做二不休地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內撤退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的几百项协议和合同，停止出版和发行《苏中友好》杂志，接着又赶回我国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挑起边界纠纷，使中苏两国关系面临严重恶化和全面破裂的状态。

六月二十八日，我们代表团全体人员安全返回北京，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在机场迎接了我们。随后我们到北戴河就这次会议进行总结，并向中央写了正式的总结报告。在布加勒斯特会议过程中，康生本来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是他以后却一再大吹其牛，说自己曾经如何敢于当面顶撞赫鲁晓夫。其实只有过这么一件事，有次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搂住康生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家伙是个机会主义者。”康生也是半开玩笑地回答道：“你才是个机会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这么一句并无实际内容的自我吹嘘的话，康生竟当作了了不起的资本，反复进行宣扬，一直引为骄傲。这还不算，他后来竟反过来攻击当

时真正同赫鲁晓夫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彭真同志，说别人如何“软弱无力”，使用了他惯常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伎俩。回国总结时，康生参加了全部工作，并未提出什么不同意见，哪知事后他却突然翻过脸来，攻击这个总结是“机会主义”的，“没有如实地反映出会议的情况”等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将这一条当作彭真同志的“罪状”，又编造了自己的“功绩”，真是翻云覆雨，不知羞耻。

### 九月的中苏两党会谈

一九六〇年九月，即布加勒斯特会议两个多月后，我刚参加了古巴人民社会党“八大”，从南美来到瑞士，正在伯尔尼时，就奉国内电令赶到莫斯科，参加于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举行的一次中苏两党会谈。这次会谈是内部性质的，我国党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同志。会谈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布加勒斯特会后，苏方片面恶化两国关系所引起的若干问题。在会谈中，邓小平同志批评了苏共领导，指出他们在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以“老子党”、“老子国家”自居，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与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苏共领导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与我国签订的各项协议和合同，给我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在发言中又说，虽然苏共给我国造成了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克服当前的严重困难，把苏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小平同志这样讲气魄是很大的。当时在我的思想上，存在着一定要苏联赔偿对我国所造成损失的想法，其实这是主观主义的，办不到

的。小平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有气魄的。在发言中，我们要求苏共领导改变态度，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苏共领导人不仅不听我们的告诫，反而总想迫使我们就范。双方争来争去，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这次会谈结束后，十月间又在莫斯科举行了二十六国兄弟党的代表会议，为即将在十一月间举行的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起草文件，我党代表团团长仍然是邓小平同志。十一月初利用十月革命节四十三周年的机会，召开了世界八十一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我党由刘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前往参加。所有这些会议，每次都有激烈的争论以致争吵，勉强通过的共同声明等文件，实际上是反复争论和适当妥协的产物。到以后就连这样的文件也签订不成了，旁敲侧击的内部的批评，发展为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什么信义和准则，全抛到一边去了！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九六〇年开始的。在这一年中，从二月的华沙条约国高级会议算起，接着是六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九月的中苏内部会谈，十月的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十一月的八十一国兄弟党会议，我党先后五次派出代表团去过或路过莫斯科。听说郭沫若同志曾经写诗记载此事，称为“五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这后一句是双关的，因为这场斗争方案计划的讨论研究，大都是在北京“钓鱼台”迎宾馆内进行的。在这五次中苏接触中，我参加了前三次，直接经历了中苏两党严重分歧和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开始阶段，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段很有教益的经历。

## 四、东欧四国党代会

(1962.11—1963.1)

### 在保加利亚

一九六〇年以后，中苏分裂之势日益明显，其中有意形态上的分歧，也有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因素。世界各国兄弟党随着中苏分歧而重新组合，许多党内也因对中苏两党的不同态度，出现了对立的派别。大多数国家的党尤其是东欧的党，由于苏共的传统地位影响和迫于一定的压力，是站在苏共一方的；有一些国家的党则采取中立态度，只强调团结，不参与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有少数几个党或党内的某一派，表示支持我们。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同我们遥相呼应、密切配合，成为我们的“坚定战友”。正因为阿尔巴尼亚党公开支持我们，苏共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性措施。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他们不仅破例地不邀请阿党参加，还在这次大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国际共运中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当时人们都心中有数，苏共的攻击阿党，其实是指桑骂槐，是借阿党之名骂中国党。为此，我党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也在自己的致词中对此作了相应的回答，并且在会议的进行中就提前回国，表示了我党的严正立场。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一月，东欧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四国，相继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当时我们同这些党还维持着传统关系。按照惯

例，他们仍然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党的代表大会。我党为了多一个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争取对我们的了解和支持，也接受了这些邀请，并决定我为出席这些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团长。团员除熊复同志以外，随着到不同的国家不断换将，先后有康永和、周兴和张平化同志。这几国的党代表大会显然都是在苏共的统一策划下召开的，几国党的领导人在会前都轮番赶到莫斯科进行磋商，保共领导人日夫科夫直到他们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两天，才从苏联访问回来。看来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大会几乎都是一个调子，实际成了苏共导演的一场新的反华大合唱中的几支插曲。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我们首先来到索非亚，参加了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我党代表团除我和熊复同志以外，还有康永和同志，工作人员有阎明复等同志。苏共代表团团长是苏斯洛夫。由于苏共“二十二大”的示范和苏共代表团的带头作用，保共代表大会一开始，就对阿尔巴尼亚党发起了攻击，对我党则用比较隐晦的语言进行指责，有少数几个外国党的代表团，在致词中指名批评了我党。起初我们从自己的良好愿望出发，并未同对方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辩，只准备按照国内写好的祝词，对保共“八大”作一般性的祝贺，没有指责和攻击性的语言。可是事情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以后的会议过程中，不少保共代表和外国党代表团，相继在自己的发言或致词中，或明或暗地攻击了我党。这种情况，我们事先也是预料到了的。我们的祝词也就作了两手准备，如果出现明显地攻击阿党并指名攻击我党的情况，就择机加以反击。对于会场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如全场起立、鼓掌等，我代表

团的对策则是凡有攻击我党或阿党的言论，或是在重大问题上原则分歧的讲话，都既不起立，也不鼓掌。所有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都照团长的行动办事。当时我坐在主席台上，从同声翻译中直接听俄语的传译，能及时知道每个人都讲了些什么，虽然我听时不露声色，但是心里是不舒服的。面对这一形势，我就实行事先商量好的对策，对发言中我认为凡是正确的内容，同别人一样起立鼓掌，凡是有直接或间接攻击我党的言论，我就坐着不动，既不鼓掌也不起立，代表团全体人员都照我的行动采取一致态度。例如苏斯洛夫致词时，在他开始讲话前，我们为了保持礼貌，也随全场一齐起立和鼓掌；而当他致词完毕后，由于他在讲话中攻击了阿党，当全场再次起立鼓掌时，我们就故意稳坐不动，用这一方式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我们的这一行动，很受人们注意。后来从侧面了解到有些保共中比较高级的工作人员曾经这样说过：中国党代表团的行动很能说明问题，对发言中的一般问题他们同大家一样表示赞同；对于不利于国际共运团结的言论，就不支持，用不鼓掌、不起立表示反对，这样做是严肃的、有水平的。

开幕后的第四天，我们才被安排在大会上致词。我向保共“八大”宣读了我党中央的贺电。在致词中除了对保共作了一些通常的祝贺以外，我又针对大会上出现的情况说道：“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你们党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听到了无理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言论。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只能叫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高兴的。”大概是出于礼貌的关系，在我致词的前后，会场上照样全体起立并鼓掌。大会于十一月十四日闭幕，当晚保共

中央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我被安排在苏斯洛夫和一位保加利亚同志中间。由于苏斯洛夫在保共“八大”上带头攻击了我们，我为了表示对他的不满，虽然同他并肩坐着，却始终没有同他交谈和碰杯，坚持着避而不理的冷淡态度，弄得苏共的这个头头十分尴尬。这也算是我们对于从保共“八大”开始的反华活动的初步反应。大会结束后，我们代表团又拜访了日夫科夫。会见中主要由我们向他阐明中印边境冲突的真实情况，提醒他不要相信西方的歪曲宣传，而应相信我国的正式报道。

## 在 匈 牙 利

保共“八大”结束后，我们代表团于十一月十五日离开索非亚，转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准备在那里休息几天，然后再去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从一年半以前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罗马尼亚对我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到那里后，预订去布达佩斯的飞机票，罗方竟表示有困难，说是订不到票。我们就找到匈牙利的驻罗使馆，说是我们要去参加你们的党代大会，现在买不到飞机票，希望能帮助解决。我们作为他们党的客人，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他们果然很快帮我们买到了匈航的飞机票。当我们上飞机后，看到舱内空座位不少。我们于十一月十八日如期到达布达佩斯，按时参加了匈党“八大”。

大会于十一月二十日开幕。不出所料，会议一开始，在匈党代表发言和外国党代表团的致词中，又发生了对阿尔巴尼亚党和我党的攻击。为此，我们在二十一日祝词



中，除对匈牙利党作了一般的祝贺外，对于他们大会上出现的反华、反阿言论，再次表示了遗憾，并在致词中提出了消除分歧和加强团结的愿望。我们的态度当然改变不了他们这次大会既定的调门，只是他们接受了保共党代大会的经验，在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一条规定，对于大会上的所有发言和致词，会场上一律不起立。我一听就知道这一条规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因为我们在保共党代大会上，对凡是攻击我党、不利于国际共运团结的言论，都用不起立、不鼓掌表示反对，在会上影响很大。匈牙利党这么一规定，就使我们少了一个表示不同态度的方式。不过他们并不能规定不准不鼓掌，所以我们就在别人照例大鼓其掌时，对于攻击我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言论，态度严峻地端坐不动，与众不同地偏偏不鼓掌，同样表示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还在会上作了个统计，会议开始以来，有哪几个兄弟党代表团和多少匈党代表，在致词或发言中攻击了我党和阿尔巴尼亚党。我们把这个统计同保共党代大会的情况作了比较，结果是参加保共“八大”的六十四国党的代表团，有二十来家有攻击性言论；参加匈党“八大”的外国党代表团只有六十个，可是却有三十来家攻击了我党及阿尔巴尼亚党。不仅数字增加，调子也升高了。有的外国党的代表团，公然将引起国际共运混乱的责任，推给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一方，把我党说成是站在“保卫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立场”，实行了“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政策”。我们对这些情况在会下作了研究，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并要求对我们的工作作进一步的指示。

大会结束的当天上午散会时，匈党中央书记内梅什来

问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招待会上，我党代表团是否讲话。那时我们还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不好确定讲不讲和讲些什么，就先推托了一下，说是下午再答复他们。正好中午吃饭时得到北京的电报。中央指示我们，利用招待会祝酒的机会，公开回答大会上对我党的攻击。要求我们抓住要害，进行回击，集中讲三点：第一，中苏和阿苏关系的恶化，责任在于苏共；第二，揭露当前的这场反华大合唱，是苏共一手导演的；第三，提出召开兄弟党代表会议以消除分歧，高举团结的旗帜。电报同时发来了国内拟就的声明稿。我们收到电报指示，心里就有底了，马上把声明稿翻译成匈牙利文和俄文，准备当晚到招待会上公开发表。考虑到在招待会上发表声明，我讲一段翻译再重复一段，费时间太长，人家一听到我们讲得不对口味，就可能不让我们讲完，收不到预期效果。于是临时想了个办法，到招待会上祝酒时，我先上去说了几句，说是为了节约时间，我自己不再用中文讲，委托翻译同志代我直接宣读译稿，就让匈文翻译上去一气读完了我们的祝酒词。匈共中央领导人和苏共代表团开始不知道我们要讲什么，就同意我们这样做了。这个祝酒词实际上是我党的一个正式声明。其中表明我党的立场后，明确指出：“不幸的是，现在还有些党，还有有些人，仍然继续扩大分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利用一个又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的机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这是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又指出：“利用某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或一些党的做法，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也是极不正常的。”这个声明对于全体与会者来说是出

乎意外的，匈牙利党的领导人们似乎一下子发了呆，对我们的这一声明不知所措。只见苏共代表团马上同一些别的党的代表团临时接触，匆匆商量交谈之后，拉出一个很听苏共话的拉美某个党的代表，让他出面对我们进行反击。接着，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走到我面前，对我说：“真没有想到你们代表团会有这么一个讲话，对于你们这种做法，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在外交词令中，“遗憾”也就带有抗议的性质。在这种气氛下，我们也就很难再作出什么友好姿态了。我便当机立断地回答他：“我也很了解你的意思。因此这个招待会我们就不能参加到底了，我们代表团现在就向你告辞。”说完后我就带领我们代表团的同志，提前退席，抗议式地离开了招待会。我们在匈牙利党代大会的活动，也就到此结束。

大会期间，我们用不鼓掌、发表声明和提前退出招待会等方式，又一次表示了我党对反华行为的态度。

参加这次大会的我党代表团成员，除我和熊复同志未动外，山东省委书记周兴同志代替了康永和同志。这一期间，我们代表团同志之间合作得很好，熊复同志是一位很好的“笔杆子”，工作能力强，态度认真，办事尽职，又很有组织性纪律性，在代表团内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我的工作也是很大的支持。当时我们每次开完会回到使馆，对于当天的情况，代表团内都要进行讨论和研究。议论过后，熊复同志总是很快把大家讨论的内容，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意见，有条有理地归纳整理出来，及时报回国内。参加匈牙利党代大会的苏共代表团团长是苏共最年长的领导人库西宁。阿尔巴尼亚党照例没有被邀请参加大会。在参

加大会的外国党代表团中，公开表示同我们友好的，是以黄文欢同志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他遵照胡志明主席的教导，同我们经常聚会交谈，关系十分密切。由于阿尔巴尼亚党没有参加这些会议，我们和黄文欢同志曾经在大会期间，几次一起去找阿尔巴尼亚大使，向他介绍一些会议的情况，使他们十分高兴和感激。我们当时真是把越南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战友看待的，却没有想到正是这两个“兄弟”党的霍查和黎笋，现在反我们最凶！

匈牙利党代大会以后，我们一行几人坐火车到了波兰，以便在战后重建的美丽的华沙，短期休息一下。王炳南同志正在华沙当大使，他同波兰方面的关系处得比较好。与东欧其它几国相比，波兰对我们的态度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去后本来只打算在使馆停留几天，不想惊动所在国。可是波兰领导人知道我们到华沙后，热情邀请我们到他们的高级疗养地去休息。王炳南大使说既然人家邀请了，还是应该去，我们几个人就同王炳南等同志一起去了。到了那里后，波兰主人请我们去打猎。五十年代中我在南斯拉夫打过猎，这次打了三枪，第一枪就打中了一只野羊，看它蹦达蹦达了几下，就倒下不动了，自然是满意的。只是此后接着两枪，却什么也没有打中。王炳南和周兴同志，两人也都各自击中了一次目标。在波兰停留期间，我们代表团的人员中又一次换了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赶来，替换了周兴同志，同我们一起转赴布拉格，参加捷共的党代大会。

## 在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四日开幕。我们代表团于十二月三日赶到布拉格。苏共代表团团长是勃列日涅夫。他带着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大批人马来到布拉格。在捷共党代表大会会场内外，到处见到他们的人在频繁活动。我们就预感到这次大会期间，同他们必有一场较量。不出所料，大会第一天，捷共总书记诺沃提尼就在自己的总结报告中，猛烈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党和支持他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作为第一个外国党致词的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紧接着诺沃提尼大骂阿尔巴尼亚党和所谓“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他们企图把人类拖入热核战争。这就等于发出了大肆反华的动员令，由此开始，无论是捷共代表的发言，还是外国党代表团团长的致词，都纷纷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指责我党，并竞相以其调子之高和用语之尖刻来表示他们对苏共“老子党”的忠诚。我们又统计了一下，参加大会的六十多个外国党代表团，有五十多家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其中又有二十家指名攻击我党，其数量和比例都比保、匈两国党代表大会增加了。最值得注意的是，连不同意这样攻击中国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也受到一些人的无理指责。这就使大会形成了又一个反对中国党的高潮。

大会上攻击我党的言论，大致有几个方面：一是说我们搞“冒险主义”，“把冒险的主张、加剧紧张和引起冲突——这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热核战争——作为自己的方针”。二是说我们搞“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对各国党

内的“不良派别活动熟视无睹甚至帮助这一活动”，“致力于分裂国际共运和工人运动”。三是对当时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持不分是非和伪装中立的态度，攻击我国“不负责任地、沙文主义地煽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对“争取和平的事业毫无好处”。四是指责我党把南斯拉夫作为靶子，“通过它，可以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开火”。此外，还借口反对核扩散，反对中国拥有核武装，并在中、捷两国经济合作等等问题上，攻击和诬陷我们。

十二月五日，我在代表我党中央向大会致的贺词中，不得不对勃列日涅夫和诺沃提尼等人对我党及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作出回答。我说：“我对于一年以前开始发生，以后又一次再次地发生的，一个党利用自己的代表大会的讲坛，对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攻击的作法，表示深切的痛心。……你们的代表大会又一次重复了这种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做法，……这使我们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指出这种作法只能起到加深分歧、损害团结的作用。我们的这些话当然是勃列日涅夫等人不爱听的，同大会的主调也是不合拍的，因此当我还在主席台上致词时，会场上就出现了嘘声、拍桌、跺地板等极不正常的现象。我没有理会，在一片嘈杂声中坚持把祝词讲完。大会执行主席在我讲完后，即席讲话，硬把别的党对我们的肆意攻击说成是符合民主原则和兄弟党关系准则的。这一做法，前所未有，实属异常，又掀起了一股反华热潮。在他讲话的前后，会场上几次起立鼓掌、高呼口号，使大会出现极不正常的狂热场面。在此以前，有的发言在攻击我党时，还用一点隐晦的语言或采取不直接点名的办法，至此也就

什么都不顾了，指名道姓地攻击我党和我们代表团。

我们向国内汇报了这些情况，中央复电指示我们，在这次大会上再发表一个特别声明，要求我们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不退会，也不抗议，把会议参加到底，反对和揭露苏共挑起的种种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错误作法。中央同时发来了声明稿。鉴于参加前几次党代大会上的经验，我们决定再次利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用过的方式，以书面形式发表我们的声明。我们代表团协同大使馆的同志，把声明稿译成俄、捷等文字，再一份一份打印装订好，于十二月八日带到大会上去。那天的议程是诺沃提尼作大会的总结讲话，在他的讲话结束以前，我亲自将声明稿当众送交大会执行主席亨德里赫，请求大会主持人将我们的声明转发给各党代表团，还特地先给勃列日涅夫送了一份。亨德里赫马上交了一份给正在讲话的诺沃提尼。他看到我们的声明后，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就用十分生气的语调对大会全体代表说：“中共代表团现在送来了一个声明，要我们转发给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现在我把他们的声明先念给大家听一听。”说着就把我们的声明从头到尾全文照念了一遍。他自以为表示了“气愤”，其实是给我们做了义务宣传，对此我们只能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的声明说，我党代表团是“抱着增强兄弟党的友谊、增强国际共运团结的真诚愿望”，应邀出席这次大会并表示祝贺来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捷共的一些同志和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利用这次代表大会的讲坛，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

劳动党，并且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行动，我们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声明又批评这次大会“甚至采取喧嚷、嘘叫等不正常的方式，并不能证明自己是合理的，也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诺沃提尼在自己的总结讲话中接着说：“我不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伍修权同志的意见，……难道你们想要我们把头插入沙子中，不向党介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危险发展的事实和掩盖这些事实吗？”他否认他们的作法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为他们公开攻击我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行为辩护。也许是他们察觉到自己吃了亏，当天上午会议结束时，诺沃提尼同他们的中央国际部长急急忙忙来到我面前说：“我们没有义务替你们转发什么声明，你们要发就自己送给每一个代表团去。”说着把一堆我们请他们分发的声明稿，退还给了我们。我们完全是为着对主人的尊重，才请他们转发文件的。现在诺沃提尼当众说可以由我们自己直接送发，我马上紧盯着他说过的话问道：“诺沃提尼同志刚才说，你们不能为我们转发我党的声明，并说我们可以直接送发各兄弟党代表团，请问是这样吗？”诺沃提尼无法否认这一点。这样，他就把直接在大会上散发文件的合法权利交给了我们。我们回到使馆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下午开会时提前到达会场，趁各国代表团入场的时机，一一发出了所有的声明稿。正好各外国党代表团在上午的会上未能听得很清楚，正需要看看我们声明的书面稿，他们也很重视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有的还是主动前来索要的。这样我们也就完成了任务。



在捷共的代表大会上，反华的气氛虽然很浓，发言攻击我党的人数也很多，但是各代表团的态度还是很有区别的。即使参加了反华合唱的，在发言的先后、采取的方式和所用的语言等方面，也是大不一样的。大会的东道主捷克党这次不得不站在反华、反阿的第一线。但是有的外国党代表团在大会上批评了我们和阿党，而在捷党报纸上正式发表讲话稿时却又把批评我们的话完全删去了。在参加这次大会的外国党代表团中，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的代表团长李周渊同志在讲话中公开赞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一国党代大会上攻击另一国的党。他说：“某些同志片面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不能把这看作是同志式的态度。这必将削弱我们的团结和大大损害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他还说：“如果对苏共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的话；同样对中国党的态度也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的”。其他亚洲邻国的党都同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一样，公开表示同我们的友好关系，在会议休息室里同我们围坐交谈，不避嫌疑，不畏压力，表明了他们的党维护团结，反对分裂的正确立场。

大会结束以后，捷共中央按照通常的国际礼仪，由他们的国际部长和一名中央委员出面，在十日同我们代表团共进午餐。这顿饭吃得很不平常，与其说是一次共尝佳肴的友好活动，不如说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舌战，从中午十二点半一直舌战到下午五点半，鏖战了整整五个小时。开始是他们向我们递交了一份诺沃提尼总结讲话中反华部分的书面稿，要求我们将此文件转交我党中央。我们为了表示“礼尚往来”，就把带在身边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真相

的小册子，顺手“回敬”给了他们。他们说捷共对于已经发生的分歧决不让步；我们就说中国党同样一分一毫也不退让。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党不应该攻击苏共；我们说事实证明是苏共首先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的。他们说谁首先攻击是次要问题，分歧的实质才是重要问题；我们说对实质问题只能用平等协商的讨论方式，不能采取片面攻击的方式，恰恰是苏共在一些实质问题上，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又无理纠缠地说，阿尔巴尼亚党已被中国党抓在手中；我们立即回击说，谁被抓在谁手里这句话，完全不符合中阿两党的实际情况，倒是反映了捷共同苏共的关系。他们说我们是攻击捷共；我们说恰恰相反，到现在为止，中国报纸从未指名批评过捷共，而是捷共跟在苏共后面，从苏共“二十二大”以来，在报纸上和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了中国党。我列举了一件又一件确凿的事实，他们也不得不予以承认。但是他们又说，在这次大会的我党声明中，说捷共参加了帝国主义的反华大合唱，是对捷共的诬蔑；我们回答说，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这是事实，捷共同志反对中国党，这也是事实，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去呢？最后我们严肃地说：“捷共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分裂的大会，它将同一九六〇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一样，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午宴后的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一日，我们代表团就离开了布拉格。这时已快到年底，东德的党代大会在下月中旬召开，中央为了照顾我们，让代表团的同志都回国休息，过了新年再去，并关照中苏民航的班机，在依尔库茨

等候我们，使我们于十二月十四日顺利地回到了北京。一下飞机，我们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用了一个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捷共代表大会上诺沃提尼及其他代表们的反华言论，向人民公布了他们对我党的批评、指责和诬蔑。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长篇社论，同时发表了我们的代表团在捷共党代表大会上的声明全文，还发表了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在捷共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支持我党的报道等。这就再次正式表明了我党的态度，对由苏共指挥、捷共出面的这次反华浪潮，向全世界公开给予了回答。

在我参加捷共党代表大会的同时，意大利共产党也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我党派赵毅敏等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等也公开攻击了中国。为此，我国《人民日报》在本月底又发表了长篇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对意共党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反华言论，也予以公开回答。几天以后，即一九六三年一月初，《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长篇社论，进一步阐述了我党当时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批判了苏共及其支持者的观点。至此，这场国际共运之间的大论战，就在全党、全国以至全世界公众面前，全面地展开了。

我们回国以后，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通知我们去那里向他当面汇报。我当即赶到杭州，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党代表大会的主要情况，向他一一作了如实汇报。他听后说：“你们做得还可以”，对我们的三

国之行表示满意。

东德的党代表大会，定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召开。我们在国内得知参加这次大会的苏共代表团团长，将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担任，其规格异乎寻常，代表团的阵容也格外强大，表明了他们对这次大会的重视，也预示了在这次大会上将有一次新的更激烈的斗争。面对这一情况，我向中央提出建议，是否将我党代表团团长换一下，由一位地位和威望更高的同志去，以便面对面地同赫鲁晓夫较量。邓小平同志考虑后果断地说，不必换人了，我们一视同仁嘛。四个国家的党代表大会，都是同一个代表团参加，连成员都不再调换。除我和熊复同志以外，张平化同志又同我们一起去了东德。

## 在 东 德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三日，我们代表团到达柏林。次日，赫鲁晓夫率领着阵容强大、人员众多的苏共代表团乘专机到达。一月十五日上午，东德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开幕，六十六个兄弟党派代表团参加了大会。鉴于前几国的党代表大会上的情况，每次都在对华、对阿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争论，苏共及其追随者不能完全封住别人的口，自己也不能为所欲为，东德党代表大会一开始就宣布了几条限制发言的新规定，例如只邀请各党第一书记为代表团团长的来宾在大会上致词。这一下就剥夺了许多代表团的发言机会。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又补充说中、捷两党不在此例，因为诺沃提尼也未去参加大会。对于其它各国的党，则按地区推派代表致词，如亚洲

地区由日本党作为代表，拉丁美洲由古巴党作为代表。所有没有机会在大会上致词的外国党代表团，可以书面形式向大会致送祝词，然后在报纸上发表。这些规定不仅限制了一些兄弟党在大会上的发言，实际上还压制了支持我党的正确意见。例如朝鲜和印尼等国党的祝词，就因为不合苏共一伙的口味，不能到大会发言，连东德的报纸上也不予发表。这种种限制措施，都使大会一开始就处于极不正常的气氛之中。

与前几国的党代大会有所不同的是，苏共及其追随者在这次大会上，采取了新的实际上是更为恶劣的手法。东德党总书记乌布利希首先在自己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国党拒绝和平共处原则将导致战争，中印边界的冲突是由于中国未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引起的等等。其实中印边境冲突是由印度尼赫鲁政府挑起的，但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积极支持，而乌布利希又利用这一事件对我党率先发出了攻击。作为第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致词的赫鲁晓夫，却在自己的致词中突然故作姿态地说，建议从现在起停止各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不再在自己党内批评别国兄弟党；并提出要求阿尔巴尼亚党“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返回到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来，表示出一副愿意“和解”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企图将我们置于一种困难境地的新伎俩。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就一下封住了自己的口，被迫吞下他们对我党的大量的诬蔑攻击，丧失了我們揭露对方和进行反击的权利。如果我们拒绝他们的建议，则又会失去群众，别国党和公众将难予理解，反而显得他们采取了“高姿态”。这正是赫鲁晓夫等人的如意算盘。果

然，在赫鲁晓夫致词之后，东德党中央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委员会负责人马上约见我们代表团，表示东德党支持苏共的“正确建议”，要求我们回答和响应这一建议。同时，苏共代表团同东欧、西欧等各个跟苏共跑的党，在会场内外到处活动和游说，大肆宣传赫鲁晓夫的讲话是“温和的、和解的”，说现在不应该追究谁先开始攻击，“而是如何停止争论的问题”，说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就要听中国代表的讲话了”，企图一下“将”住我们的“军”。

我们代表团研究了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的讲话，分析了大会内外出现的种种新情况，认为赫鲁晓夫一伙虽然气势汹汹，却有他虚弱的一面，他们害怕承担分裂的责任，还没有下定彻底破裂的决心，只是为了要迷惑和拉拢一些中间分子，才放出了“和解”的烟幕。针对这一动向，我们则要进一步揭穿苏共借团结之名，行分裂之实的企图，提醒人们对于赫鲁晓夫那一套，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要上他的当；同时要尽可能地争取群众，利用各种方式，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做说服工作，宣传我党的主张，扩大我们的影响，使他们理解和赞同我们的行动。我们把大会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一月十七日下午，中央复电给了我们新的指示，并发来了我党对东德党“六大”的祝词的审定稿。根据中央指示，我们争取到了在大会上致词的机会。为了对付可能的阻挠和压制，我们又将祝词稿事先翻译和印出来，分交我们代表团和我国大使馆的同志，还有我国驻东德的新华社记者，让大家在我们致词以后，分别从几个方面，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将祝词的书面稿广为散发。

一月十八日上午，我代表我党中央向大会致词并宣读了贺电。当时赫鲁晓夫未到场，也许是故意避开了。我们在贺词中，强调各兄弟党应当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对所谓“和解”建议，要听其言观其行，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并对利用自己的党代大会，来攻击另一些兄弟党特别是中国党的做法，再次表示了“极大遗憾”。我们的讲话当然不合苏共和德国党的口味。就在我发言过程中，大会执行主席、德党柏林市委书记维尔纳竟一再摇铃制止我发言。这个祝词稿是在国内起草并由中央审定发来的，我既无权修改，也不能中止发言，就不顾他的反对，仍然坚持往下读。谁知道这下子就热闹了，从主席台上到会场中间，发出了一片喧闹声、口哨声和拍桌子、跺地板的声音。我的发言被粗暴地打断了，看来他们还想把我从讲坛上轰下来。这种极不友好的起哄喧闹，是很难使人忍受的。在一个庄严的党代大会上，搞这么一套，未免太不讲“文明礼貌”了！那时我心里倒还冷静，我想站在这里的不是我一个伍修权，而是一个有着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个人虽无所谓，我却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党，你们再闹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还不敢把我从讲坛上拉下来。我就不动声色地看着台上台下的混乱场面，倒看出了一点苗头，发现闹得最凶的主要是主席台上和会场前座的中间几排，那里坐的基本上都是东德党的高级干部，而后排和两边的一般代表席上，则相对地比较安静。这分明是他们有意组织导演出的一场闹剧。这场喧闹持续了足有好几分钟，当他们终于慢慢停息下来后，我立即重新开始发言，并且离开讲稿临时加进了一句话：“你们这样

做很好，这就使我看到了你们德国同志的‘文明’。”由于这话是离开讲稿针对现场情况讲的，同声翻译室中的德国译员有意不翻这句话。正好那里有一位中国同志，他也在那里担任口译，他见德国译员故意漏了这句话，立即拿起话筒，用德语把这句话补充播发了出来，在会场上又一次引起了反响。这位同志叫梅兆荣，他开始是我国派去的留学生，当时是使馆的工作人员。他机敏、及时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我们在会场上的斗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由于德国党代大会对我们代表团采取了无礼的冷淡态度，我们只得以冷对冷。从十八日我在台上被哄闹起，我们除了参加大会的闭幕式 and 向烈士墓献花的活动，并去了一下波茨坦外，其余的活动如参观展览会、出席音乐会和酒会等等，虽然德方也邀请了我们，我们一概谢绝不去。在闭幕大会上，当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等进入会场和乌布利希作闭幕讲话时，全场代表和外国客人都照例要起立鼓掌，我们都冷冷地既不起立也不鼓掌。在会议执行主席一宣布大会结束后，没等唱《国际歌》，我们就起身离开会场。这些行动在大会上都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圆满”气氛。

在这次党代大会上，各国党的代表团对我们的态度同样是很不一致的。他们在会上发言的调子也不尽相同。在我们十八日向大会致词以后，赫鲁晓夫一伙曾经召集了几党的代表团，秘密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手下的人员也在会场上进进出出，频繁地进行着串连活动，好象要组织一场更凶的反击和围攻。但是过了几天，“反击”并不有力，队



伍也不齐整，有的党只是一般性地“谴责”了我们几句，有的党连我们的名都没有提，只是影射地说了几句。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仍然明确表示态度，不同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我们致词以后，还有不少德国群众到我国使馆去索取我们的祝词稿看，有人看了当场表示赞同我们的态度。有一位从事冶金专业的老教授，听到我们致词的消息后，特别邀请我国的几名研究生到饭馆里谈心，他坦率地表示，他认为中国党是正确的，而他们党中央搞的那一套是错误的。

德国党代表大会于一月二十一日闭幕，我们代表团于二十二日离柏林回国。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的同志和我们同机返回。德国党的这次大会，不仅未给他们致词的机会，连书面贺词也未予发表，就因为他们的贺词中，指出了公开片面地批评中国党无助于团结，这样做是敌人所欢迎的。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和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一起回到北京。至此，我们结束了东欧四国之行。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保共“八大”和匈党“八大”，到十二月的捷共“十二大”和一九六三年一月的德党“六大”，赫鲁晓夫集团精心策划了对我们党的围攻，也一度使我们显得有点“孤立”和“难堪”。尤其是在捷共和东德两党的大会上，公然抛弃一切礼仪，对我们进行喧闹和起哄，这也是极其罕见的事。我们作为我党派出的代表，不论在何种场合和形势下，都认真地执行着我党中央的指示，“我自岿然不动”，顶住并应付了种种不利局面。一些参加了这些大会的外国记者，看到了当时的情景，根据我几次面对反华喧闹时，都表现得异常冷静和沉着，就在他们新闻报

道中说我的态度始终是“泰然自若”的。事后有人把我和赵毅敏同志在同一时期内出席了几国党代会的事，编了几句打油诗，其中两句是“‘赵再见’（注）独战‘罗马国’，‘伍泰然’四闯‘恶虎村’。”毛主席听到后颇表赞赏。当时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表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下，我们当时尽了自己的党员义务和代表职责，努力维护着党和国家的尊严，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只能如此和无可厚非的。尽管在一个历史时期之后，再来回顾这段历史，确有经验教训可以吸取。但是，我们党同苏共的争论，却不是我们挑起的，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和国际范围内，更不是我们党的责任。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我们党遵循着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求同存异，后发制人的方针，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 五、二去莫斯科

（1963.7和1964.11）

### 一九六三年的两党会谈

东欧四国的党代大会及同时召开的意共党代大会，预示着国际共运的公开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中苏关系全面地恶化了，苏共在赫鲁晓夫集团操纵下，自中央至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纷纷作出反华的决议，赫鲁晓夫连续发表反华讲话，又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报刊上和广播中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中国党的文章、讲话和材料。党

---

注：“赵”在意大利语中是“再见”的谐音

内分歧又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赫鲁晓夫集团片面决定撤走了一千三百多名来华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几十项合同和协议，废除了二百多个科技合作项目，又在中苏边境挑起纠纷，在新疆等地区进行颠覆活动，又搞了许多“小动作”，如纵容歹徒捣毁我驻苏使馆展览橱窗，驱赶我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等等。两党两国关系已处于尖锐矛盾之中。与此同时，世界四十多个兄弟党也发表了反对中国党的决议、声明和文章。由于中苏对立，许多党内也因对中国党的不同态度，发生了分歧以至分裂，形成了许多派别。一些赞同并追随苏共的组织，被我们称为“修正主义”派；一些支持我党的组织则自称和被我们称为“马列主义”派或“左派”。所以那时见报的许多党名的后面，常常同过去的联共（布）党一样，也加上一个括号，标上“马列”等字样，以示与“修正主义”派的区别。当时的这种分裂局面，确实是广泛而又深刻的。西方世界对此大为幸灾乐祸。欧美报纸上高兴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美国总统肯尼迪说，在国际关系上是“没有什么永久的敌人”的，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将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为转移。美国报刊宣传“在赫鲁晓夫同赤色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当时的形势，确实如我们那时所说的，组成了一部“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在此世界性的反华声浪中，我们当然不能沉默。从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春的近三个月内，我党连续发表了八篇重要文章，以回答各国党对我们的批评和攻击，为我党的观点和政策，一一进行了答辩。所有这些文章，实

际矛头都是对着苏共领导集团的，但是当时却采取了留有余地的做法，除了直接指名攻击我们的西欧几国的党以外，对苏共及赫鲁晓夫却不点名，虽然谁都知道，这些文章批的是谁。在那个时期内，全党、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人，都密切注视着国际共运分裂和中苏关系破裂的事态发展。我们以及世界上关心同情我国的人，一面对苏共领导集团的欺人逼人太甚感到愤慨，一面又对这种恶劣形势感到忧虑。我个人由于从事对外联络工作，更以绝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场紧张的国际纷争之中。

一九六二年以来，越南、印尼等国的兄弟党就建议召开各国兄弟党的代表会议，以解决各党之间的争端问题。一九六三年三月，苏共中央给我党来信，也提出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并表示要“停止公开争论”。三月九日，我党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提出在召开各党会议以前，先进行中苏两党会谈，并建议赫鲁晓夫或苏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来华进行会谈。还表示为了给各党会议和中苏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党在保留公开答辩权利的前提下，可以“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三月三十日苏共来信，同意举行两党会谈，但表示赫鲁晓夫已经来过中国三次，而毛泽东同志才去过苏联两次，他早曾表示要第三次访苏，因此苏共中央向毛泽东同志发出邀请，希望他在“即将来临的春天或夏天——我国一年中的好季节”，赴苏访问和休假，同时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会谈以交换意见。我党研究了苏共来信，于五月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告知对方，毛泽东同志现在不拟访苏，中共中央将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会谈，时间建议在六月中旬。后来苏方提出将会谈时间定在七月五

日以后，双方达成了协议。我党中央随后确定了参加中苏会谈的代表团人选，代表团团长为总书记邓小平，副团长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团员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候补书记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驻苏大使潘自力；还有姚溱等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也将一起赴苏参加会谈工作。

在我们准备赴苏会谈的过程中，我党中央于六月十四日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由于全文共分二十五条，所以又被称为“二十五条”。此文对苏共来信中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谈谈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建议”，以便有助于中苏两党以及各国兄弟党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在即将举行的两党会谈中，进行逐点的和详细的讨论，并在将来的兄弟党会议中交换意见。这个文件除了系统地、正面地阐述了我党在国际共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外，也全面而严厉地批判了苏共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二十五条”中指出，我党同苏共不是在某些个别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而是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这一文件在发表以前，曾经由中央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在定稿以前，又将稿子送交几个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兄弟党，以征求他们的意见。“二十五条”的发表，当然使赫鲁晓夫等人十分不满，他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自己的讲话和苏共中央于六月十八日和六月二十一日的文件中，指责我党的“二十五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和攻击”。他们“断然拒绝”我党的各项建议；又要求我国立即召回我国驻苏使馆五名工作人员和研

究人员，因为他们在苏联散发了我党的“二十五条”。他们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使当时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不过尽管如此，双方都未表示要取消会谈，我们也就在这种极不友好和不平静的气氛中，在双方激烈的争论和指责声中，仍然按原定计划赴莫斯科参加会谈去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邓小平、彭真同志率我们代表团全体同志出发离京。这一次出访真有点出征的味道。清晨七点半钟，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全体到机场欢送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的驻华使节和我们代表团成员的家属也都参加了欢送。我们与送行者一一握手告别，他们都祝愿我们早日胜利归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等领导同志，一直送到飞机舷梯前。我们的专机于当天下午到达莫斯科，与已在苏联的潘自力同志会合。苏共中央来欢迎我们的人，也就是这次会谈的苏共代表团成员，他们是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也都是苏共的一批重要人物。

在会谈前夕以至会谈的全过程中，不仅没有停止相互攻击，以创造出一个好的气氛来，相反争论比平时更激烈。除了在报刊上连续攻击对方，还在外交上一个照会又一个抗议地打着官司。七月初因我国驻苏使馆展览橱窗被砸，激起我国的强烈抗议。接着苏联外交部又宣布我使馆几名工作人员和研究人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赶回中国。我国则对这些被驱赶回来的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发表外交照会，抗议苏联这一无理行动。苏联外交部和报纸上则反击说，被驱赶回国的人在

苏联散发“二十五条”等文件，是“违反苏联现行制度”和“干涉了苏联党内事务”等等。七月四日，即我们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天，苏共中央还发表声明，指责中共继续加剧论战，攻击和诽谤苏共和别的兄弟党，又宣称他们将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路线。一面攻击，一面又提出迅即停止公开论战，摆出一副强加于人的架势。七月五日，即我们代表团出发和到达时，我党中央也发表声明，顶回了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中对我党的指责，并责成我们代表团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对苏共的攻击给予必要的评论，还要求我们“以最大的耐心，尽最大的努力”，寻求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表示对会谈仍然寄以希望。我们到达莫斯科并已开始会谈后，七月九日，苏共中央又发表声明，指责我国大肆欢迎被苏联赶回国的人，“是企图在人民中煽起对苏联的不友好感情，使会谈的局面尖锐化”。七月十日，我党马上再回了一个声明，指责苏共的言行是掀起反华运动，使中苏分歧扩大化。说在我国的苏联人一直在中国散发苏共的材料，苏联单方面禁止我国人员在苏散发材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此同时，我国报刊上摘要发表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各大城市和主要报刊刊登的反华决议、文章和消息。接着，七月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天，也就是两党会谈的同时，我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许美帝插手中苏分歧》、《反华大合唱中的印度反动派》等社论和观察家文章。

两党会谈就在上述不断发表的党的声明、政府照会和报刊文章对骂中开始了。在这种强烈的不协调的“音乐伴

奏”中，如何能平心静气地进行平等协商和交换意见呢？我们明知这种会谈不可能取得什么一致的意见，但是为了表示我们还是要团结的，还是照常赴会与苏共代表团会谈。会谈中我们代表团根据中央的指示，按照“二十五条”的精神，严厉批判了苏共的一系列观点，表明我党与他们的分歧性质是要不要革命，遵不遵守马列主义原则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问题。指责苏共在会谈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攻击中共，不断煽动苏联人民对中共的不满，并且一直不敢发表我党致苏共的信件和有关文章。苏共代表团当然寸步不让，把我们指责他们的话又照样回敬给我们。双方就这样你攻过来我顶回去地进行着“会谈”，这当然不可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西方国家舆论形容这种会谈实际上是一场“聋子对话”。事实正是这样，每次会谈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各讲各的一套，就不可能寻求能解决问题的共同点了。每次会谈的基本方式是今天你拿着准备好的稿子，由代表团团长或主要成员到会上念一通，翻译用对方语言重复一遍，二、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另一方听了当天不予回答，这一次会议就算结束了。休会以后代表团内马上进行紧张的研究，分析对方所讲的内容，提出我方回答和反驳的初步意见，交由随代表团去的“秀才”，执笔写成在下一次会议上发言的稿子，有时是团长、副团长亲自指导写稿和定稿，提到下一轮的会议上宣读。将这稿子照念照译一通，下一次又轮到对方发言了。如此来回反复的论战，代表团的工作确是十分紧张的。会谈的唯一成果，就是双方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就实际情况看来，既然举行会谈，总应该有个解决问题的



愿望，双方都有点起码的诚意。当然，当时要赫鲁晓夫有什么良好的愿望和诚意，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就我们方面来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式，不能真的是“聋子对话”式的无效劳动，还是有着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的。

作为会谈“伴奏”最强音的，是《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发表。信是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其中对我党的“二十五条”作了全面的反驳与回击。苏联在发表此信的同时，也发表了我们的“二十五条”。这样，中苏两党争执不休的主要内容，就在苏联全国以至全世界完全公开了。“公开信”和“二十五条”发表以后，苏联各报连续发表了《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社论，接着又发表了大量支持苏共中央、反对中国党的文章、消息、读者来信等材料，其中有的公然煽动我们党和国内的“健康力量”，起来反对我党中央的领导。当时，苏联的一切宣传机器，几乎全都投入了这场激烈的中苏争论，每一张苏联报纸和每天的苏联广播，都充满了反华内容。在会谈期间苏方采取的另一个重大行动是签订苏、美、英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这条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阻止我国拥有核武器。这时，在莫斯科的号召下，东欧各国报纸也相继发表了苏共的“公开信”和我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有的只登了“二十五条”的摘要）。几天以后，我党中央又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表示苏共的“公开信”不符合事实，我党不能同意，还决定于七月二十日在我国报纸上全文重登“二十五条”，同时作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反面材料，附发了苏共的

“公开信”，信前还加了几千字的《编者按》，指责“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有着肮脏目的等等。我国的广播电台也用几种语言，连续几十个小时地全文播发了“二十五条”和“公开信”等双方的文件材料。

在这场白热化的论战声中，正在进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当然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双方都无意再进行这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聋子对话”了，就于七月二十日达成了唯一的一项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两党中央另行商定。实际上中止了这场世界瞩目却无一成效的两党会谈。我们代表团于当天离开莫斯科回国。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我们的专机返抵北京。中央为代表团安排了一场破格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党、政、军、民和地方各界负责人与群众代表，加上社会主义各国使节和代表团成员的亲属，五千余人到机场热烈欢迎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走下飞机时，机场上锣鼓喧天，口号震耳，到处都是红旗和大幅标语，只见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亲自走到专机前，同小平、彭真等同志热烈握手，亲切问候，还让我们代表团全体人员绕场一周，与欢迎群众见面。我们每人都接受了少先队员献上的束束鲜花，被各色彩带所环绕，每到一处，那里就是一片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通过对代表团的欢迎，显示了我国人民同党的团结。当我们的车队从机场驶回市区时，代表团成员都没有回去休息，而是随着毛主席的车一直进了中南海，立即向他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详细汇报了在莫斯科会谈的具体情况。领导同

志这样抓紧时间听取汇报，可见对这次会谈的关注和重视。第二天各报都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用通栏的标题和照片报道这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在这次欢迎中和汇报时，毛主席一直显得兴致勃勃，情绪很好，看来他对于我们此次莫斯科之行还是满意的。

两党会谈中止以后，中央又组织和发起了“反修”斗争的新战役，对苏共“公开信”进行系统而详尽的批判反驳。自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止，先后发表了著名的“九评”。“九评”是在中央的指示下进行编写的。

这一段“反修”斗争，王稼祥同志基本上没有过问。他对康生一直抱有戒心，曾经明确表示，不让康生插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开始我们对此还不太理解，直到以后康生逐渐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才认识到王稼祥同志是很有眼力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康生对王稼祥同志一直怀恨在心，总在伺机报复，这次“反修”斗争，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在此以前，康生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工作，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先是“养病”六年，一九五七年以后，他这里“视察”，那里巡游，一会儿插手教育问题，一会儿又过问文艺工作，还画国画、写诗词和收集（实际上是盗窃）古董，十分逍遥自在。可是他却又不甘寂寞，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终于发现了可钻的空子，拼命抓住“反修”问题大作文章，骗取了中央的信任和重用，逐步排挤了王稼祥同志，篡夺了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大权，由他插手以至把持了中联部的工作。在“反修”斗争开始以后，王稼祥同志就曾提出过一些正确建议，例如在六十年代的头几年，我

国面临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王稼祥同志向中央提出，我国的对外政策应当采取和缓的方针，不能树敌过多，对外援助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尽量保持一个相对平静的国际环境，以求早日克服我国的内部困难，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这些建议与康生那一套是根本对立的，他当然要加以反对并更加忌恨王稼祥同志。他就用了种种手段，将王稼祥同志的正确建议有意歪曲为对帝、修、反要和，对外国支援要少的“三和一少”的“右倾路线”，以后又上纲为投降帝、修、反和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三降一灭”的“叛变罪行”，对王稼祥同志进行了严重的打击迫害和诬陷，完全剥夺了王稼祥同志在对外联络工作上的领导权和发言权。从王稼祥同志与康生的斗争过程来看，康生此人是非常阴险的；而王稼祥同志则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他对康生是早有警惕的，他当时提出的政策主张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可是却一时“人妖颠倒是非淆”了，竟让康生这样的阴谋家一度窃踞了中央的领导位置，使王稼祥这样的好同志长期受到迫害。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原来计划写十篇，才发表了九篇，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了。就在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夜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此还毫无所闻时，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就交待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

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消息是令人高兴的。在此以前，我们每次同这位大使打交道，总免不了发生争执以至争吵，这次却因为他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欢迎。他走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杨尚昆同志，再由他转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里的同志们宣布了，大家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兴。同时，这条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了。当时，有许多同志对此都很高兴，认为是我们的“九评”文章把赫鲁晓夫“评”垮的。客观地说，赫鲁晓夫的下台，主要还是其内因造成的。也就在赫鲁晓夫垮台的当天，毛主席下令，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两条看来互不相关，实际密切呼应的爆炸性消息，一时间成为震动世界的特大新闻。我国人民以此引为值得骄傲的特大喜讯，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宣传效果。正如当时有的国际上的左派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第一个消息是赫鲁晓夫下台，第二个消息是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日益增长的威力”。继此，我国又发表了“九评”以后的第十篇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对赫鲁晓夫的路线及已进行的斗争，作了一个总结。文中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早就预见到赫鲁晓夫的这个下场”，并预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是走不通的。”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为着改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国党和政府又作

了新的努力。

### 一九六四年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

赫鲁晓夫下台与勃列日涅夫上台，标志着国际共运的大论战进入一个新阶段。最初我国对苏共中央这次换“马”的意图还不太清楚，很希望形势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对苏共新领导是采取争取和欢迎态度的。当勃列日涅夫等就任新职时，我国领导人很快联名向他们发出了贺电，以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热情语言，对苏联新领导人以及苏联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和着陆的成功，表示了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等人也很快联名向我国领导人复电致谢。这些迹象给了人们一种希望。在十月革命节四十七周年前夕，我国领导人又致电勃列日涅夫等人祝贺节日，并提出了团结对敌的真诚愿望。与此同时，我国报纸几年来第一次不作为反面材料转载了苏联《真理报》社论《苏共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和编辑部文章《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伟大旗帜》。接着又在北京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隆重集会，《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提出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之间，实行联合、相互支持援助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苏联大使举行的节日招待会上，我国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亲自出席，并在致词中表示几年来的中苏分歧不足为怪，两党两国之间总是要团结的，赫鲁晓夫之类的制造分裂者只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上述一系列行动，都是中央在分析了新形势以后作出

的。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这次十月革命节，可能是一个改善中苏关系的有利时机，我们应当加以利用。就由周恩来总理出面分别接见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向他们表示我国打算派出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以便与苏联新领导人接触，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以及各兄弟党之间关系的途径。各国大使听了，都很赞同我们的意见。随后，我国的这一愿望也为苏联了解和接受，就由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我国发出正式邀请，欢迎我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的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庆祝活动。于是我国就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贺龙元帅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赴苏。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也参加了代表团，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加上一批其他随员等共达五、六十人。这一强大阵容表明，我国代表团不是一般性的礼节性访问，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和任务的。它虽然是几年来第一个不是为了吵架去的代表团，却又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去的，所以各方面都非常重视这一代表团的出访。

十一月五日，我国党政代表团分乘两架专机离京赴苏。越南党政代表团和我们同机前往。专机飞达莫斯科时，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到机场迎接我们。当我们同柯西金等人亲切握手问候，接受献花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时，真好象又回到了中苏友好的岁月里。到达的次日，我们循例一一拜访了新上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相互都作了十分友好的表示。十一月七日，我们代表团全体人员应邀参观了红场上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周

总理和贺龙元帅同苏联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列宁墓的检阅台，其他同志则在一侧的观礼台上，观看了苏联武装力量和新式武器的检阅，群众游行虽然照例都是那么一套，但是多年不见，重新看来还是颇觉热闹的。七日下午，我们又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晚上，还出席了盛大的节日招待会。这天从白日到夜晚，我们都在节庆活动中度过。我们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足够的礼仪接待，我们也利用各种场合，主动同苏方人员表示友好，很希望这次访问，能改善一下恶化了几年的中苏关系。但是，这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后来的事实证明，却是事与愿违。

我们代表团赴苏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苏共新领导的态度，希望他们能改弦更张，抛弃赫鲁晓夫那一套。同时还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赫鲁晓夫当权时曾通过一个决定，预定于一九六四年底召开一次实际上是围攻中国党的国际会议；苏共新领导上台后，将这次会议改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召开。我们是反对召开这个会议的。现在赫鲁晓夫已经下了台，我们希望将他过去决定的这次会议取消。在节日活动结束后开始与苏方会谈时，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认为这仍然是一次分裂会议，是按照赫鲁晓夫的错误方针定下的，我们建议不再召开。如果召开国际会议，最好首先由中苏两党进行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再与其他各国兄弟党进行磋商，然后才决定是否召开会议。在会谈中我们又提出，我党认为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赫鲁晓夫一手制定的，现在应该对此作适当的修改。哪知这些问题一摆出，会谈就出现了僵局，我们



同苏共根本谈不到一块，并且很快又引起了争论。其实在此以前，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公开讲话和苏联报刊文章中，已经表示苏共仍然要召开这次国际会议，认为“再次召开兄弟党的国际会议的必要性已经成熟”，又宣称苏共将“一如既往地”执行召开这次会议的决定，“始终不渝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政治路线。在会谈过程中，苏联领导人表明的果然仍旧是这种态度。勃列日涅夫等人一开始就坚持着一种非常固执的立场。他们说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但是“二十大”路线并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出来的，而是在苏共中央集体领导下共同确定的正确路线，中国党关于要苏共修改它的“二十大”以来的路线的提法，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这个问题上还可说得上是苏共党内问题，我方并未多加纠缠。但他们又说，已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召开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不能取消原定计划，必须继续如期举行。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于是开不开这次会议的问题，就成为会谈中争执的焦点，起初有过的一点和缓气氛又被破坏了。我们在会谈中发现，勃列日涅夫此人也很蛮横，一开始就态度很僵硬，谈来谈去很难有协调的可能。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当然不能说是哪一个党的内部问题，而苏联党则完全是以老子党的姿态来决定问题的，这延伸到国家的关系上就是霸权主义的表现和行动。因此，继续会谈下去已无实际意义。

在此期间，苏方还挑起了一起对我党极不友好的事件。十一月七日晚上，我们代表团参加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时，贺龙同志同苏联元帅崔可夫等一起谈话中，苏联

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同志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同志一听这话，立即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崔可夫元帅也对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贺龙同志马上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恩来同志当即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等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我们的严重挑衅。勃列日涅夫在了解情况后，对周总理掩饰地说，马林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不必介意。恩来同志立即指出，这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在后来举行的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时，周总理就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又向苏方提出了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了道歉，我代表团对此才未再加追究。这些情况表明，我们代表团已经不可能取得任何预期的成果，代表团已没有继续访问的必要。这次兴师动众的赴苏访问，开始是满怀希望而去，最后是不欢而散地归来。

从十一月五日到十一月十三日，我们除参加了节日活动和与苏共领导人进行了几次会谈外，还参加了一些别的活动，如由克里姆林卫戍司令等高级官员陪同，拜谒了列宁墓和敬献花圈，还同我国驻苏使馆人员、我国留苏学生和我国在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研究人员等见了面，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向他们讲了话。十一月十三日又是晚上二十二时，我们代表团全体人员离苏回国。十一月十四日下

午到达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及党、政、军、民各界领导人，还有数千群众，都到机场迎接，其场面和气氛与一年多以前中苏两党会谈归来时十分相仿，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上显示团结和力量的示威。

一九六四年的这次访苏，是我建国以来至今最后一次去莫斯科。近二十年来，世界形势以及我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不正常的中苏关系仍然没有多少改善。我作为早年曾在苏联受过教育并在苏联红军中工作过的中国老战士，建国以后曾经多次访苏，参加过缔结中苏友好同盟的活动，尽管我们两党两国发生了为时已久的分歧和分裂，我相信两国人民和广大党员还是有着友好的愿望的。当然，愿望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苏两国关系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派了百万大军压境不算，还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自己又占领阿富汗，形成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在苏联当局没有改变它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以前，要想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还是困难重重的。

## 六、出席罗共“九大”

(1965.7)

一九六五年春，我因病到海南岛休养了一段时间。南国风光完全是另一派景象。北方是冰天雪地，但在海南岛却可以下海游泳。我们每天的活动就是下海、散步、阅读轻松的书籍。当时斯特朗老人家也在那里休息，我们是邻居，所以每晚还有一次桥牌战斗，老太太是非赢了不结束

的。我们也到了“天涯海角”之地，那确实是引人入胜的。六月间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来我国休假，由我陪同他去黄山等地游览。他到黄山后，被那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求到山顶上看个痛快。我见他年高体弱，山高路险极不安全，便电告周总理请示能否派直升飞机送他上去。总理将此事交待给了南京空军，派负责干部和机组到黄山顶侦察了一番，然后由南空司令部的同志来向我介绍情况，说是山顶场地狭小，又处在风口上，直升飞机无法降落，难以保证安全。我们将此情况向胡志明主席说明了，他只得十分遗憾地打消了上山的念头。

七月中、下旬，我参加了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从一九六〇年起，国际共运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分裂，各党之间——尤其是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而这一切正是从一九六〇年六月在罗马尼亚党代大会期间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劳动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的。五年以后的罗共，即在其“九大”前后，多次表示，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之间的团结，主张用冷静、明智和建设性的态度解决争端，对于苏联侵犯别国利益，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言行，公开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罗共的这种态度，使他们成为东欧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另一个与我党保持友好关系的党。也正因此，我党对于罗共这次代表大会，是十分重视和热情的，同不久以前我参加的保、匈、捷和东德四国党代会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我党出席罗共“九大”的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总书记，因为我在中联部一直主管与苏联、东欧党的关系，所以我也参加了代表团。代表团于七月十七日凌晨乘专机离京，朱德、彭真、贺龙和李先念等同志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当天下午到达布加勒斯特，罗共主要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等亲自到机场迎接。三个月前，罗共原领袖乔治乌·德治同志去世，齐奥塞斯库接任了总书记职务。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斯托伊卡、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也一同迎接了我们。这说明了罗党对我党代表团的重视。我们代表团到达后，首先去向不久前去世的乔治乌·德治墓和其他烈士墓、英雄纪念碑等，敬献了花圈。

七月十九日上午，罗共“九大”开幕，邓小平同志和各国党的代表团长同罗共领导人一起登上主席台。齐奥塞斯库在雷鸣般的掌声后，首先宣布了党的名称和代表大会次数的更改，在此以前罗党叫做罗马尼亚工人党，现在恢复原名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党代表大会也从罗共初创时期算起。大会又为几个月前去世的乔治乌·德治致哀。这时罗共已有一百四十余万党员，出席“九大”的代表有一千三百几十名，有五十多个外国兄弟党及民主党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际共运分裂和中苏论战的形势下召开的，在齐奥塞斯库的总结报告和代表发言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了这些问题。齐奥塞斯库在报告中说，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和民族特点所形成的活动条件不同，各国在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夺取政权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等问题上，出现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是很自然的事。每一个党都有权利独立地决定自己所采取的方

式，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这不应该成为各党之间争论的内容，而应该看作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在本国具体条件下的应用，是对世界共运革命经验宝库的贡献。这些话一方面实际上批判和反对了苏共自奉为“老子党”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对我们的某些提法不尽同意。对于各党之间特别是中苏两党之间的激烈争论，齐奥塞斯库说，应该从马列主义共同观点出发，遵守各党独立、平等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同志式的诚恳讨论，相互尊重和信任，谋求相互谅解和接近，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胜利等基本问题上，达到团结一致。他说各兄弟党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是应该而可以克服分歧的。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事实上至今也没有真正做到。

二十日下午，邓小平团长代表我党中央向大会致祝词并宣读了贺电。祝词和贺电称赞罗共在坚持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捍卫本党及本国的独立自主和正当权益，维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方面，“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表示中国党认为只有坚持马列主义理论阵地，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中规定的革命原则，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能谈得上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团结，又表示了我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决心。邓小平同志在台上致词时，我不由想起五年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我曾针对我党正被围攻的形势，写了“哀兵必胜”几个字的条子给彭真同志。当时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半票的支持，确是处于一种“哀兵”的地位。可是

也正因此，不少国家逐渐看清了赫鲁晓夫之流任意欺压别国的霸权主义者面目，开始转而同情和支持我党。到一九六五年，公开支持我党的兄弟党及其组织已为数不少。在这次参加罗共“九大”的各国党的代表中，支持我们的还是大有人在的。所以当邓小平同志致词时，会场上的反应是很好的，致词的前后都是全场起立和长时间鼓掌，致词中间也时时被掌声所打断。

大会期间，我们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市第一书记陪同下，游览了市容，参观了新住宅区和郊区的农作物研究所，还参观了几个炼油及石油化工等配套工厂。一天中午，我们正好来到一座酿酒厂的葡萄园和造酒车间，就在那里品尝了美酒。二十三日，我们又在布加勒斯特州第一书记陪同下，访问了罗中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同我国京郊的芦沟桥中罗友好公社结成了姊妹社，经常互赠礼品和友好往来。这次我们代表团来访，合作社接待得十分隆重热情。从村外大路两旁直到村子中心，排满了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社员群众，见我们一到，马上按照当地风俗，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年社员，向我们献了面包和盐。随后我们参观了合作社的畜牧场、水稻田和向日葵地，他们还特别请我们看了用芦沟桥公社送的种子种出的玉米、大豆、青豆和南瓜等农田。许多正在田间劳动的社员，都向我们热情招呼表示欢迎。最后双方互赠礼品，我们将从国内带去的两台手扶拖拉机，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送给了这个农业合作社。

七月二十四日，罗共“九大”在一片“乌拉”的欢呼声中胜利闭幕。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和我们代表团全体成

员，同我国驻罗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与留学生等见了面，向他们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并表示了对他们的希望。二十六日，新当选为罗共总书记的齐奥塞斯库和罗共主要领导人斯托伊卡、毛雷尔等，同我们代表团举行了告别式的会见。二十七日，代表团离开布加勒斯特回国。再次路过莫斯科时，受到苏共领导人谢列平、沃罗诺夫等人的礼节性迎送。我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同志也在机场迎送我们。二十八日上午，我们回到北京，朱德、董必武、彭真、谭震林和杨尚昆等同志到机场迎接。我们代表团离京和回国的时候，都在《人民日报》一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消息和照片，表现出中央对这次出访的重视。

从罗马尼亚回来近两个月后，我就去安徽农村参加“四清”了。

## 七、参加“四清”

(1965.10——1966.4)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和中联部的四个同志，去安徽的六安、霍丘等地，参加了为时半年的“四清”运动。这是全党干部轮流参加的一次在农村等基层单位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由于建国以后一直从事外事工作，对国内工农业情况特别是农村基层工作了解甚少。若干年来，只有一九六一年曾经到河南、陕西和山西几省农村人民公社、三门峡水利工地和太原钢铁厂等地进行过参观访问。在走访这几处时，还曾先后遇到董必武、吴玉章等老同志，一度同他们结伴而行，交谈过当时的观感。因为那次实际上是参观性质的，时间又短，仅仅是一次走马观花，了解



的情况不多也不深。“四清”运动开始以后，我就几次提出下去蹲一蹲点，了解些基层的实际情况，可是领导上却总是不让我走。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对“四清”运动的指导方针，中央领导人之间意见并不一致，过早下去弄不好会跟着“犯错误”。直到中央制定了新的文件，中央才同意我去安徽参加一期“四清”工作。

十月间，我们同安徽省委以及所在地、县委的“四清”工作队一起下了乡。为了工作方便，我还用了个假名字，叫“吴光”，住到一个生产队里。那个生产队将场院边上的一间空房子，整理出来分给我住。平时吃饭，则到社员家里吃派饭。按照当时规定，轮到派饭的社员家不得用豆腐以上的好菜招待我们，只许吃普通农家的家常便饭。当地农民的生活很苦，副食主要是腌酸白菜，吃豆腐就算是会餐了。除了“四清”工作之外，我还同社员一起去田间参加劳动。当时我已近六十岁了，农民的本性真是善良呵，他们见我参加劳动很费劲，又是笨手笨脚的，总是挑些轻活给我干，我虽尽力而为，但是也只能算做一个不合格的辅助劳动力。这样，我同许多农民交上了朋友，能听到他们的知心话。我基本上执行了一段与贫、下中农“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生活。在“四清”中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却非常愉快，大有回到青年时期之感。

我在“四清”期间，大量时间是参加或主持“四清”工作队的一些会议和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各种集会，也曾经就当地运动中的问题向干部们作过报告。在这段时间内，我接触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了解到许多农村的实际情况，对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了一些调查研

究。这对我来说，不仅增加了许多知识，对自己的思想也有不小的触动。几个月的生活给我的突出印象之一是，全国解放十多年了，各方面工作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但是同实际的需要和可能相比，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相比，我们的进展还是太缓慢了，人民生活仍然异常艰苦，农业生产还相当落后。

当时我曾利用机会，访问过安徽省的几个重要的水利工程，那是淮河中游的淠、史、杭三条支流上的大型灌溉工程，特别是佛子岭、梅山和响洪甸等三大水库，这是几个完整的配套成龙的水利系统，其规模可与我国古代的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相媲美。当时预计，这套工程设施全部配套运转使用并发挥作用以后，不下五年，当地的农、林、渔业生产以及发电、航运等事业必将大大发展，人民生活也会大大改善，这里的面貌就将大变。我们在参观这些工程，倾听这些介绍时，也感到很受鼓舞，心想五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〇年就可以看到成果，我们已经认识了的那些农民乡亲，生活就将富裕起来，这样我们的心上将得到告慰，共产党人已经为人民做了好事，为后代人造了福。我还暗暗地下了决心，过几年再去看望那些熟悉的老乡和当地所取得的成果。哪里知道，几个月以后，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场席卷全国大地的政治大动乱，把正常的生活和劳动，都给搅乱了，冲垮了！我们的，也是人民的美好愿望，暂时落空了，想起来真叫人心疼！

其实，这场政治动乱的苗头，早就显露出来了。那些年，正是林彪鼓吹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和“突出

政治”的时候，首先在军队里发行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并大肆宣传到处推销。我在离京以前“走后门”得到了几本，后来到南京时，部队同志又送了一些给我们，我将它分给了“四清”工作队的一些同志。当时还觉得十分珍贵难得，不料后来此书不仅全国人手一册，还译成了各种外文，在许多国家散发，成为闻名全球的发行量最大的“小红书”。我们在“四清”中，依据的是一九六五年初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

我在公社住着时，也曾寻找和处理过如文件所说的“走资派”或“四不清”干部，我自己就曾多次同一个公社干部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动员他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卸掉包袱，改过自新。我记得他的主要问题是利用职权，动用公款为自己盖房子，与一个女劳动模范结婚，又花了许多钱，还打击过反对他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在当地看来这些问题还是相当突出的，因而撤销了他的职务。当时认为，对他的斗争和处理，也是符合文件精神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们这一期“四清”结束。返回省会合肥时，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同志安排我们在毛主席住过的宾馆——稻香楼休息，这同我们不久前住过的生产队场院小屋相比，不能不有所感慨。当月，我们从安徽回到北京。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运动初期我还在部里抓工作，并且同康生等一起又去过阿尔巴尼亚，

不久就也被卷入了这场历时十年的政治大动乱中。

## 八、二访阿尔巴尼亚

(1964.11 和 1966.10)

### 参加阿解放二十周年庆典

六十年代中，我国在国际上有过一个“最亲密的战友”——阿尔巴尼亚。当时亲热得确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虽然两国相隔千山万水，国情差距极大，但是友好往来却异常频繁。同他们的不断联系和互相访问，自然成为我们中联部的工作重点之一。一九六四年我随我国访苏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后，不欢而散地回到北京还不满十天，又奉命作为去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参加他们的解放二十周年庆祝活动。这一代表团由李先念同志任团长，团员中有许世友同志和我，还有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狄子才、北京市副市长范瑾和我国驻阿大使许建国。同机赴阿的还有我国文化代表团曹瑛、林林等同志，中阿友协代表团彭康、吕梁等同志。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们离京启程，二十五日到达地拉那。那时的阿尔巴尼亚，大概也就剩了我国这个唯一的好朋友，所以对我们的欢迎是格外的热情友好，机场上到处都是中阿两国国旗和有关中阿友好的大幅标语，欢迎的人群中还有许多中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留阿学生。我们到达的当天下午，霍查、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党政主要领导人就会见了我们，正如新闻中常说的，“作了兄弟般的亲

切谈话”。随后连着几天参观了他们全国最大的地拉那大学、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民族解放战争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等，还向烈士墓献了花圈。

十一月二十八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纪念日的，我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应邀参加了在“游击队”体育馆举行的庆祝大会。同时参加的还有以李钟玉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以阮维楨为团长的越南代表团和罗马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印尼、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的代表。他们大都是同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因而也同阿尔巴尼亚友好的，其中有的只是该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马列主义派”代表。我国代表在大会上受到了特别的欢迎和礼遇，当霍查向大会介绍到中国代表团时，全场群众一齐起立，狂热地有节奏地欢呼“恩维尔——毛泽东”等口号，并长时间热烈地鼓掌。

在这个大会上，霍查发表了歌颂阿尔巴尼亚的成就，赞扬中国和抨击苏联的长篇演说，我们都陪着听了几个小时。霍查也是个能说的人，虽然当时他们内政外交的状况都不太乐观，他演说时却充满了自信，口气很大。他常一边讲话一边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的都是我国的“大中华”烟。在他们的领导人中，相比起来似乎谢胡比较稳健温和些，不料他后来却“自杀”而死了，看来他们领导层中也是存在深刻矛盾的。阿尔巴尼亚党当时同我们的关系确是很不一般，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他们有个女政治局委员叫贝利绍娃，一九六〇年访华时，我党向她介绍了一些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虽然也没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她却在回国路过苏联时，把我们同她谈过的问题，又

向苏共领导人透露了，这使霍查大为恼火，马上将她开除出党，连她的丈夫(是一个部长)也被撤了职。这说明他们很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而决不允许任何反华亲苏的活动。

在这次庆祝活动中，我国党政代表团一直处于一种特殊荣誉的地位。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讲话中，充满了对我国和中阿关系的赞词，我们党和国家被一再称颂为“伟大的”、“光荣的”、“兄弟的”和“姊妹的”等等，中阿友谊被赞为“紧密的”、“战斗的”、“永远的”、“牢不可破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等等。在群众集会上，不断看到我国领导人的画像和我国国旗，不断听到“恩维尔——毛泽东”、“人民中国”和“友谊是保证”等等口号，其热烈程度远远超过我国的“中苏友好”时期。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们又在地拉那市中心广场，参加检阅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这场兴师动众的庆祝盛典，前后进行了三、四个小时，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在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里，可能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苏共对他们的欺压，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他们这种搞法，实际上没有脱出苏联那一套。他们的阅兵式，前列是以霍查、谢胡命名的军事院校和以古代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命名的少年军官学校，从分列式的队形到方队的步法，基本上都是苏联操典中所规定的。用来检阅的飞机、重炮、坦克和少量火箭，大都也是苏联过去提供的，可是现在却被用来向苏联“示威”了，想来真耐人寻味。游行后的当晚，又在“游击队”宫举行了盛大宴会，霍查等党政领导人全体出

席，欢宴各国外宾和本国各界人士。在此前一天晚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还陪同各国代表团，出席欣赏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庆祝音乐会。别看阿尔巴尼亚国家不大也不富，但是在组织这些活动上，看来还是很下功夫和不惜代价的。

庆祝活动结束后，有的外国代表团开始回国了，我们又被邀请到阿尔巴尼亚各地参观访问。十二月初，我们在阿党政治局委员科列加等陪同下，先后去了南方海港城市发罗拉和萨兰特，山城培拉特，阿尔巴尼亚全国最大的水电站，以毛泽东命名的纺织联合工厂，还特地去了霍查的故乡，看了他出生的房子和读书的小学。我们每到一地，照例都受到最热情的迎送和高规格的接待，有时天上下雨，群众仍然兴奋地冒雨欢迎我们。到外地访问结束回到地拉那后，霍查等全体领导人又一次会见和宴请我们，真是叙不尽的深情，说不完的友谊。这也难怪，在苏联断绝了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和贸易往来后，我国不得不向他们提供了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的全力支持，中国的各项援助，对阿尔巴尼亚起了重大的作用。而我国当时在东欧也只有这么一个最密切、最忠实的伙伴。就在我们访阿期间，李先念同志还参加了中阿科技合作议定书的签字仪式，我国轻工部副部长罗叔章同志率领着一个科技代表团在那里进行这项会谈。协议中规定中阿两国将不断互派科技专家和实习、考察人员，不断交流科技先进经验和交换资料等等。

十二月五日，我们离阿回国。六日到达上海，在那里停留一天。八日返回北京，正好赶上去印尼、缅甸等国访问的陈毅副总理回京，我们没有离开机场，又参加了对他

的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去阿尔巴尼亚。

### 参加阿党“五大”

我第二次去阿尔巴尼亚，正是“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并震惊世界的时候。那是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国派出党的代表团，去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建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我党代表团团长是康生，副团长是李先念，成员有刘晓、伍修权、彭绍辉。由于国内到处“造反”，影响到同外国的关系也有点紧张，出国时就没有发消息，十月二十八日到达地拉那后才予公布。又是到达当天，霍查、谢胡等阿党领导人就会见了我们，同我们照例“进行了十分热烈和亲切友好的谈话”。阿党代大会十一月初才开，我们就应邀先去各地参观访问。由于卡博同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有过战友之谊，就由他陪同我们出去转。我们参观了中国援建的拖拉机配件厂，听他们大肆赞美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设的重大成就。又访问了阿最大的海港都拉斯，那城市本来人口不多，可是却组织了几千人的队伍，夹道欢迎我们代表团，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康生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康生此人本来就爱卖弄他的知识和口才，当时又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暴发户”而正红得发紫，他洋洋得意地一边抽烟一边信口开河地讲，一讲就是好长时间。正好阿尔巴尼亚人也有发表演说的好爱好，主客轮番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讲，翻译再依次照说一遍，大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把我们搞得十分疲倦。



康生率领代表团在各地参观时，每到一处就向人家赠送我国的“红宝书”、语录本和像章等礼品。不过阿尔巴尼亚人看来倒也乐意接受这些宝贵赠礼，因为他们当时几乎照搬了我国的许多搞法，有着与我国近似的政治气氛。他们也在搞干部下放劳动锻炼、降低干部工资缩小等级差别、军队取消军衔制度、在各部门实行工人监督和教育革命等等“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革命化运动”。对于我国当年的这一套，现在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可是那时却当成好经验介绍给人家，使别国也为我们的某些失误付出代价。当然这也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由于苏联对他们的一系列惩罚性措施，造成他们的严重困难，不得不求助于万里之外的我国。尽管我们自己并不富裕，却不得不给这位“最亲密的战友”以全面的支援。也正因此，阿尔巴尼亚人民把我国当成他们最好的朋友，把我党看作是光辉的榜样。这种情绪在我们这次访问中，尤其是康生在阿党“五大”宣读毛泽东同志的贺电时，形成了狂热的高峰。

十月三十一日，地拉那市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庆祝阿党“五大”的开幕，我们和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和印尼等二十九国党的代表团和观察员也应邀参加了。当天下午，霍查等阿党领导人又会见了各国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十一月一日，阿党“五大”正式开幕，当大会主席介绍到中共代表团时，全场都起立，一面热烈鼓掌，一面欢呼“恩维尔——毛泽东！”成为当天会议的高潮。十一月二日，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并宣读了毛泽东同志署名的贺电。当康生向大会展示贺电上毛泽东同志的亲笔签名时，全场简直沸腾了，一次又一次地欢呼、鼓掌和起立，

有时鼓掌十来分钟都不停息。正是在这份贺电中，阿尔巴尼亚及其领导人被称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耸入云霄的高山”、“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另一份贺电中又说阿尔巴尼亚是什么“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红色根据地”，是世界革命的“光辉榜样”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都成了对霍查和我们自己的讽刺，但是在当时却是很有鼓动性的热烈语言。康生致词和宣读贺电完毕，又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赠送了巨幅锦旗，上面用金线绣着中阿两种文字：“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和战斗友谊万岁！”霍查亲自接了旗，又同康生长时间地热烈拥抱，全场欢呼鼓掌又一次达到了高潮。到现在锦旗可能还在，中阿两党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却早已不存在了。实际上，那时这些吹捧阿尔巴尼亚和霍查的虚夸之词，都是康生制造出的，他当时已经一手把持了我党的对外联络工作。

正是这个康生，在国内“文化大革命”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嫌不够，又把他那一套兜售到阿尔巴尼亚。无论是在大会致词中，还是在别的讲话和谈话中，他一面不厌其烦地极力称颂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套“革命化措施”；一面又反复宣扬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吹特吹其“伟大的胜利”。他洋洋自得地介绍我国正在怎样斗争“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怎样把他们都批得“威风扫地”。又大谈其“反帝必须反修”等“高超”理论，还阿Q式地自吹怎样“不怕孤立，也不会孤立”，同霍查等人相互鼓励，要“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此后不久，康生的同伙之一姚文元，又带着一帮“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代表，访问了阿尔巴尼亚，把他们的那套

极左黑货，再一次推销到那里去。所以霍查等人搞的极左路线，主要的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土特产”，但是也“引进”了康生等人的不少破烂。

我国当时大肆赞扬阿尔巴尼亚，霍查等人对我党当然也毫不吝惜吹捧之词。在阿党“五大”的政治报告中，霍查说他们“感到光荣和自豪的是”有中国作为自己的忠实朋友和坚定战友，毛泽东同志站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是各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莫大幸运”，中国是世界的“社会主义堡垒”、“革命根据地”、“旗手”、“支柱”和“后盾”等等。他们的这些讲话，显然很投合我国一些人的口味，阿党“五大”会上的几个主要报告和许多致词、发言，大量地在我国报刊上全文发表，享有了任何一个党都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可惜我们两党这种一唱一和、互相吹捧的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阿尔巴尼亚过分地依赖我国，我们自己节衣缩食地全力支援他们，他们却总是贪得无厌，嫌我们给得少。在我国本身经济状况不好，实在满足不了他们的过分要求，对他们的支援稍有控制时，他就不满意了，埋怨我们要卡他们，说我们“不讲国际主义”。发展到后来，终于同我们红了脸，干脆闹翻了，从对我国肉麻的吹捧一变而为狠毒的咒骂。正如人们常说的，我们是“花钱买了个仇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是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以汲取的。不过这都是后话，在我们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却是谁也没有预见到后来的变化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在地拉那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歌舞晚会，庆祝这一节日和“五大”的召开。晚会充满了

政治色彩和战斗气氛，许多节目都是表现阿尔巴尼亚人民怎样“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地建设和保卫国家，也有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节目。我们感到，阿人民同我国人民一样，也是勤劳勇敢的，问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如何珍视他们的劳动和斗争精神，不使其白白消耗或把劲儿使错地方。十一月八日，阿党“五大”宣布闭幕。当天下午，在地拉那斯坎德培广场举行了十几万人的大会，全国几乎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赶来参加了，隆重庆祝阿党“五大”胜利闭幕。康生又在这个大会上大讲了一通。晚上接着又举行了盛大宴会，表示庆祝和招待各国党的代表。他们这样大会套小会，晚会加宴会，一个接着一个，自己劳民伤财，把我们也搞得疲劳不堪。

大会和一系列庆祝活动结束以后，阿党中央再次邀请我们到阿各地访问，并且由谢胡亲自陪同。因为阿尔巴尼亚也就那么大，去的地方都是我已经去过的。先到南方山城培拉特，那里的人民倾城出动，欢迎我们代表团，并在“毛泽东纺织联合工厂”再次举行大会，由我们代表团副团长李先念同志讲了话。接着又访问了我去过的海滨城市发罗拉和费里区，在这两地的欢迎大会上，都由爱讲话的康生讲了话。回到地拉那后，又在阿党领导人陪同下，观看了他们国家剧院演出的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是他们在中国观摩学习几个月的成果。我看着那一群高鼻梁、深眼窝的“中国女兵”，表演着不中不西的舞蹈，虽然觉得有点滑稽，但是对于他们这种热心介绍中国艺术，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精神，还是表示了赞扬和祝贺。演出结束后，我们都上台合影致贺，兴奋的演员们纷纷同中国代

表拥抱，我们向他们赠送了花篮。随后几天，我们代表团又分别参观了工业展览会等地方，在阿前后逗留了近二十天。十一月十四日，在谢胡、巴卢库和卡博等人的欢送下，我们才离阿回国。

代表团的专机经过新疆，在乌鲁木齐作了短暂的停留。当时全国都正处于“文革”高潮之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已经成为各地“造反派”和“红卫兵”心目中的了不起人物。乌鲁木齐的“红卫兵”组织得知康生来到这里，立即派出代表请求康生接见他们。我奉命去接待了这批“革命小将”，听取了他们的要求，回来问康生怎么办，康生故作姿态地说可以见一下，但是不能超过半小时，仅仅是接见式的见一下面，可以向他提一点问题，他能答复的就答复，但不一定都予答复。他让我把这个意思转告“红卫兵”代表们，同他们商量和安排了一下，后来康生就表面庄重、内心得意地出来接见这批“革命小将”。新疆的第一书记王恩茂，这时还没有被打倒，也参加了接见。那时的“红卫兵”，还比较单纯和天真，没有学会打砸抢那一套，对于康生这种“大人物”也不知底细，认真而虔诚地听他信口作了一番“指示”。他主要是对这些年轻人不着边际地“鼓励”了一番。“红卫兵”出于对他的敬畏，又多少得到了一点“新精神”，也没敢再纠缠。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这次接见。十一月十六日下午，我们代表团全体安抵北京，周总理和陶铸等同志到机场迎接我们的归来。

### 一位外国“左派”

在我们回国的专机中，还搭乘了一位当时未予公布的

人物。他原来是欧洲某国党的中央委员，因为反对本国党中央的路线，支持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党的主张，在国内呆不住，就到了阿尔巴尼亚。当我们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时，他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来我国进行访问。我们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意他搭乘我们的专机，将他带到了北京，并由中联部予以接待。

当时我国对于各国党内分裂出来的、号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的组织，都是当作“左派”来支持的。那时看来，他也属于这类“左派”，当然照例予以热情接待。由于我同他已经相识，就由我陪同他到我国一些地方参观访问。我带他去了南方，先在长沙，又到韶山看了毛主席故居和一些革命纪念地。那时的韶山，真是热闹极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都涌来这里“朝圣”，他们那一股对毛主席的崇敬热爱之情，把我们的客人也给感动了。他在韶山曾同“红卫兵”们一起，吃了一顿据说能增强革命意志的“忆苦饭”，使这位外国“左派”也觉十分新鲜和兴奋。离开湖南以后，我们又去了广东。最后我将他送到了南方海港湛江市，我们在那里联系好了一艘远洋轮船，因为那艘船满载了我国运往阿尔巴尼亚的各种物资，即将直接开往那里，就由他们将他再带回阿尔巴尼亚。这样，我同他就在湛江分了手。此人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将他送走一回到北京，就立即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正是一九六六年底。从此我结束了在中联部八年的工作，随后就转入了极不正常的“牛棚”八年生活。

# 模范的兴国 英雄的人民

肖 华

兴国是我的故乡，她是与我血肉相连的母亲，我在她的怀抱里长大成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对故乡母亲永远怀着赤子之心，怀着深深的眷恋。岁月飞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经从少年时代走进了老年的黄昏夕照。但故乡在我心里仍旧燃烧着她的光焰，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之中，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曾经表现出忠勇卓越的斗争精神，和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的故乡人民，一刻也没能忘记。他们的鲜血，他们的殊勋，将与故乡的绿水同在，将与故乡的青山长存。

## 一、苦难深重的兴国

兴国位于赣南之北，处在群山环抱之中。大岭山、方山、覆笥山、大乌山、西洋山都系崇山峻岭，是兴国四周的天然绿色围屏。美丽的潯江清流从这围屏当央的狭长谷地之中穿过。除沿江零星散布着一些小小的平原之外，便是连绵不断的丘陵和小山地了。地形复杂，因而交通极为不便，大多依赖于潯江船筏航运，以及“打肩担”（即人

力肩挑，跋山涉水)。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兴国素有“油米之乡”之美称。这儿盛产茶油、粮食、木材、毛竹等等，其中尤以茶油为特产，远近驰名。

兴国的人民，勤劳勇敢，淳朴坚韧，具有传统的美德。至今，这些民族优良传统之精神瑰宝，还在被后人继承，并在新时期的斗争和生活当中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

兴国的土地是古老的土地。也曾是贫穷、落后、愚昧的土地。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然而，帝国主义势力直接侵入兴国，则是民国初年的事。美国神甫在兴国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借传教布道之名，进行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但帝国主义的统治常是利用中国的封建势力作为它的工具，以封建统治者作为它的爪牙。故当时兴国社会的特点还是以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占统治地位，封建宗法观念异常浓厚，社会团伙与氏族势力紧密联系，不可分割。许多恶霸豪绅，既是反动统治的爪牙，又是封建姓氏宗族的头子。他们包揽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大权。同时，由于豪绅、官僚、地主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又互相倾轧，互相勾心斗角，往往利用姓氏宗族之间的矛盾挑起械斗。每次械斗，都使劳动人民遭受莫大的损失，甚至成了封建政治势力相互倾轧的无辜牺牲品，造成许多人间悲剧。

大约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兴国出现了“洪家三点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上山落草，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吊羊牯”



(即绑票)，抓富豪为人质，索取钱财。他们收缴地主武装，发展会门势力，很快在东固山区发展成一支人数众多的民间武装组织。“三点会”的产生，无疑是人民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压榨而采取的一种自发的斗争形式，一种原始的帮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出现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之前，这一组织的产生，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唤起饥寒交迫的劳苦群众反抗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统治者。但是，又因为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没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所以同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往往容易被地主豪绅们收买利用。

革命前的兴国，经济非常落后，几乎完全是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全都集中在只占总人口百分之五的地主和富农手里。相反，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贫下中农，却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垄断，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地主豪绅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广大贫苦农民却号饥啼寒，辗转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肆无忌惮地从多方面巧取豪夺，剥削压榨人民。其名目之多，令人发指。地租、谷利、油利、盐利、钱利……五花八门，苛捐杂税更是不计其数。大小当铺遍布市镇乡村，其中最大的两家当铺“济泰”和“荣泰”，都是本县大官僚地主在县城开设的。其侵吞人民财产之巨大，难以数计。又如崇贤大地主恶霸邹瑞槐每年坐收年利二千多担稻谷，有山棚四、五十个。崇贤圩上的布店、当铺、酒店、饭馆，几乎都是他开的。他家十几口人，却拥有一

座豪华的庄园，周围筑有坚固的土围子，犹如一座小城。家里雇有长工几十，看门、管帐、婢女、厨娘亦不下几十。至于兴国有名的“四大金刚”肖以钱、陈石波、谢恩炳、钟发佳，他们对兴国人民剥削之惨重，压迫之凶残，更难以言语形容。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上层建筑，除县一级的统治机构外，还在地方上建立了以豪绅地主组成的“城区自治会”和“四十八乡联合自治会”。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他们的后台便是盘踞江西的北洋军阀。

革命前的兴国社会是最黑暗、最腐败的社会，由于地主阶级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在历史上，兴国人民就曾有过许多次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英勇斗争。清末宣统年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民群众，曾一举捣毁了大地主李建春在城里开设的大当铺，连房屋也焚烧殆尽。一九一九年，反动政府在赣南镇守使吴鸿昌的指使下，派出武装在衣锦、三僚一带，扬言要铲除烟苗，大肆进行勒索。激起群众的公愤，聚集鸟枪、土炮，与“官兵”对抗，打死了“官兵”一个连长。其后，“官兵”增援一旅，群众不为所惧，反抗的队伍迅速扩大，斗争的火焰迅速蔓延至七镇三乡，坚持斗争竟达一年之久，挫败了反动统治者的气焰。一九二〇年，兴国县政府派“征税委员”邹老六到东村、江背一带征收烟苗税。其时正当夏荒，邹老六勒令凡种植烟苗者，一律要交纳鹰元，否则便强行铲去烟苗。一时激怒了群众，将邹老六从大轿中拉出活活用石头砸死，反动政府也无可奈何。……

总之，革命前的兴国，已是浓云密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面临着一个巨大转折的关头，遍地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投进去一点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的大火！

## 二、大革命的洗礼

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从而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迅速从北京发展到全国各地。其声势之大，如暴风骤雨，摇撼了沉睡的中国。

一九一九年六月间，这汹涌的浪潮便波及到兴国，立刻激起了广泛的响应。兴国进步知识分子黄家煌等人组织进步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并在县城召开各界群众大会，众口一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口号。会后进行游行示威，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由各个团体联合组成“抵制日货委员会”，组织群众查禁、焚烧日货，一时革命的烈焰腾空而起……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东方黑暗的天空第一次出现了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引向了崭新的阶段。江西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的袁玉冰同志，组织“改造社”，主办《新江西》，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是兴国县人，故乡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无不受到他的重要影响。

而且这些人都成了兴国早期革命的杰出代表和坚强的领导者，如黄家煌、黄在璇、胡灿、陈奇涵、鄢日新、肖以佐、凌甫东、谢云龙、邱会培等。由于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兴国的先进青年和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和救国之路，前往南昌、赣州、吉安、广州等地求学或当兵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奋不顾身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这就为兴国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干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正当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一九二六年五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所谓限共、反共的“整理党务案”，为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大革命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国民革命军举师北伐之中，一大批兴国籍的共产党员，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委令，先后分三批随北伐军回到江西，开展群众运动。其中有胡灿、鄢日新、肖以佐、陈奇涵、陈奇洛、肖韶、钟赤心、钟友千等同志。国民革命军攻克赣州后，在赣州、吉安读书的兴国的共产党员谢云龙、凌甫东也回到兴国，同黄家煌、肖以儒等同志会合在一起。一时人才荟萃，龙虎风云会。他们有的创办学校，有的创办刊物，或奔走串联，或举办群众运动训练班，以各种方式进行革命活动，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把革命的火种撒遍了兴国的山山水水。

一九二六年秋，中国共产党兴国县委员会成立，由胡灿同志担任书记，陈奇涵、鄢日新、肖以佐、凌甫东、谢云龙等为委员组成。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兴国的建立，是兴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以后，兴国

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民族的和阶级的解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开始书写崭新的历史。

兴国党组织成立之后，即着手在各地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工作者们，在县城开办了贫民夜校和工人训练班。在广大农村，则主要是以创办夜校的形式开展活动。党组织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在县城的平川中学，在坝南、顾岭、长冈、东街、西街、桐洒、大龙、崇贤、城岗、白滩、高兴、丁龙、永丰和城市船筏业中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

一九二六年冬天，中共兴国县委创办了机关报“奋斗周刊”。由凌甫东同志任编辑，宣传马列主义，扩大党的影响。此外，兴国党组织还采取了多种灵活的形式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诸如举办工人业余训练班，举办平民夜校、妇女工读学校等等，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非常活跃，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开展。

在兴国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觉悟了的群众强烈要求革命的基础上，工会、农会等群众革命组织应运而生。工会组织下的船筏、码头、泥水，木作、竹作、纺织、缝纫、染布制药、五金、印刷等行业的工人最先起来斗争。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并且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农民协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全县的农协组织在几个月内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拥有会员数万人。并且提出了“打倒豪绅地主”，“打倒高利贷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

一九二六年春节前夕，党通过农民协会，领导了“五抗”斗争，主要是抗租抗债。以前每逢年关，贫苦农民因

交不出租子，就在年三十躲起来当“皇帝”，而这一年抗租斗争一展开，贫苦农民理直气壮地同地主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地主来收租逼债，农民眼珠一翻“冇得！”他们不但不交租，反而要求减租，大家抱成一个团，地主豪绅亦无可奈何。

一九二七年春荒之际，地主高利贷者囤积居奇，与奸商勾结，将粮食私运外销。农民协会又领导农民开展了“阻关”斗争，农会会员们把守山口要道，将地主私粮截下，一律予以没收。“阻关”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斗争的热情和积极性。

此后，党又领导农协会组织成立了“平糶委员会”，控制粮食价格，保障农民利益。这个措施也受到贫苦农民的一致拥护。

随着工会、农会的成立，学生会和妇女协会也相继成立。因此，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

一九二七年初春的一天，县城工人、学生，市郊农民等数百人一呼而起，捣毁了瑶岗垌的天主教堂，美国神甫吓得望风而逃……

一九二七年四月，兴国县委在东门关帝庙内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干社。由朱定清、李藻、李兰芬主办。社内分农工、宣传、组织、财政、学艺，体育等七部。县委在社里举办了一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吸收先进青年活动分子百余人参加训练，由县委领导同志亲自任教。训练月余之后，即分赴各地开展群众工作。

正当兴国的工农运动也同南方各省的工农运动一样走向蓬勃发展之际，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日益暴露。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被暗杀。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顿时黑云压城，反革命的腥风血雨扑打着神州大地，大革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

在这形势急剧转折的关头，兴国党组织领导兴国人民同反共反人民的势力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四月十七日，也就是在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的第五天，兴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鸡心岭召开了追悼杰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烈士的大会，抗议、声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到会的各界群众数千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严办凶手，为陈赞贤同志报仇！”等口号声，群情奋激。

当时，斗争形势异常复杂，在武汉出现了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营垒和蒋介石的营垒相对抗。因而，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一带的工农运动仍然继续高涨，但汪精卫、唐生智等也逐渐转向反共，各地反动派的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起来了。不久，汪精卫集团也于七月十五日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了革命。“蒋汪合流”，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最终失败。南昌、赣州、吉安等地随即被反革命势力所控制，并开始驻兵“清党”，镇压革命。赣南“清党”委员会派出一团军队到兴国“清党”，成立了“兴国清党分会”，封闭了兴国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反革命的乌云在兴国的上空翻滚，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城乡到处都张贴着“缉拿共党首恶分子”的通缉令。幸亏县委和各群众团体的领导同志如凌甫东、黄家煌、肖

以儒、余石生等早有准备，已先后疏散转移，才未遭毒手。“清党”军又烧毁了陈奇涵、张汉超等同志的房屋，折腾了一个多月。自此，兴国的革命也受到了挫折，暂时进入低潮。所幸的是，兴国党组织一直未公开活动，而是以群众团体的名义出面，又在“四·一二”前后就有所防范，作了必要的疏散转移的准备，加之党在群众中的深厚基础和血肉关系，因而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遂得以保存，党的地下组织基本上未遭到严重程度的破坏。这就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为兴国革命的再度兴起创造了条件。

即使在当时那种恶劣困难的条件下，兴国地下党也再次于一九二七年的夏荒季节，组织领导了第二次“阻关”斗争。时值青黄不接，奸商囤积居奇，粮价翻倍增涨。群众渴望官仓发粟，官仓却为富豪掌握，谷子只卖给大商人、大地主。还暗将官仓粮食偷运出境倒卖。这引起了群众的义愤，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全县到处“阻关”，特别是县城周围数十里地，群众成群结队，手举扁担棍棒，一旦查获外运的粮食，立即就地散发。这个斗争虽然一度遭到挫折，但人民的反抗却没有停止。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人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初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斗争经验。这些都在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表现出来。人民一旦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就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世界也就完全是两个世界了。



### 三、真正的铜墙铁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凶恶地举起了屠刀。反革命势力气焰万丈，“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石头也要过刀”，好象共产党从此便会被斩尽杀绝，散若烟云了。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历史的大逆转，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沉痛的教训中成长起来，从而担负起独立地领导人民武装革命的历史使命，举起了革命的大旗。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江西南昌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八一”起义。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建立了第一支人民的革命武装。南昌起义的号角，使兴国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他们看到革命还在惊涛骇浪中前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许多疏散隐蔽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又先后陆续汇聚起来积极地恢复革命活动。其中，有一些是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如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陈奇涵同志，北伐军营党代表肖以佐同志及叶挺部下鄢日新同志等。曾任北伐军团长的胡灿同志也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奉党之命，赴广东等地建立党的交通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进贤县被捕入狱，启发看守的哨兵一同逃离虎口，也辗转回到兴国，与留在兴国的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黄家煌、肖以儒等同志会合。随后，凌甫东等同志也历尽辛苦，潜回

故乡兴国，从此，兴国的革命斗争再次兴起。

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茫茫雾海中又一次拨正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霹雳一声震天响，同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随后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当时，虽然由于交通不便，党的交通网还没恢复，“八·七”会议精神没能及时传到兴国，但是，兴国的共产党人以自觉的进攻性的战斗姿态，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一九二七年十月间，陈奇涵、胡灿、肖以儒、肖以佐、李家宾、陈赤峰等同志进行秘密商谈，筹备召开秘密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羊山会议”。此次会议在距兴国县城十华里的羊山召开，以李家宾同志的社会地位作为掩护（李父是日本留学生，在氏族内有一定社会地位）。

羊山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办了几件大事：

1、重新健全了以肖以儒为书记，陈奇涵、肖芳全、吕纪楨同志为委员的中共兴国县委。从而使兴国的革命力量再度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号令。

2、这次会议上，与会同志分析讨论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的形势，从反革命的大屠杀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都从切身地经验中体会到：没有革命的武装，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只有坚决迅速地建立革命武装，同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才能求得革命的生存和发展，舍此便无其他出路。如不真刀真枪地干，反革命的屠刀就

会架到脖子上来，反革命的气焰就会依然嚣张。所以，羊山会议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做出了坚决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

3、羊山会议还分析了兴国具体的斗争形势，作出了迅速恢复党的各级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决议，作出了领导群众实行“五抗”——抗租、抗税、抗粮、抗债、抗息斗争的决定，借此机会再度发动广大群众，造成革命的浩大的声势和阵容。

羊山会议的召开，是兴国革命的一个重大的、关键的转折点，使兴国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羊山会议之后，兴国的群众运动便蓬勃地开展起来。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组织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因为有大革命风暴中的预演，兴国人民已经初步具备了斗争的经验，所以，东山再起也就在反掌之间。犹如干柴遇到火种，立即熊熊燃烧。

当时，兴国的形势是这样的：反革命势力以县城为老巢，包括市郊、和主要的大镇，如坝南、丁龙、城岗、崇贤、东村、莲塘、江背等地。这些地方都由土豪劣绅与反动政府相勾结，成立了反革命武装——靖卫团，以镇压人民的反抗。但靖卫团的势力只局限于城镇、市郊，而不可能在农村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边沿偏僻山区。党的工作重点也就理所当然地放在反革命势力统治薄弱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群众运动的烈火一旦点燃，势必会对盘踞在城镇的反革命据点形成铁桶似的包围。这就是兴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党在兴国城乡广大地区逐步地，然而又是迅速地建立

了秘密联络网，到处发展组织，壮大党团力量，培养选拔斗争坚决的群众骨干。一九二八年，成立了“少共兴国县委”，帮助党团结、组织了一大批先进青年。

这里要重点说说兴国党组织建立兴国第一支革命武装的曲折经过。

羊山会议之后，兴国党组织为了掌握自己的武装，真是千方百计，想尽了一切办法。

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派得力的共产党员打进反革命的靖卫团中，采取“白皮红心”的策略，暗中分化瓦解敌人。比如，胡灿同志担任了兴国靖卫团的教练，在一九二八年的第一次武装暴动中，致使兴国靖卫团一枪未发。而城岗、坝南、东村、莲塘的靖卫团则全部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再如永丰、高兴等地，在共产党员的巧妙活动下，连靖卫团也没能成立起来。榔武、江背的靖卫团是“茅屎坑里的石头”，我们就予以坚决打击。

还有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争取“三点会”。“三点会”百十个人，几十条枪，常年活动于东固山区。这一股土著武装有着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曾被反革命势力收买，在大革命时期捣毁过县总工会。其内部成员复杂，封建帮会色彩极为浓厚。党分析了“三点会”的情况，认为经过艰苦的工作，有争取过来的可能。即派了陈奇涵、黄家煌、鄢日新、肖以儒等同志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对“三点会”首领们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如黄家煌同志对三点会主要首领段起凤说：“你们不是号称劫富济贫的洪家三点会吗？三点无共不成洪，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你们一来为人民做不出什么好事，二来自己也长期存在不住呀！”

经过一个时期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孤立了“三点会”内少数顽固的首领，伺机击毙了反动分子管开炳、丘老七，“三点会”遂完全被争取过来，其中包括“大哥”段起凤（后来，段起凤同志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终于成为一名红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但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肃反扩大化中被误杀。实为令人痛心的一大损失）。党派干部对这支武装实行了改造，这即是兴国党组织所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一九二八年四月间，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才传到兴国，兴国县委在冰心洞召开了会议。从此，武装起义就正式列入兴国革命的议事日程。

此间，赣西各地在“八七”会议后举行起义的游击队遭受挫折后，有一部分先后进入兴国境内（有万安起义失败的肖子龙领导的万太游击队；梁仁杰领导的良村游击队，即第九纵队；李文林领导的阜回游击队，即第七纵队）。兴国党组织所掌握的武装加上这些游击队，于一九二八年春在吉安延福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同志担任政委兼团长。活动于东固山区。

此外，早在“羊山会议”之后，党就开始组织农民革命武装——秘密赤卫队。以鸟铳、梭标、土炮、“独角猫”为武器。最早建立秘密赤卫队的地方是大龙、崇贤、城岗、燕山、石门等地，到一九二八年四月的“冰心洞会议”前后，各地方秘密赤卫队组织就更为普遍了。同时，小型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断发生。

崇贤、大龙地区是兴国革命运动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一九二七年春，在谢云龙和李挺等同志的领导下，组织发

动了以早已打入靖卫团内部的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武装暴动。首先用一发子弹结果了靖卫团长曾文洵的狗命，不费吹灰之力收缴了靖卫团的三十多条枪。随后，暴动队伍又将大土豪邹瑞槐的土围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松明火把，刀枪梭标，群起呐喊着捣开大门闯进土围子时，邹瑞槐早闻风丧胆地逃命了。暴动队伍将他家的粮食、茶油、绸缎、布匹、金银、铜钱全部分发给农民，农民兴高采烈地分享了打土豪得来的胜利果实。

崇贤暴动，揭开了兴国总暴动的序幕。自此，农民运动的烈火更加熊熊燃烧起来了。有力地打击了城乡反动势力。

一九二八年九月，兴国党组织在高兴禾杠坑秘密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五十余人，代表着全县二百多名党员。这次大会更加明确了夺取反动武装，组织武装暴动，创立革命政权的斗争任务，并改组、加强了县委领导力量，加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此外还决定农民协会由秘密的活动逐步转向公开的活动，双管齐下，一手收缴地主武装，一手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此后，革命势力发展之迅速，广大农民起来之迅猛，使反动派闻风而丧胆。农民赤卫队公开亮出了犁头旗，扛着大刀、梭标走来走去，再也不惧怕什么；相反，倒是一直欺压着他们的土豪劣绅惶惶然不可终日了。他们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大事非常不妙，竟发出“越穷越好，早死早赢”的哀鸣。有的往县城里跑，有的向官府请兵。在县城的城隍庙里架起炉灶，赶造枪支，企图苟延残喘，阻挡革命的洪流。他们两次偷偷去赣州请兵来兴国“剿匪”、“密

拿匪首陈奇涵等人”。但这也是枉费心机。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兴国县城平川中学学生同经营洋货为主的“志慈”百货店老板黄兆乾（大地主、商业资本家）展开了斗争，捣毁了“志慈”。黄兆乾纠集反动商团包围了平川中学。学生们同仇敌忾，坚决抗争。仅仅事隔十天之后，兴国总暴动便开始了。

这次暴动是兴国党组织直接指挥的，经过了周密部署和准备，决定以红二团、段起凤部、十五纵队（系桥头地区武装，在兴国东村一带活动），共五百多人，三百多条枪为暴动先头部队，进攻兴国城。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暴动队伍从东村出发，趁夜色的掩护，将兴国城四面包围起来。通过党派进县城靖卫团当教练的胡灿同志作内应，调动守城的靖卫团，暴动队伍一枪未发地打进了兴国城。其时，敌人尚在睡梦中，鲜艳的犁头旗早已高高地飘扬在兴国城上了。

暴动队伍连夜行动，当即捉拿了一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收缴了商团武装二百余支枪。枪决了公安局长等反动分子。发官仓，开大牢，烧了县衙门和国民党县党部。

陈奇涵等同志是此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暴动的胜利，大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动摇了反动统治，鼓舞了兴国人民的斗争信心。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次暴动的弱点在于没有充分发动广大群众直接参加，因而带有单纯军事袭击的性质。没能彻底消灭反动武装，也未曾立即建立革命政权。由于考虑到反革命势力可能很快卷土重来，暴动队伍在第二天就撤离县城，返回东村。使兴国一时成为无政府状态。以至

不久之后，古龙岗的钟老槐就以“善后”姿态乘机窃取了政权，当上了“县太爷”。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兴国二次暴动时才将他杀掉。

兴国首次暴动胜利之后，党即更加放手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红二团与赣南第十五纵队（一九二八年六月间由桥头钟声楼、朱学玖同志在兴国来付、猫平一带创立）、第十六纵队（同年十月由钟声楼等同志在坝子上的寨垌组织成立的）会师于兴国的莲塘，在赣南特委军事部长陈奇涵同志主持下，进行了改编。由十五、十六纵队和原段起凤部和兴国一部分农民赤卫队合编成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段起凤，政委金万帮，政治部主任鄢日新。全团四、五百人（其中有一百名是红二团抽出的党团骨干分子）。

从此，红二团、红四团这两支兄弟武装就并肩战斗在兴国和赣西南的土地上，为兴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红二、四团的先后诞生，标志着兴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除了红二、四团主力之外，各地的游击队也蓬勃发展。农村中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的青年建立了少先队组织。而二十四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壮年则单独组织为赤卫队，纪律更加严明，斗志更加旺盛。

一九二九年二月，当兴国党组织得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下了井冈山，准备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消息后，随即以二次暴动响应。此次，以红二、四团主力第二次围攻兴国城，杀了自称“县长”的钟老槐，占领了兴国城。

兴国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迎接朱、毛红军下山，挺



进赣南闽西准备了很好的条件。当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兴国边境的东固山区时，红二、四团亦开赴东固与主力红军会师，并在罗坊洲举行了会师大会。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毛委员表扬了红二、四团的勇敢战斗精神，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说：“反动派天天叫喊要消灭‘朱毛’，‘朱毛’消灭了没有？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有越来越多的‘朱毛’了；现在你们（二、四团）不又都是‘朱毛’了吗？”

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成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兴国县革命委员会。赣南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一九二九年六月，白军第十二师张守仁部从赣州进犯兴国，来势凶猛，妄想一举摧毁兴国的红色政权，扑灭人民革命的熊熊烈火。当时，红二、四团正在南丰、赣西一带执行任务，未能及时返回。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县革命委员会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暂时转移至城岗一带活动。敌张守仁部进占兴国之后，恣意杀戮，无所不为，许多革命者的家庭遭受到了摧残，陈奇涵、胡灿等领导同志的家中房屋被焚烧一净。在此严重的情况下，赣南特委成立了以陈奇涵同志为书记的“兴、桥、宁、永行动委员会”直接领导兴国、桥头、宁都、永丰等地的武装斗争。陈奇涵同志以其组织指挥才能，迅速将兴桥宁永地区的部分地方武装组成第二十五纵队，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二十五纵队的活动，以兴国为中心，先是与敌张守仁师，继而与敌周至群师周旋作战，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巧妙机智地打击敌人。当敌军与各地靖卫团相勾结，

企图合围之时，我二十五纵队就以各地游击队为配合，寻找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地痛打其一部。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围着高山峻岭团团转，疲于奔命。当敌人进攻丁龙时，我二十五纵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东村，从敌人屁股后面打起来。敌人进攻城岗，二十五纵队突然转移到崇贤、枫边一带，满山亮出红旗，滚木垒石齐下，弄得敌人草木皆兵，士气低落，终于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撤离兴国逃往赣州去了。

从一九二九年六月间敌人进攻，到年底溃退，红二十五纵队打了不少胜仗。曾先后三占兴国城，一下宁都城，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还顺手牵羊，拔了枫边，方太等不少地区的“白点”，扩大了游击战争的区域——从兴（国）万（安）泰（和）的边境发展到赣县的田村、白鸳、杰村；从城岗扩大到永丰的良村、龙岗、石马等地。锻炼了年轻的人民武装，初步积累了党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广大赤卫队、少先队的同志、广大青年团的同志，在此次斗争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譬如兴国县城东街团支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发动青年进行秘密活动，到处散发“共产党宣言”、张贴革命标语，吓得敌军和城里的土豪劣绅惊魂不定地嚷嚷：“啊呀，不得了，满城都是共匪！”下令通宵戒严。但青年团员们机智地冲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将关于敌军的情报塞入竹筒内，以赶牲畜为名，送给我军。有力地配合了战斗，经受了考验。

总之，一九二九年这六个月的艰苦的游击战争是一次成功的预演。兴国人民在以后的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表现得更为雄壮出色。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十万重兵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苏区军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奋起抗击白匪。主要战场就选择在龙岗一带。我军民同仇敌忾，一鼓聚歼敌一个半师，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赞。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又调集二十万兵力进行第二次“围剿”。经过半个月五次激战，“七百里驱十五日”，歼敌三万余，很快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这两次反“围剿”的战斗虽然主要战场不在兴国，但兴国人民对支援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一九三〇年八月，在赣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兴国成立了“兴、于、赣总指挥部”，领导兴国、于都、赣县的地方武装攻打赣州城。其中，兴国的地方武装一千二百多人为新编第一师。同年十月，“兴、于、赣总指挥部”改编为“东河指挥部”，兴国的新编第一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九三一年六月又编入红三军第八师。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十九路军六十师蔡廷锴部和六十一师蒋光鼐部分别由赣州、太和窜扰兴国。被兴国新编的第一师在江口、茅店一带阻击，牵制，使敌六十师迟了二十多天才到达兴国。而兴国的红色警卫营（约一千余人，二次反“围剿”时改编为兴国独立团）亦在高兴、崇贤、城岗、丁龙、莲塘、江背一带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骚扰、牵制了企图开往主要战场的敌军，使之陷于被动，只能坐视友邻被歼，而全然无能为力。

兴国人民为了反“围剿”的胜利，实行坚壁清野，将粮食、物资、锅灶等都坚壁起来，破坏了主要道路和桥梁，

使白匪军所到之处，一无所获，冒险抢劫，又遭游击队袭击。有一次一个连的敌军到大塘来抢粮，被大塘三十多个赤卫队员包围，乖乖缴了枪。还有一次，敌军一个团到合富坪抢粮，游击队隐蔽在山上，一声土炮，炸倒了好几个敌兵。敌团长呆呆望着打过来的铁条，吓坏了。有个地主为了壮胆子说：“这是土炮打的，不怕。”但随即便挨了那团长一记耳光：“妈的，人都死了几个，还怕?!撤!”

第二次反“围剿”中，县委提出了“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攻，争取回家莳田”的口号。兴国群众想了许多办法和敌人“斗法”。如把爆竹放入洋油桶里，“噼噼啪啪”地四处乱放。一到夜里，郊区的山岗原野上便立起许多稻草人，并将点燃的香头扎上爆竹，东一声“枪响”，西一声“枪响”，吓得敌人昼夜不宁。一些地主豪绅仗着进攻苏区的白匪军的凶焰，妄想卷土重来，收罗靖卫团的残余势力，与敌军相配合，但一一都没能逃脱游击队的打击。如活动最猖狂的均村、五七坊、杰村等地的靖卫团，都被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蹶不振。

为了从人力物力上支援红军，战争期间，兴国各地都组织了“向导队”、“侦察队”、“担架队”、“运输队”等，干部和群众在困难的条件下还积极为红军筹备粮食，而自己却采食野菜充饥。

更值得细说的是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因为这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就在兴国。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遣三十万匪军向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兴国一下子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敌军方面：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两个师由泰和进

驻新田、高兴、崇贤一带，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和五十四师郝梦令部驻在富田、良村等地。蒋鼎文的九师、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和独立旅驻在兴国县城和江背方向。主要地区皆为敌军占领。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选定兴国根据地为主要战场，率主力红军由闽西一带千里回师兴国。当时，我主力红军一、三军团，共约五万人，红军总司令部设在莲塘，彭德怀同志担任前敌指挥，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首先在十万洲高山布下了阵势。毛泽东同志亲自巡视十万洲，鼓舞士气。朱德同志亦亲临督战，在阵地上对战士们说：“敌人出了告示，谁先拿下莲塘，就奖给二十万元。你们怕不怕呀？”“不怕！”战士们回答十分响亮。朱德同志笑道：“对啰，别看他们叫得凶，明天早上四点钟就缴他们的枪啰！”

七月六日，在离莲塘仅五华里的罗子坳展开了激战。敌上官云相师进入我军设下的圈套，激战一天，敌上官云相所部四十七师即被我全歼，这就是“十万洲大捷”。

七月七日，红军追至良村，又同郝梦令的五十四师展开激战，歼其两团。尔后挥戈宁都一带，又轻取毛炳文师两个团。短短几日，红军三战三捷，缴枪三万、歼敌三万，在黄陂开了一个祝捷大会。休整数日，以逸待劳，随后即投入此次反“围剿”的第二阶段决战。我军主力在高兴圩竹篙山至老营盘四十里长的战线上布下了天罗地网，三军团在高兴圩，一军团在竹篙山至黄土坳地区。首战于高兴圩，歼蒋鼎文部四千余人，再战方石岭，歼韩德勤部五千。此“竹篙山大捷”，毙敌近万，缴获甚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遂告失败。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兴国人民对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红色武装都直接投入了战争。广大群众都充分地动员组织起来，编成了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侦察队、向导队。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除留一人在家组织群众支前外，全都上了火线。广大兴国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烧菜送饭、抬担架、搞运输、救伤员、打扫战场、抓俘虏。多有仅靠几支梭标甚至锄头便俘敌数十的事迹，举不胜举。

其后的第四次反“围剿”，主要战场虽然不在兴国，但兴国的优秀子弟在“扩红”的热潮中成千成万地走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勇敢地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兴国人民节衣缩食储集物资，源源送往前线，支援了红军。所以，胜利与他们的参加作战和支前不可分，捷报之中浸透了他们的热血和汗水。红色兴国和广大根据地的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 四、第一等的工作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兴国模范县”的高度评价。

兴国成为苏区模范县，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兴国的革命实践，同毛泽东同志对兴国的工作指导分不开的。

早在一九二九年春天，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到兴国时，就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亲自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红色政权，亲手起草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

明确提出：1、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黑暗统治，成立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2、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3、建立革命武装——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4、烧毁田契借约。5、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毛泽东同志还亲自草拟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写在《井冈山土地法》里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个土地法是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同志为了推行这一土地法，在兴国文昌宫里举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为兴国的土地革命斗争培养了干部。

一九三〇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二次来到兴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县城背街陈家祠举行了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二百余名代表都是自下而上，通过民主方法选举产生的。在五天的会议日程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1、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正式划分行政区域。2、收缴地方反动武装，特别是对五七坊联防区白点，必须拔除之，以扩大红色区域，壮大革命力量。3、贯彻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4、实行打土豪，分田地。5、继续加强建设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

此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推选肖能岳为主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代替了革命委员会的职权。全县划分为十一个区，六十四个乡镇，都迅速建立了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使红色根据地的政权组织日臻完

善。

同年，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一文，指出旧中国农村中的基本矛盾是广大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中国的红色政权是在土地斗争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他尖锐地批判了党内某些人“取消土地革命”的错误论点。

一九三三年，三次反“围剿”之后，毛泽东同志又一次来到兴国，在长冈乡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一文。

兴国不愧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县。

兴国首先是模范地贯彻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农村阶级路线，使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基本上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向前迅猛发展。兴国的革命根据地是赣南地区最早开辟的一块根据地。兴国的党组织始终都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决议和指示，因而把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以广大贫雇农为核心力量。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兴国党组织领导人民顺利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果断地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削弱了富农经济，消灭了封建势力。使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贫雇农得到田地和山林，因而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中农多半也土地不足，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土地，因而也拥护革命。在以雇农为主体的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中，中农参政的人约占百分之四十，巩固了红色革命政权。

兴国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彰，还因为兴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是强有力的。兴国为伟大的土地革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兴国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紧密联系实际，



联系群众的典范，他们时时处处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在战争频繁的艰苦岁月里，兴国的干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没有薪水，至多分点“伙食尾子”。但对革命的忠诚，则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做人民群众的公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劳任怨，谦虚谨慎。他们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是刻苦学习的模范，自觉地经常地用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武装自己。在各项事务中，他们都以带头人的姿态走在群众的前头。扩大红军，他们首先报名参军参战，支援战争，他们宁可吃菜咽糠，也要把家里仅有的一把米献出来。为了粉碎蒋匪军的经济封锁，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搞粮食、盐巴，勒紧裤带扶犁耕耘，带领群众掀起生产热潮，度过难关……

正如一支兴国山歌中唱到的那样：

“苏区的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来办公，  
脚穿麻鞋走山崖，夜打灯笼访贫农。  
哎呀咪，  
和我侬人民心连心……”

兴国之所以成为模范县，还在于拥军优属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拥军委员会，负责招待、慰劳、迎送红军和调查红军公田等工作。

兴国是红军家属较多的一个县。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底统计，已有近两万户“红属”。兴国的“优属”工作也非常出色。从县到村都有优属委员会。各乡、村每月至少召开一

次红属联席会议，由优属委员会报告前方胜利的消息，同时征求红属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各乡都组织了耕田队，什务队，为红属耕田或检查优属工作执行情况，仅什务队，就分工有：看水班、看牛班、砍柴班、挑水班、慰问班等。因此，红属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不至于发生困难。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包下了红属的田活，一亩也没有撂荒，且做到了三犁、三耙。帮工不要工钱，连饭都是自己带去。红军家属发给了优待证和光荣牌，到合作社买东西优待百分之五——七的价钱。各地还建立了优待红属谷仓，这些谷子都是由群众节省来的，自己提出“每人节约三升谷，优待红军家属”的口号。

由于优属工作做得好，消除了前方红军同志们的后顾之忧，更加勇敢地投入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

兴国的各项工作都是走在前面的。

当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发动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围剿”时，当敌人配合军事“围剿”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时，党中央指出：为取得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抓紧生产，以保障战争物资的供应，改善人民生活。兴国党组织领导兴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们组织了劳动互助社，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将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以解决壮劳力多半上了前线，劳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这种劳动互助组织普遍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他们组织了耕田队，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力优属耕田。妇女也下地耕田了。

他们组织了犁牛合作社，大家集资购买耕牛，集体役使，解决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

苏维埃政府鼓励农民垦荒种植，免征农业税若干年，鼓励了群众开荒的积极性。不久便消灭了荒田，受到了中央检查组的表扬。

他们成立了消费合作社，其中，榔木乡的合作社早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就有了。县里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成立了消费合作总社。合作社发展很快，由群众集资经营，绝大部分群众都出股参加，每股一元左右。据一九三二年八月统计，全县有消费合作社一百三十三个，资金二十九万元。合作社主要经营油、盐、布匹。消费合作社的产生，无疑是党领导群众有组织地团结起来，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一个斗争方式。

实践证明，这些办法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

兴国模范县之事迹，也表现在苏区的文化教育上。从一九三一年之后，兴国各地都开办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列宁小学”更是遍及每个乡村，入学年龄为七至十三岁（也有十四至十五岁的）。每校学生三十至五十人，书籍由公家发给。

社会教育更加普遍，十六岁以上青壮年都入夜校学习，其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六十九。夜校之外，小型“识字班”更是不计其数，据一九三四年统计，全县仅参加识字班的人数就有近三万人之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活动分子积极起来，妇女不仅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做小学校、夜校的校长，做教育委员会和识字委员

会的委员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兴国县成立了一个专业剧团——工人剧社。他们串村走乡，演出活跃，多在前线巡回演出，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格外受到群众欢迎。

“模范的兴国”是扩大红军的模范。

这里要重点说一说一九三三年红五月“扩红”热潮中，兴国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九三三年中央发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之后，立刻得到了兴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全民动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军突击任务。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到八月，短短的三个月中，兴国党组织就领导人民组织了“兴国模范师”，并且参加了“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创造了扩大红军的奇迹。

兴国县于一九三二年即以赤卫队和少先队中的积极分子成立了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模范师”，一面军训，一面生产，每人都发了枪，定期集中操练，是为“寓兵于农”，为“红五月”的扩红运动打下了基础。五月九日举行全师模范少先队的武装检阅，召集全师干部会议，报告了“模范师”举行武装检阅的意义与扩大红军的任务，每个干部听了目前政治形势与扩大红军任务的报告后，即热烈提议全师加入红军。翌日，召集了全师党团员大会，县的领导同志作了动员“模范师”加入红军的报告。全体党团员一致拥护。五月十一日，召开会师大会，全体战士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致赞成加入主力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战。“兴国模范师”遂在五月底开赴前线。六月、七月，兴国党组织又继续在工人和少先队中动员参加“工人师”和“少共国

际师”。扩红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扩红山歌在乡乡村村都唱“红”了，到处都能听见“十送郎”的歌声：

“哎呀哩！

一送郎，就起身，送我亲郎当红军，  
保证一路打胜仗，消灭白匪得翻身。  
心肝哥！苏区人民享太平。

……

哎呀哩！

十送郎，好号召，中国革命最高潮，  
工农团结有觉悟，全国军阀要打倒。  
心肝哥！拥护朱毛好领导。”

到处是一片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情景。兴国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表现出了高度的觉悟和牺牲精神。经过多次扩军，全县青壮年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扛起枪走上前线。其中许多模范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兴国县，参军人数竟达八万之多。这是何等的壮举！何等的英勇牺牲！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高度地赞扬了长冈乡、兴国县的工作，向大家发出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上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 五、红旗永远不倒

蒋介石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失败

后，于一九三三年春季又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以百万重兵，采取堡垒战，步步为营，并以五十万兵力直接向苏区中心大举进攻。

本来，在此之前，苏区开展了扩红运动，红军无论在人数还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较前四次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善。根据地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同时红军的作战经验也十分丰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抗日反蒋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并且，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福建事变”。形势并非对我们不利，如抓住有利条件，采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是极有可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

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武断地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制定了一条完全违背实际的极其错误的军事路线。他们反对游击战争，反对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而以堡垒对堡垒，提出“不使敌人占领红色地区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采用阵地战法，同数十倍于我的敌人拼消耗，致使仗越打越被动，根据地的地盘越打越小，红军主力消耗巨大，伤亡十分严重。战争达一年之久，而终未能粉碎敌人的围攻。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间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党中央和毛主席虽然暂时离开了根据地人民，但仍留下了项英、陈毅、曾山等同志，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小密地方成立了中央办事处。并有二十四师作护卫，继续领导着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兴国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入了极其

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白色恐怖使兴国变成了一座黑暗的人间地狱。白匪军日夜“清剿”，大肆烧杀，真是逢山便烧，逢屋便毁，奸淫虏掠，无所不为。“铲共团”、“暗杀团”、“别动队”、“还乡团”张牙舞爪、群魔乱舞，想杀就杀，想砍就砍。反动派实行了保甲制度，毒刑拷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普通群众也动不动被扣上“赤匪”的帽子加以杀戮。许多村庄变为瓦砾，如崇贤黄金寨原为四百户人家，其房屋被白匪所毁者达三百余家之多。许多党的基层领导同志被剜眼、割耳、剖腹掏心，其惨状令人发指。

但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兴国人民是不畏强暴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越残酷，人民的反抗就越激烈、斗争就越坚决。许多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苟生，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崇高的气节。

红军撤离苏区后，兴国县委领导兴国独立营和万太游击队及各区乡机关干部群众组成的游击队集合起来，与敌军进行游击战。转战于村头、合富、园岭子、水头、榔槎、方太、崇贤、仙人桥、齐分一带。一九三五年二月，兴国独立营在大龙口茶岭与敌周浑元部大战三昼夜，寡不敌众，转移至方山一带，但因可耻的叛徒反水，勾引敌人放火烧山，以徐达志同志为首的革命志士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特委、县委也在铜鼓鼎地方为残暴的白匪所破坏。各地的游击队也相继被冲散。但时隔不久，各地游击队又频繁活动起来。尽管他们武器装备很差，大都是木棍、梭标、大刀、土枪、鸟铳之类，可是他们经常出其不意地吃掉小股独立活动的白匪，常常使进山“清剿”的白匪有来无回。

为了坚持游击战争，兴国的优秀儿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的同志战斗到弹尽粮绝之时，跳崖自尽，在白衫上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有的被地主守望团包围活捉，严刑拷打，不吐一字，被乱刀戳死。甚至连十来岁的小伢子，面临凶恶的白匪，也不说出游击队的去向，被活活打死。

一九三七年旧历正月初七，良村地区的凌世煌同志秘密串联，组织起一批老同志，号称“中国红军独立团”，乘虚袭击了伪第七、八联保，缴获了六十多条枪和两担子弹。后因宁都县城的白匪闻讯赶来镇压，此次暴动终于失败。但这却有力地证明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以周爱民同志为代表的许多兴国共产党员虽然被敌人关入监狱，但在狱中也坚持了革命活动。成立狱中支部，通过外线秘密与池江赣南特委接头。一九三七年，兴国县又成立了临时县委，周爱民同志任书记。从此，兴国的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正是全国人民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运动高涨之际。在这种形势下，陈毅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来到兴国，交涉释放被捕的同志，同时对兴国的党组织传达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各项政策，要求全体党员贯彻执行。虽然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没有实践诺言，但陈毅同志的指示却给了兴国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力量与鼓舞，增强了坚持斗争直至胜利的信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七月十五日，党中央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也不



得不赞成国共合作。于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政府被迫暂时停止了“剿共”政策，放松了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和迫害。于是，兴国的革命运动有了一个新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九月，贺绛、缪敏二同志来到兴国，指导地下党进行工作。在瑶岗脑梅家祠召开了一个临时县委成员扩大会议，有周爱民等二十余人到会，传达了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情况与方针政策。

同年十二月，项英、曾山同志来到兴国，检查地下党的工作和国民党政府执行国共合作的情况。抗议兴国县反动政府迫害宣传抗日的革命者的行径，并对兴国地下党的工作做了明确的指示：继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全力转向抗日活动的同时，要同国民党违背国共合作的非法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一九三八年二月，党中央派钟梅生同志从延安回兴国，担任县委书记。到年底，全县已有十三个区委，四十多个支部。党员人数从一九三七年底的三百人发展到八百多人。

兴国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二五减租的斗争；在城市，则领导工人同奸商、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随着民众抗日运动的不断高涨，蒋介石也越来越暴露出“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屠杀革命党人，镇压革命活动，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在兴国设立集中营，豢养二百个喽啰组

成“自卫大队”。一九四一年二月，集中营移往高兴竹篙山，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此后，党更重视整顿组织，纯洁内部，提高战斗力。

一九四四年二月，廖雅海等同志发起组织了“自治会”，对付反动派的抓兵勒索。这个组织不久发展到三百多人，提出“大家起来自治，杀掉反动的区、乡、保长，上山打游击，迎接毛主席”的口号。在一个当圩之日，古龙岗群众团结起来，把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区长鄢某拉出来杀以示众。同年十二月的一个寒夜里，垓下地区的群众在古竹湖桥上杀了作威作福的伪乡长俞鹏章。一九四五年春，当日本侵略军逼近赣南时，伪保安团逃向大乐场一带，大肆抢劫村民，引起公愤，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全村一百多人与敌军展开搏斗，使四个匪军葬身于锄头、梭标之下。星星之火始终在兴国的山山川川闪射。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把中国拖入内战灾难的漩涡。

这一时期的兴国，也同其他蒋管区一样，十分黑暗、混乱。国民党为了加深对人民的统治，大力发展党、团组织，特务走狗密布四方，加紧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然而革命党人在逆境中仍坚持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兴（国）于（都）赣（县）边区地下党的负责人龙腾飞同志活动于江背、长山等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一九四八年成立了周迳支部，一九四九年二月又成立了草湖支部。地下党员抓住各种场合发动群众，揭

露蒋介石匪帮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迎接解放大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兴国反动头子胡信等人发起组织“蟠龙师”，企图与南下解放大军相对抗。阴谋将三百多名学生骗进反动军队。党派了范拯球同志及时揭发了敌人的骗局。

莲塘地下党的同志发动群众，于一九四七年杀死了伪乡公所所长和为虎作伥的保甲长。反动政府派百余武装前去镇压，但群众聚集土炮、梭标、鸟铳，登上山头，同敌人打游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江南下作战，势如破竹，捷报传来，使兴国人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奔走相告，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的早日到来。

七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吉安，龙腾飞、范拯球等同志先后到吉安接头。城岗地区的共产党员筹集粮食四万余斤，迎接我军。许多地区的共产党员运用各种方式瓦解敌军，争取反动自卫队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兴国的反动势力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顷刻土崩瓦解。

在火海血泊中熬煎了十五个春秋的兴国人民，盼星星，盼月亮，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自己的子弟兵再打回故乡来。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是兴国人民最难忘的日子，云开日出，从前的红军队伍又回到了兴国。相别重逢整整十五年；十五年之中，兴国人民经受了惨绝人寰的屠杀、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和苦难。但是他们坚信红军还会打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心中的红旗永远不倒！

当解放军进入兴国县境时，全县人民欣喜若狂。锣鼓

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捧出甜米酒，劝饮擂茶汤，人人热泪满面，百感交集，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他们的心情。从英姿飒爽的解放军队伍里，许多人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儿子、丈夫和父亲；但更多的亲人已经再也不能回来了。他们已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英名将永远留在祖国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

兴国，我可爱的故乡，英雄的故乡！她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经历过失败与胜利。我之回顾她的过去，是为着祝愿她的未来。为了振兴中华，继续前进吧！兴国，我亲爱的故乡！

#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组织

## 沿革概况（初稿）

（一九二一年——一九四五年）

王 景 金宇钟

东北是我党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具有较长的革命斗争历史。长期以来，在中共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下，东北地区的党组织之间，形成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因此，在讲述我省党组织的历史时，不可能不联系到整个东北党组织的历史。

东北地方党组织，按其建立与发展情况来看，可分为党的初建、满洲省委、四个省委和东北党委会等四个时期。

### 一、东北党组织初建时期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九月）

东北是个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地区。它位于我国东北边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

一向为帝国主义所垂涎。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俄帝国主义的宰割和蹂躏，广大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东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勤劳勇敢，富有斗争精神，曾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压迫。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东北人民的觉醒。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中央非常重视东北的建党工作。党成立不久，即派人到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九二一年，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马骏即在哈尔滨、吉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组织“救国唤醒团”，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教育。

一九二三年初，党中央就派陈为人、李震瀛在哈尔滨、大连和奉天（沈阳）等城市开展工作，发展与建立党、团组织。一九二四年党中央负责同志王荷波、邓中夏曾来大连、哈尔滨等地指导工人运动。在党的教育下，一些进步青年工人和学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党和团的组织遂在哈尔滨、大连、奉天和长春等重要城市建立起来。

#### （一）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亦称哈尔滨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陈为人、李震瀛来到哈尔滨建党。他们以哈尔滨《晨光》报记者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七、八月间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SY），汪洁曼任团支部秘书。陈为人为党组织负责人。十月初，

全市党、团员已有九人。十二月，团支部改选，彭守扑任秘书，并将党、团员混合编为两个小组，由汪洁曼、李铁钧分任组长。十二月末，由于《晨光》报内部分裂，反动分子向奉天、吉林当局告密，陈为人、李震瀛在哈尔滨的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形势逐渐恶化，陈、李二人遂转移到奉天、大连等地活动。一九二四年六月，根据党中央关于超令团员转为党员的指示，经CP（党）、SY（团）双方会议决定，彭守扑退团转党，团支部书记由李铁钧兼任。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创办了“平民学校”和“工余学会”，学员达八十余人。不久，又因反动当局的迫害，党、团组织领导人相继转移到外地活动，党、团组织逐渐涣散。

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北方区委员会派吴丽石到哈尔滨整顿党、团组织。吴丽石到哈尔滨后，首先将五名党团员组成小组，党的干事会决定马新吾任组长。然后他以学徒身份打入三十六棚铁路总厂，在进步青年工人中组织了“青年协进会”，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不久，发展张友仁、姜文洲等四人入党。“五卅”惨案发生后，开始在学校中进行建党工作，许公中学的赵尚志，医专的潘连山，工大的吴宝太、高诚儒等被发展为党员。

一九二六年初，哈尔滨党、团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已增至三、四十人。一、二月间，根据党中央指示，召开了党的干部会议，成立了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吴丽石任书记，高洪光任组织，海涛任宣传。在地委领导下设立学生运动委员会，潘连山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姜文洲负责；妇女运动委员会，赵尚志负责。同时，成立了共青团北满地方委员会，吴晓天任书记。十一

月，党中央派胡步三来北满地委负责军事工作，开办了军事训练班。

北满地委成立后，即以哈尔滨为中心，向长春、吉林和中东铁路沿线开展建党活动。从一九二六年春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北满地委领导下的党组织有：哈尔滨市内三十六棚铁路总厂、大学、皮鞋、警察、道外、偏脸子等支部；长春、吉林、双城、安达、牡丹江、横道河子等支部；中东铁路沿线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昂昂溪、一面坡、磨刀石、穆棱、绥芬河等地均有党的活动。

## （二）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

大连是工人运动较为活跃的地方。一九二三年末大连成立了中华工学会。一九二四年一月，陈为人，李震瀛从哈尔滨转到大连后，立即在进步青年中开展马列主义宣传活动，帮助大连中华工学会整顿组织，并使之与全国总工会建立了联系。不久，泰东日报的关向应、赵悟尘，工学会会长傅景阳，青年会的杨志云相继入团，六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

一九二五年末大连团员发展到三十余人，根据中央指示，一部分超令团员转党后，建立了中共大连支部，支书杨志云，党员共九人，属北方区委领导。

一九二六年大连团员发展到四十二人，党员发展到二十二人。根据党的北方区委决定，于同年六月成立了共青团大连地方委员会，杨志云任书记。同年九、十月间，成立了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邓洁任书记。

大连地委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党团组织，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党员有二百余人。成立沙河口铁道工厂、



关东日报、满洲新闻、青年会、政记轮船公司等二十多个支部。此时，团员也发展到一百八十余人。

### (三) 中共奉天支部

一九二四年在党的影响下，栗丰在南满医大组织“木铎社”，开展学生运动；“满洲银行”进步职员高子升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小组，进行宣传活动。一九二五年初，吴丽石去哈尔滨路过奉天时，将奉天的五名团员组成小组。同年八月建立党、团支部。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奉天支部领导下，小河沿医专、省立一师、第一工科、第二工科、女师、兵工厂、银行、沈北张家堡小学等单位建立了党的小组，党员四十余人。

(四) 一九二五年党还在京奉铁路沟帮子车站建立了党支部（支书欧阳强）。一九二七年七月还分别在台安县和柳河县建立了党支部（台安县支书王纯一）。

以上就是党在东北早期建党的情况。

党、团组织的建立，是和东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密切结合的。这期间党组织领导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情况是：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沈阳、哈尔滨、大连、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市和附近县城，都组织了“沪案后援会”，进行讲演、募捐和游行示威，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掀起了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

一九二六年四月，大连“福岛纺织会社”千余名中国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大罢工。在罢工中，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揭露日本资产阶

级虐待中国工人的种种罪行，抗议逮捕工人领袖。这一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坚持三个多月，最后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还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临江设领”的斗争，以及“奉天制麻会社”和本溪煤铁公司的罢工斗争。

通过上述斗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教育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显示了群众团结的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发展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配合了全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斗争。

党在东北的建党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就遭到统治阶级的严重破坏。如一九二七年四月北满地委被破坏，党员被捕二十人。同年七月大连党、团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地委书记邓洁等二十余人被捕。奉天党支部也遭到破坏。敌人的残暴行为，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他们顽强地继续战斗着。

这期间东北党组织虽然有了一定基础，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机关，各地的党组织，是由党中央或中共北方区委直接领导的。

## 二、中共满洲省委时期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九三五年）

一九二七年七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党中央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这历史转变关头，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工作，党中央派陈为人

赴东北，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建满洲省委，统一东北地区党的领导。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为人、吴丽石等三人为委员，陈为人任书记兼宣传，吴丽石任组织兼农运，张任光任团省委书记，韩惠芝做妇女工作，王立功做工运工作。不久，调北满地委书记胡步三到省临委做军事工作。会议决定省委机关设在奉天。

一九二八年一月末至二月初中共满洲省临委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并改选了省临委。新的省委委员三人：陈为人、吴丽石、刘相益（四月，刘相益被撤消省临委委员，补选金红为委员）。王立功因病休养，调唐宏经到省临委做工运工作。

一九二八年九月，满洲省临委召开了东北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一人，代表二十五个地方组织的二百三十名党员。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六大”精神的传达，通过了“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会议决定将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员会。选出省委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陈为人任书记，吴丽石任组织，张子安任工委书记。

在整个满洲省委期间，正是处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敌人对党组织的疯狂破坏，八年间，满洲省委的领导机关经常改组，变动频繁。在这期间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的有：

（一）陈为人（一九二七年十月——一九二八年十二

月)。

(二) 王立功(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月。王立功因病未到职，由刘少猷代理书记)。根据一九二九年四月的统计，全省党员二百五十人。

(三) 刘少奇，化名之启，赵子琪。(一九二九年六月——一九三〇年三月)。

(四) 李子芬(一九三〇年四月)。

(五) 林仲丹，即张浩(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月)。

(六) 孙杰，即陈潭秋(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九三一年一月)其中八月——十一月，因贯彻“立三路线”，曾将省委改为满洲省总行动委员会。这时，全省党员共有一千一百九十人。

(七) 张应龙(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月)，后被捕叛变。

(八) 罗登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九三二年六月)，一九三一年末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到哈尔滨。这时，全省党员共有二千一百三十二人。

(九) 魏抱一，即李实(一九三二年七月——一九三三年九月)一九三三年一月统计，全省共有党员二千一百人。

(十) 李耀奎(一九三三年十月)。

(十一) 老马，即林电岩(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四年九月)一九三三年末统计，全省共有党员二千五百人。

(十二) 杨光华(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五年四月)。

在满洲省委领导下，我省的党组织在北满地委的基础

上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省委成立后，于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将北满地委改为哈尔滨县委，书记先后由杨乐、李化常、任国祯担任。县委所属有二十三个支部(包括哈尔滨市内、中东路沿线、哈长线、呼海线)，全县党员共有九十五人。一九二八年八月将县委改为哈尔滨市委，书记先后由孟坚、唐宏经担任。一九三〇年九月，贯彻“立三路线”时，将市委改为北满特委行动委员会，孟坚任书记。其下属组织有：哈尔滨市委(由特委兼)，阿城、宁安县委，庆城、依兰、珠河、通河、密山、东宁特支等。同年十一月撤销北满特行委，成立北满特委，书记先后由孟坚、唐宏经、吴福敬担任。所属组织有：哈尔滨市委(书记由吴福敬兼任)、阿城、珠河、宁安、依兰、穆棱、密山县委，共有党员四百七十二人。一九三一年三月后，农村党组织遭受破坏，党员下降为二百四十四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加强了对我省各地党组织的领导，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农村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北满特委撤销，把城市中党的组织和农村中党的组织分开，设立了几个中心县委。这期间党组织的情况是：

#### (一) 哈尔滨市委

一九三二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四月，书记先后由张贯一(即杨靖宇)、魏拯民担任。全市党员有一百一十三人。一九三四年四月市委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改为区委。

#### (二) 宁安中心县委

宁安中心县委于一九三一年冬成立，书记潘庆由，党员一百一十四人。一九三二年六月改为绥宁中心县委，书记朱守一。所属有宁安、穆稜县委和密山区委，党员二百九十三人。

一九三三年五月，为了统一领导绥宁、虎饶和东满党的工作，成立了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一九三四年四月吉东局遭受破坏，六月吉东局撤销，其所属组织归省委直接领导。

一九三五年春吉东特委成立，书记先后由吴平、李范五担任。

### (三) 汤原中心县委

一九三一年由汤原县委改为中心县委，书记先后由李春满、裴治云、夏云阶、周云峰、老柳、白江绪等担任。所属有六个区委，四个支部（三姓、通河、佳木斯、鹤岗）。全县党员一百一十人。

### (四) 珠河中心县委

一九三二年九月由珠河特支改成。书记先后由金凤祥、关化新、张兰生等担任。一九三三年末所属二个特支，七个支部，全县党员一百余人。

### (五) 饶河中心县委

一九三一年由县委改为中心县委。书记朴元彬。

以上是满洲省委及我省党组织的概况，这期间满洲省委的活动情况是：

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下，东北各地党组织，领导与组织了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斗争，反对了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

统治。同时在东满地区，还领导了农民群众（主要是朝鲜族）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救国的总政策，以磐石、延边、珠河、宁安、汤原、虎饶等地为中心，积极发展组织，创建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一）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一九二七年十月——一九三一年九月）

在此期间，满洲省委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精神，提出了党在满洲的总任务是：“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群众的斗争，加强党的政治影响，壮大群众组织与斗争力量”。还提出了“必须坚决地尽可能地采取公开活动的策略，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联系”的工作策略。四年期间，领导群众进行了多次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如一九二八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一九二九年秋反对奉系军阀劫夺中东铁路的斗争；以及沈阳、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地和南满铁路、北宁铁路工人的多次罢工斗争；农民运动和士兵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开展。在这些斗争中影响较大的是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〇年三月中东铁路工人的斗争，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曾亲临哈尔滨进行领导。通过这一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唆使东北军阀劫夺中东铁路、反对苏联的阴谋活动，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但在这期间，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也给东北党的工作带来了损失。如一九三〇年贯彻立三路线和一九三一年贯彻王明“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反对右倾危险”的错误指示，使党脱离

了群众，组织遭受了破坏。

(二) 组织和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四月)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满洲省委就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投降政策，提出武装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党的领导下，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城市都组织了反日救国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团体，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并发动募捐，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农村的抗日武装斗争。农村的党组织积极进行武装活动，一方面派党员到义勇军、救国军等抗日部队中去工作；另一方面发动群众，直接组织游击队。一九三二年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有磐石、延边、巴彦、汤原等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初抗日义勇军失败后，党在各地更加积极进行武装群众的活动。同年五月接到中央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信(即“一二六指示信”)后，党的政策有了很大转变，加强了对残留在各地的义勇军、救国军和山林队的团结工作，使党的抗日武装很快发展起来，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同时还以磐石、延边、哈东和吉东为中心，建立了四十余县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在游击区和根据地内，组织了反日会和农民委员会等抗日群众团体，这些组织担负着拥军支前、肃清汉奸、传递文件、领导群众武装等任务，起着基层抗日政权的作用。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三年末全省党员已有二千五百人，比一九二七年十月增加了十倍。



这期间，党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一九三二年六月召开的“北方会议”完全否认了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无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错误地提出了反对“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的口号，要求东北和南方一样，继续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中央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形势，作了基本正确的分析，提出了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规定了党在东北的斗争任务，使党的工作由土地革命，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转变到组织全民反日统一战线，建立人民革命军方面来。

“一二六指示信”对克服和纠正东北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起了积极作用，对东北党的工作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主要方面。但在“一二六指示信”中“左”的色彩仍未彻底清除，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建军原则、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都未得到根本解决。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敌人也加紧了对党的组织的破坏。在这期间，党组织曾遭受四、五次较大的破坏，比较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大破坏，省委机关被破坏后，哈尔滨、奉天、大连，吉东等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这不仅削弱了党在城市中的组织力量，而且使一部分农村党的组织也受到了损失。这期间，由于关山阻隔，敌人严密封锁，一九三三年后满洲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系日益困难，时断时续，到一九三五年初，即完全失掉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总之，满洲省委是在敌人残暴统治下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九一八”事变后，又领导群众进行

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八年来，党的组织有了相当发展，建立与领导了一支抗日武装，开展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统治，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 三、四个省委时期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九四二年八月)

正当东北各地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之际，王明、康生于一九三五年初，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满洲省委发来紧急电令，要求省委负责人全部赴苏，讨论满洲工作问题。省委常委杨光华、谭国甫、小骆三人讨论了此电令，决定杨光华、谭国甫赴苏，小骆留省委主持工作。并于四月七日以省委名义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组织遵照中央指示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来的韩守魁(后被捕叛变)、傅景勋(后被捕叛变)、张德三人赴哈尔滨与满洲省委小骆接上关系，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取消满洲省委，划分四个省委和建立哈尔滨特委的指示。之后，小骆于六月十八日离开哈尔滨赴苏。至此，满洲省委的工作全部结束。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发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军政负责同志的信中，也提到要对东北的党组织进行改组，即：“取消满洲省委，将过去的吉东、东满、南满各特委改组为省委”，“以现在汤原、依兰、桦川、方正、密山的工作为基础，建立松江省委”。东北各

地党组织，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先后成立了东满、南满、北满、吉东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这四个省委和一个特委除东满、南满省委在吉林、辽宁省活动外，北满、吉东省委和哈尔滨特委都在黑龙江省境内活动。

北满、吉东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等组织建立和发展情况如下：

### （一）中共北满省委

北满地区的党组织（包括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佳木斯市委、依兰县委及抗联三军和六军党委），在满洲省委负责人被调往莫斯科后，失去了上级领导关系。这些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一九三五年四月满洲省委临时通知精神，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

一九三六年春，珠河中心县委和三军党委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信后，根据当时北满的实际情况，为解决北满地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在汤原附近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成立北满临时省委，选举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箴、金策、张兰生、朱新阳、李福林、许亨植、夏云阶、白江绪、魏长魁、刘海涛、兰志渊（后叛变）、郝贵林、张福林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主席赵尚志，省委常委由冯仲云、李福林、张兰生三人组成，书记冯仲云，组织部长李福林，宣传部长张兰生。

一九三七年七月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常委，书记张兰生，组织部长魏长魁，宣传部长冯仲云。

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满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全会改组北

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常委分工：书记金策，组织部长张寿箴，宣传部长冯仲云。

北满省委所属各地党组织的情况是：

(1) 哈东特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成立，特委设在苇河，书记张福林，下属三个县委。

珠河县委：于一九三六年春组成，书记刘士武，党员十三人。初建时珠河县委领导延（寿）方（正）特支。

方正县委：一九三七年春由方正特支改为方正县委，书记刘兴亚，下属四个支部，党员十九人。

苇河县委：一九三六年四月成立，书记于富贵，下属苇河、亚布力两个区委和四个支部，党员有八十余人。

(2) 下江特委：一九三六年九月将汤原中心县委改组为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特委。特委设在佳木斯郊区的大马裤。书记先后由白江绪、高禹民担任。下属一个市委，五个县委。

佳木斯市委：一九三六年成立，书记董仙桥，党员三十余人。

汤原县委：一九三六年九月组成，书记刘善一，下属格节河、洼打岗、安帮河、黑通、汤原、鸭蛋河、鹤立岗等七个区委和通河特支。党员有七十八人。

依兰县委：一九三七年四月成立，主要领导依兰附近农村工作。书记小魏。八月改组，书记丁世贤。

富锦县委：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安帮河区委基础上建立，书记刘忠民。下属组织有安区、集区、英区、新区四个区委。

绥滨县委：一九三七年七月成立，书记王永昌。下属组织有连区、绥东区、绥滨区、萝北区四个区委。

另外还有桦川县委。

(3) 上江特委：一九三六年九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成立了上江特委，领导庆城、海伦地区的工作。书记赵敬夫，特委机关设在海伦县山里。由于没有和地方组织接上关系，加以因敌人的“讨伐”，没能开展工作。

(4) 讷河县委：一九三九年二月建立，书记尹子奎。讷河县委是在北满省委开辟黑嫩平原抗日游击区后建立起来的。其工作分布在嫩江、克山、布西、德都、讷河等县。

(5) 肇源县委：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满省委先后派高仁杰、徐泽民、刘海、张文廉、高吉良到肇州开辟工作。一九四一年十月正式成立县委，书记高吉良。

另外，北满省委领导的军队党组织有抗联三军、六军党委。

## (二) 中共吉东省委

一九三六年二月吉东特委遭到破坏后，先后成立了下江（乌苏里江下游地区）、道南、道北（中东铁路东段哈绥线）特委。一九三七年三月，吉东党组织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关于成立四个省委的指示，决定以道北特委为基础建立吉东省委。省委书记宋一夫，委员有周保中、诵（即于化南）、刘曙华、关书范（因投敌被处死）、王光宇等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宋一夫叛变投敌。同年十二月，召开吉东党的临时会议，决定改吉东省委员会为吉东省委执行部，执委主席周保中。一九四〇年四月，吉东省委改选。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党的第一次代

表大会选出了周保中、崔石泉、王效明、王光宇、黄玉清、陈翰章、侯国忠等七人为吉东省委执行委员，周保中为省委书记。

吉东省委领导下的党组织的情况是：

(1) 下江特委：一九三六年三月以饶河中心县委为基础改组而成。特委机关设在饶河十八垸地，书记朴元彬。一九三七年夏郑鲁岩(一九四一年叛变，解放后被处死)代理书记，年底鲍林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六月根据吉东省委指示，下江特委改组，成立抗联七军党特委会，书记鲍林，特委会无固定地址，经常驻在军队后方或随军活动。七军党特委会领导七军党组织和原下江特委所属的地方党组织。同年八月下旬，根据吉东省委指示组成抗联四、五、七军下江临时党团（下江三人团），由季青任书记。一九三九年底，撤销临时党团，组成新的七军党特委，书记先后由崔石泉、王效明担任。

下江特委所属地方组织有：

饶河县委：一九三六年春改组中心县委时成立。书记李永镐。领导小南河、大叶子沟、县街南、抚远四个区委。党员六十余人。

虎林县委：一九三六年七月由区委改为县委，书记徐风山。领导窑营、虎林两个区委。党员五十七人。

另外，在宝清、富锦、绥滨也有党的组织。

(2) 道北特委：一九三六年春建立，书记宋一夫。特委机关设在林口县城内。吉东省委成立后，道北特委组织就不存在了。特委所属组织有三个县委：

穆稜县委：书记刘广田。下属有八面通中心区委。

勃利县委：一九三六年七月组成，书记鲍林。下属县城区、小五站、刁翎等四个区委。

依兰县委：一九三六年五月组成，主要负责城镇工作，书记先后由刘才、刘振担任。下属组织有佳木斯、沿江小城镇、商埠三个区委，党员七十余人。

(3) 道南特委：一九三六年四月组成，书记张中华。一九三七年三月吉东省委成立后，保留了原道南特委。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吉东省委指示由季青、陈翰章负责道南特委工作。一九四〇年十月特委改组，书记季青。一九四一年三月，吉东省委指示由季青，×××、安吉组成道南特委三人团。道南特委下属地方组织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有宁安县委、东宁区委。在吉林省境内的有汪清、晖春、延吉县委及额穆区委。

宁安县委：一九三六年以后，宁安县委机关组织随抗联五军活动，一九三七年重建县委，书记田仲樵。一九三八年六月，吉东省委派王日新接任县委书记工作。

另外，吉东省委直属的党组织还有：

密山县委：书记先后由倪景阳、褚志远担任。

宝清区委：书记王名州。

依（兰）方（正）区委：书记于重礼。

林口区委：刘通（交通员）。

吉东省委领导的军队党组织有抗联五军党委。

### (三) 中共哈尔滨特委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韩守魁到哈尔滨与满洲省委代表小骆接上关系，一月九日撤销满洲省委，成立哈尔滨特委，特委机关设在哈尔滨，书记韩守魁，

组织部长张志恒（张瑞麟）。下属组织有三个市委、一个县委、四个特支。

哈尔滨市委：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原有两个区委基础上成立，书记先后由张敬文、陈印章、张志恒担任。

奉天市委：一九三四年冬由奉天特委改组为市委，受满洲省委领导。一九三六年初满洲省委撤销后，划归哈尔滨特委领导。书记小崔。

大连市委：一九三六年后归哈尔滨特委领导，书记先后由张福增（夏尚志）、王清志（王群）担任

海伦县委：一九三六年初由海伦特支改为县委。书记先后由王清志、张福增担任。下属三个中心支部。党员二十余人。

巴彦特支：书记赵洪顺。

呼兰特支：书记刘书恒。

宾县特支：书记孙保太。

陶赖昭特支：书记尹洪彬。

以上是四个省委时期我省党组织的发展变化情况。这期间我省党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是：

一九三六年初，在满洲省委被撤销，失掉党的统一领导的情况下，我省党组织，遵照中央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独立自主地领导了各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六年二月，根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部队共同发表的统一建制宣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将活动在我省的各个抗日部队先后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四军军长李延禄，五军军长周



保中，六军军长夏云阶，七军军长陈荣久，八军军长谢文东，九军军长李华堂，十军军长汪雅臣，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整个部队人数约二万余人。抗日游击区扩大到四十余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抗战的鼓舞下，我省党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和东北抗联部队，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电讯设施，扰乱敌人的后方，从而牵制了敌人，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随着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敌人对党组织和抗联队伍的进攻也更为加剧。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开始，首先对抗日斗争最活跃的伪三江省地区（今合江地区）实行三年“治安肃正”，调动日军第四师团和大量伪军组成二万五千人的“讨伐队”疯狂地对抗联部队进行“围剿”。同时对我地下党组织进行疯狂破坏。一九三七年“四·一五”对哈尔滨特委和哈东特委进行大逮捕，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四百八十余人。一九三八年“三·一五”对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特委及其所属组织进行大逮捕，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百八十余人，使我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强大敌人的猖狂进攻和我省党组织及抗联各军缺乏统一领导，致使党和军队遭受重大损失。党组织被破坏，抗联部队失去了领导和依靠，活动更加困难。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开始抗联第二路军的四、五军主力向哈东旧区远征，途中遭受敌人的阻击，损失严重。三路军从一九三八年夏开始分批西征，经历千辛万苦，到达海（伦）北（安）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在艰苦的斗争中许多重要干部相继牺牲，抗联基本队伍损失很大，统战部队大部瓦解，不坚定分子投敌叛变，形势急转直下，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时期。

## 四、东北党委员会时期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九四五年十月)

一九四一年，日本关东军增至七十余万，实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和“满洲国战时总动员”，公布“战时统治法”，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因此我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更为困难，抗联部队经常与多于自己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进行顽强战斗，长期得不到休整和补充，处境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联部队与苏联远东边防军取得了联系，经苏方同意抗联各部队相继进入苏境。一九四一年二月，吉东、北满、南满省委代表在苏联伯力开会，决定东北抗联各部队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和开展小部队活动。

为便于统一领导，统一东北党组织，由周保中、崔石泉、张寿箴、冯仲云、金策、王效明组成东北党代表组，并由崔石泉、周保中、张寿箴组成三人团，负责统一领导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

一九四二年四月，周保中和张寿箴发表“关于建立东北党及抗联统一领导机关之意见书”。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北满、吉东、南满省委的基础上统一了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开始称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以周保中、崔石泉、张寿箴、金策、冯仲云、×××、王效明等十二人为委员，以周保中、崔石泉、张寿箴、×××、鲁东生为常委，以崔石泉为书记。

在成立东北党委员会的同时，接受苏联方面的建议，把过界入苏的抗联部队统一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

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张寿箴，参谋长崔石泉。在东北党委员会和教导旅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主要进行了政治、军事训练，为迎接抗战胜利进行了准备。同时派出许多支小部队回到东北进行活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因大部分朝鲜同志回国，东北党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书记为周保中，委员有：冯仲云、张寿箴、鲁东生、姜信泰、金光侠、王效明、彭施鲁、王明贵、王一知、刘雁来、沈泰山等。

一九四五年九月东北光复，东北党委员会所属党员分头进入东北七个地区五十七个市县开辟了党的工作。在我省境内的党组织有：

黑龙江地区委员会，由王明贵、王钧、陈雷、张林负责。所属有：齐齐哈尔市委、北安、绥化、克山等县委。

松江地区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为张寿箴。下属组织有：哈尔滨市委、珠河、阿城、方正、宾县、延寿、双城、苇河、五常、安达、巴彦、木兰、通河等县委。

佳木斯地区委员会，先后由彭施鲁、刘雁来负责。下属有：依兰、汤原、富锦、桦川、同江、饶河、宝清等县委。

牡丹江地区委员会，书记金光侠，委员陶雨峰、乔书贵。下属有：牡丹江市委、林口、勃利、依兰、宁安、穆棱、密山等县委。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东北党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东北局接上关系。从此东北党委员会所属的党员和抗联战士，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领导下，投入了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黑龙江省党组织有着长期的、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它在中共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下，同吉林省、辽宁省党组织一道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十四年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战争中，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收复失地，解放东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九四八年一月东北局“关于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和抗联干部的决定”中，对东北地下党组织和抗联干部的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同志们，在党中央领导与抗日救国的总的政策之下，曾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英勇斗争，曾得到东北人民的爱戴。‘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又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击败了日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省的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着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是值得我们永远赞颂的；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他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我们应该十分珍视我省党组织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研究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历史和党的革命传统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2 023 2872 0

## · 敬告读者 ·

本刊一九八二年第三辑出版以来，陆续收到北京、武汉、上海、沈阳、湘潭、黑龙江等地读者逊实、柳勉之、方友义、张钟、陈志莹、张建基、阎政绵、唐正芒、张春国等同志及一些单位的来信，对这一辑，特别是对《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变化情况的资料》，提出了一些质疑、意见和建议。我们已将来信转交作者，作者表示需要进一步查阅和考证资料，以便补充和修订；对于读者的热情关心和指正表示衷心感谢。

## · 来函摘登 ·

### (一)

中国共产党国营五五九厂委员会宣传科来信：“陈潭秋同志已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事隔近两年又当选为‘七大’正式委员，对这问题我们一直迷惑不解”。

经与中央档案馆有关同志联系答复如下：

“据我们所知，七次大会时尚未得到陈潭秋同志遇害之确息，是到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才得知的。”

### (二)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同志提出：“《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所加的‘编者按’中说：刘仁静与陈独秀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八十一人’名单中，没有刘仁静。”

经与中央档案馆有关同志联系后答复如下：

“唐宝林同志的《刘仁静与八十一人意见书》一文拜读，并已查清：由于我工作疏忽，在彭述之信的按语中误写了刘仁静的名字，特向读者及刘仁静先生致歉，并引为今后工作鉴戒。”

## 更 正

### 第五辑《“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 11 | 倒 4   | 造谣诬蔑           | 造谣污蔑           |
| 11 | 倒 2   | 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 之一), 污蔑中国共产党”。 |
| 12 | 6     | 共产党            | 共党             |
| 13 | 9     | 五月十二日          | 五月十三日          |
| 13 | 倒 9   | 查到一个           | 查到了一个          |
| 16 | 10—11 | “查到了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 | 查到了一份“伍豪等人启事”  |

### 第六辑“遵义会议专题资料”中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 13 | 10    | 问题,                | 问题。   |
| 13 | 10    | 说起,                | 说起。   |
| 13 | 11    | 常委,                | 常委。   |
| 13 | 倒 2   | 常委,                | 常委。   |
| 14 | 6     | 核心。                | 核心,   |
| 14 | 14    | 总书记,               | 总书记。  |
| 14 | 倒 4   | 路程,                | 路程。   |
| 20 | 14    |                    | [博古]后面加:<br>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黎平。” <sup>②</sup> |
| 22 | 11    | 黎平” <sup>②</sup> 。 |   |
| 22 | 15—17 |                    | [去掉]红军到了乌江地域……追击部队的任务                       |
| 31 | 倒 6   |                    | [博古的]后面加:<br>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                 |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辑

作者 =

页数 = 29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